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论语言的起源

[德] J. G. 赫尔德 著

商务印书馆

论语言的起源

〔德〕J.G.赫尔德 著

姚小平 译

（柏林皇家科学院1770年获奖论文，
并由科学院指定出版）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言的起源/（德）赫尔德著；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ISBN 7-100-02515-X

I. 论… II. ①赫… ②姚… III. 语言—起源—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15586号

LÙN YǓ YÁN DE QǏ YUÁN

论语言的起源

〔德〕J.G.赫尔德 著

姚小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ISBN 7-100-02515-X/B·377

1998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5千

印数 2 000册　　印张 1 3/8

定价：7.50元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据柏林 Christian Friedrich Voß，1772年版译出

词语是事物的符号。

——西塞罗

译 序

一

我们人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

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惑。初民社会普遍相信，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某种神力的创造，所以人的语言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这一神力的恩赐。在西方，典型的语言神授说见于《圣经》，并且由于《圣经》不可动摇的地位而成为从宗教到学术各界的正统说法。直到17、18世纪，语言神授说仍主导着大多数学者的思维。同时，一些有头脑的学者开始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学者中最有名的三位是：孔狄亚克(E.B. de Condillac, 1714—1780)，卢梭(J.J. Rousseau, 1712—1778)，赫尔德(J.G. Herder, 1744—1803)。孔狄亚克在《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中探讨了语言起源问题。卢梭在1775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论及同一问题，后来又专门写了一本《论语言的起源》，在他逝世四年后问世。

18世纪中叶以后，语言起源问题已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焦点，许许多多学者加入了辩论的行列。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甚至决定设立专奖，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场竞争。一年后，最终有三十篇论作呈交科学院。在这些用德文、法文或拉丁文写成的论作中，有六篇受到评审人士称赞，还有一些被认为写得不错，但是获得科学院奖并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只有一篇，那就是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

在这部著作里，赫尔德分析了以往有关语言起源的各种理论或假说。重点的对象有两个。一方面，他驳斥了苏斯米希(J.P. Süssmilch, 1708—1767)的神秘主义观点。苏斯米希时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754年写过《试证最早的语言并非源于人，而只能是上帝的发明》一作(1766年出版于柏林)，狂热地维护语言神授说。另一方面，赫尔德批评了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国哲学家非但未能澄清问题，反而搅乱了正常的思路，使本来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变得不可解释。

二

苏斯米希的推理是：人类语言具有异常复杂的机理和精巧的组织，可以归简为二十个左右的符号(即字母)，这样一种神奇的机制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造出它来。这种说法的荒谬在今天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在那时，在赫尔德，要驳倒它并非易事，因为他不能像我们一样持无神论的立场。他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甚至也不否认人类为上帝所造。他抓住苏斯米希借以立论的一条根据，即人类语言的完善性，指出苏氏的理解彻底错了。事实上，没有一种语言像苏氏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他列举了一系列经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人类的言语器官所能发出的语声是极为丰富多样的，任何现存的文字都不可能把语声悉数记录下来并加以准确的描述。更不必说，文字相对于有声语言历史是较短的。

其次，拿希伯来语这种常常被视为上帝最早造就的语言来说，它的文字系统缺陷就更大了。希伯来文是辅音文字，并不记录元音。

再者，人类语言最初一定非常粗陋简单，充满感性的成分，缺乏抽象的表达。这一点可以从现代语言中的某些遗迹看出来，也

可以从许多现代土著部落的语言上获得印证。

既然人类语言有那么多的缺陷，赫尔德问道，它怎么可能出自完美无缺的上帝之手呢？语言神授说看似敬神，实则是对神的完美形象的亵渎。上帝所创造的并不是人的语言，而是人的心智：

> "神造就了人类心灵，而人类心灵则通过自身的作用不仅创造出语言，而且不断地更新着语言。神的崇高本质映现在人类心灵之中，使之藉助理性而成为语言的创造者。所以，只有承认语言源出于人类本身，才可以说，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神的作品。"(Suphan, V. 146)[①]

赫尔德就这样巧妙地反驳了苏斯米希一派的语言神授说。

三

孔狄亚克的语言起源理论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他假定，有两个新生儿孤立生活在沙漠中。他们会很自然地开始相互交往，而在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类似情景的刺激，他们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把他们的喊叫、手势与思想联系起来，这样，最早的词的意义就约定俗成了。在赫尔德看来，孔狄亚克的理论假说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解释，因为，像沙漠中的两个婴儿这样的事例是极不自然的，严格说是不可能的。他质问道，既然孔狄亚克的目的在于考察人类知识和语言的自然发展，怎么可以从如此不自然的假设出发呢？

卢梭和孔狄亚克一样，也主张约定俗成或社会规约说。赫尔德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任何社会规约都以某种选择为前

---

① 指 Bernhard Suphan 编的《赫尔德全集》(*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ämtliche Werke*.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77—1913)第五卷上的页码。以下引注时只标明页码。

提，而选择本身无疑已是一种理性行为。由于语言的运用为理性行为所必需，语言当然也是达成任何社会规约的先决条件。即便存在某种约定，那也只能是人与自身的心智的约定。显然，赫尔德无意从人的社会环境中寻索语言的起源，尽管他承认，语言始终是“社群的语言”(eine Völkersprache)。他相信，即使没有社会，没有舌头，人也必须发明语言，因为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

针对苏斯米希的神秘主义立场和孔狄亚克、卢梭的社会规约假说，赫尔德提出，必须以人类自身为出发点，以日常事实为依据探索语言的起源。他强调，语言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物，所以，语言起源问题只能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解答。

四

赫尔德的论文以这样一句话开头：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5)

这句话已成为语言思想史上的一句名言。它是一个断言，暗含着下列三个论点：1) 人与动物有某种共同的东西；2) 动物也可以有语言；3) 人类语言从动物语言演化而来。在论文的第一部分里，赫尔德详述了这三个论点。

动物是感觉的生物，而人首先也是感觉的生物，感觉是人和动物的共性。即使在孤立独处的境况下，他们也都需要表达痛苦、快乐、欲望等情感。高等动物像人一样，自然而然地使用声音作为表达的手段。这些野性的声音，尖啸、呻吟、喊叫等等，照赫尔德的说法已是一种语言。在我们人类的语言里，至今还可以发现这种初始语言的痕迹——感叹词和摹声词。

如此说来，语言的根源在于人的动物本性。语言是从表达情感的自然发声演变而来的。赫尔德把人与动物曾经共有的那种语言称为“自然的自发语言”，它与人类今天使用的语言已完全不同。

虽然人类语言还保留着一些自发语言的成分，但这些成分不属人类语言的本质构造，或用赫尔德的话说，它们不是人类语言的根茎，而是滋润根茎的树液。

那么，什么才是人类语言自己的根茎？人类语言如何从动物语言演变过来？赫尔德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每一类动物都有某种特殊的本能，即天生的能力。例如，蜜蜂生来会营造蜂房，蜘蛛生来会织网。这类本能总是局限于一定的范围。赫尔德指出，一种动物的活动范围越有限，就越不需要语言。比之动物，人的本能非常弱小，但正因为失去了本能，人才得以扩大生活的领域，提高自由的程度。为了创造语言，人必须拥有某种并非本能的内在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即赫尔德所谓“悟性”（Besonnenheit）。Besonnenheit 是赫尔德通篇论作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把它译为“悟性”，或许不是很贴切的译法。要理解赫尔德的这个概念，最好是弄清他本人赋予了它哪些含义。根据他的阐述，悟性有五个特征：

1）它为人类所独有；2）它是一个整体；3）它的作用既是自发的，又是有意识的；4）它的基础是感觉；5）它是为语言而预先设计的。

下面我们逐点进行分析。

1）悟性是纯人类的能力，而动物只有感觉能力。悟性与感觉能力不是程度的差别，也不是力量大小的差别，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据此，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绝对的。悟性是人类的内在属性，而语言则是人类的外在标志。

2）悟性是全部人类力量的总和。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并不重要。称为“理性”或“知性”也好，称为“智能”、“意识”也好，都无不可。重要的是必须记住：悟性永远以绝对完整、高度和谐一致的形

式存在。理论上固然可以把它的活动按其功能来分类，但事实上它是不可分割的。自一开始，悟性就已包含着日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全部要素。赫尔德把悟性的这一特点比作一粒种子的生命力。种子虽小，却能孕育出整棵大树。

3）人初次本能地运用悟性，便创造出了语言。语言的创造是一个自发的、自动的过程，就像胎儿经过躁动，注定要出生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造出第一批词，人必须集注意力于物体、分辨和确定物体的特性。这种认识活动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赫尔德说："悟性的这种活动是有意识的，它的初次表现就是词，而由于词的出现，人类语言就发明了。"(34)

4）悟性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人唯有借助感官，才能生存于客观世界。赫尔德提出，所有的感官都是悟性的认知渠道。尤其是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悟性没有感官就寸步难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感觉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在《论语言的起源》中，他反复表示，感觉是一切概念和抽象表达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在接受外部刺激时，听觉是最重要的官能，就语言而言，也主要是经由听觉、声音上升至抽象。

5）作为一个均衡协调的整体，悟性是预先设计好的，它的存在目的便是要造就语言。虽然赫尔德也谈到人的演化发展，但他深信，人类悟性或心智的种子是由上帝埋下的。在论文将近结束时他说得明白，悟性之所以发展起语言，是因为它必然要作为上帝最完美的形象而发挥作用。显然，赫尔德也未能摆脱（或是不愿公开抛弃）由来已久的基督教创世观念。

赫尔德的"悟性"，使人想起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和康德的"先验范畴"。区别在于，"悟性"不是确定的观念或范畴，而是一种先定的认识倾向，一种对观念、印象进行区分和组织的自然禀赋。由于在赫尔德看来，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就不可能存在任

何独立并先存于感觉的观念。

希望以上分析能帮助读者大抵把握赫尔德的“悟性”这一概念。尽管我们做了种种描述，Besonnenheit 仍然是他的这篇论文中最不易定义的概念，因此也是最难找到适当译名的词。赫尔德本人并没有试图给它下过严格的定义，往往将它与 Vernunft（理性）、Verstand（知性）、Besinnung（意识）、Reflexion（反思）等词混用。术语的不一致或许表明，赫尔德本人也不很清楚这种 Besonnenheit 究竟是什么。

赫尔德的推理中包含着矛盾的命题。他断言，语言是悟性初次意识行为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悟性是发明语言的先决条件。但他自己也承认，悟性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有语言参与，语言和悟性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没有悟性，就不会有语言，而没有语言，悟性也不可想象。赫尔德曾指出苏斯米希的推论方式有问题：

> “没有语言，人就没有理性，而没有理性，也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和理性，人就不能接受神的教授，而没有神的教授，他当然也不会有理性和语言。”(40)

这样的推论就好比一个“永动陀螺”，可以不停地旋转下去；而且，“他可以把这个陀螺转起来对付我，我也可以把它转起来对付他”（同上）。可是，我们看到，赫尔德自己也被这样一个循环论证的怪物缠住了。当他认为人类语言由动物语言逐渐发展而来时，他坚持了演化的观点；但是，当他提出人的悟性自一开始就处于完备状态，足以一举发明语言时，演化的观点却为特创论所取代。

五

当年角逐普鲁士科学院奖的三十篇论作，唯有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其它有些篇虽然也曾出版，但知者甚少，鲜见于史。大多数作品则存入科学院档案室，一躺就是二

百年。直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语言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当年欧洲学坛上的这一盛事重新引起兴趣，才有人想起那批尘封的档案。1966 年，泰滕斯(Johann Nikolaus Tetens, 1737—1807)的《论[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由 H. Pallus 加序再版(Berlin: Akademie - Verlag)。1975 年，美国人 A. D. Megill 在题为《启蒙运动时期关于语言起源的辩论及其历史背景》的博士论文中(未出版)，对参赛作品作了通盘考察。1989 年，英国学者 P. B. Salmon 撰《柏林科学院 1770 年关于语言起源的征文活动中赫尔德的某些竞争对手》一文，解读了其中四篇有分量的作品，并与赫尔德的论述作了比较。这四篇作品是：

1) 哲学教授梯德曼(Dieterich Tiedemann, 1748—1803)的《试释语言的起源》，德文。此作曾于 1772 年出版(Riga: Hartknoch)，甚至比赫尔德的论文正式出版还早数月，1978 年重印(Hildesheim: H. A. Gerstenberg)。
2) 哲学教授泰滕斯的《论[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1772 年出版(Bützow & Wismar: Berger - und Boednerschen Buchhandlung)，1966 年再版。
3) 地质学家费克塞尔(Georg Christian Füchsel, 1722—1773)的《地球和人类远古史草纲，兼释语言的起源》，德文，1773 年出版(Frankfurt & Leipzig, 出版社不详)。
4) 神甫柯比诺(Abbé Copineau) 的《关于[各种]语言的起源和形成的综合论证》，法文，1774 年出版(Paris: Ruault)。

Salmon 分析后认为，上述四篇论文均有独到的思想，学术水准不在赫尔德的获奖论文之下，而其推论的严密、行文的谨慎尤胜于赫尔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余者连一句“写得不错”的评语也未得到。赫尔德的论文之所以获得科学院评委的一致推许，似乎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坚定地主张人类本源说，绝然否认神造语

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化语言征服了评委们的心，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一篇论文中用了那么多的惊叹号。[①] 赫尔德自己在另一处说过：语言若过于诗化，就会损害哲理。[②] 既如此，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激情洋溢的文体呢？

的确，今天看来，赫尔德的论证不无漏洞，即便在当时也未必能让众人折服。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在辩驳，不如说是在声讨，与其说在论证一种观点，不如说是在申述一个信念。而他所申述的信念其实并不为所有的评委接受。比如最后宣布竞赛结果的科学院常任秘书福尔梅(Johann Heinrich Samuel Formey, 1711—1797)，就倾向于语言神授说。但是他的一票仍然投给了赫尔德。这说明了什么？

六

《论语言的起源》首版于 1772 年(Berlin：Christian Friedrich Voss)，封面上印着让赫尔德引以为荣的说明文字："皇家科学院 1770 年获奖论文"，"由科学院指定出版"。此后，赫尔德又做了一些修改，于 1789 年出了修订版(Berlin：Christian Friedrich Voss und Sohn)。这两个版本不同在哪里呢？R. Steig 和 B. Suphan 分析后认为，修订版无论在内容和材料上还是形式上都没有多少更新；赫尔德的修改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只不过是想把原来作品中的那种狂飙运动时期特有的文体改换成古典文体。而经过这样的

---

① 见 Paul B. Salmon. "Also ran. Some rivals of Herder in the Berlin Academy's 1770 essay competition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刊于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xvi：1/2. 1989)，42 页。

② 见《断想》(Aus den Fragmenten)，A.3.，"关于语言的形成"，收于 Erich Heintel 编的《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集》(*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pra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amburg：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64 [1960])，119 页。

改换，读者反而认不出赫尔德构思这部作品时原有的“心灵图像”(Bild seiner Seele)了。事实上，只有 1772 年的第一版才对当时的科学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

以上评论并非句句成理。要知道，赫尔德本来就没有把修订版(berichtigte Ausgabe)做成“扩充”(erweiterte)版或“更新”(erneuerte)版的意图。在为修订版撰写的序文(1788)里他说：“作为一部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获奖作品，本书基本上应该保持原样不变。”[2] 十余年过去后，他不是不想对原版的内容予以扩展和更新，但他没有这样做，正是出于“保持原样不变”的考虑。他维护了作品内容的历史原貌，并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主要出在文体上。赫尔德的确想把原先那种锋芒毕露、激情洋溢的文体改得妥帖和典雅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使文体“更平直更明了”，使表达“更贴切更温和”(同上)。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 1

> “有 100000 条根据，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81)

“100000 条根据”，修订版改为“上百条根据”。

例 2

> “现在，有一位冷酷的哲学家[按指卢梭]大概会站出来问，人们通过什么规律，才迫使别人接受自己任意发明的语言，承认规律的有效性呢?”(117)

---

① Bernhard Suphan 编《赫尔德全集》第五卷第 XVI 页。

② 同上，第 156 页。第二版不是一点内容更新也没有，比如这样一条更正就很有意思：“有没有一只猩猩，用它那种像人一样的发音器官说出过一个人类语言的词呢?”(45)在修订版中，赫尔德根据当时解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纠正了他对猩猩的发音器官的看法，把“像人一样的”改为“类似于人的”。

修订版删去了“冷酷的”一词。

例 3

“归根到底，语言好比是地球圆形表面上的普洛托斯(Proteus)。但有些时髦的新哲学家认不出这位普洛托斯的真实面貌……”(127)

“普洛托斯”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这里赫尔德用它来形容人类语言差异极大，种类极多，但归根到底又同出一源。修订版删去了“时髦的”一词。

通过这样的修删，这些句子的语气不那么夸张了，嘲讽也减少了。但是，赫尔德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在刻意追求古典文体。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论语言的起源》成为一篇像样的科学论文，或者像他在论文结尾时说的那样，“要使结论像最最可靠的哲学真理一样站得住脚”(147)。为此他当然要使用更精确的、不含过多感情色彩的表达。不过，对比第一、二版后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版中那么多的惊叹号和问号到第二版中几乎无一删改，所有形象比喻的手法以及大部分猛烈攻击的用语都保留了下来，所以，通篇作品诗意仍在，激情仍在，仍然是那个时代最罗曼蒂克的论文。

七

作为单行本，《论语言的起源》后来一再印行。现代如 Claus Trager 编的本子(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9)，是根据赫尔德 1770 年誊清的手稿重印的。德国出版的各种经典读物系列丛书(如 Reclams Universalsbibliothek)，一般都收入《论语言的起源》。

至于《赫尔德全集》，以 B. Suphan 于 1877 年至 1913 年间编辑出齐的一套 33 卷通行最广，《论语言的起源》收在出版于 1891 年的第五卷里(见注 1)，这是我翻译时根据的底本。另外，Regine

Otto 编的五卷本《赫尔德选集》的第二卷[①]，完整收入了《论语言的起源》；Erich Heitel 编的单卷本《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集》(见前文第9页注②)，收了这部作品的大部分。这两个本子，我在翻译以及注释过程中也有所参考。

Suphan 印出的是《论语言的起源》1772 年的首版本，但在每一页下都有大量脚注，凡是赫尔德在最初的手稿(a)、呈交科学院的誊清稿(b)以及 1789 年的修订版(B)中用了不同表达的地方，都一一予以注明。例如开篇第一句：Schon als Thier, hat der Mensch Sprache.（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在(a)和(b)里，句中的 Sprache（语言）原为 eine Sprache（一种语言）。关于这类差别，我们在中译本里只在若干地方作了说明，全部照录则无必要。

我开始读赫尔德，是在 1988 年。那一年秋天，美国人类学教授 M. Sahlins 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西方社会文化史讲习班"，我在班上作了读书报告"论赫尔德的语言起源观"，本文的一至四小节，便是根据那篇英文的读书报告改写成的。当时我手头只有 E. Heintel (1964 [1960])编的《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选》，后来才找到 Suphan 的版本和 Otto 的版本。Sahlins 和 Lee 为那一次讲习班编的教材[②]，选收了美国政治学教授 F. M. Barnard 译的赫氏《论语言的起源》，虽然不是全译，对于理解赫氏原作也不无裨益。在中译本的一些注释里我提到"英译"，指的就是 Barnard 的

---

① Regine Otto. 1982 (Hrsg.). *Herders Werke in Fünf Bänden*. Zweiter Band.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 - Verlag. 6. Auflage.

② 见 F. M. Barnard, 1969 (tr. &ed.). *J. G. 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Sahlins, Marshall and Benjamin Lee 1988. (eds.). *Readings in Western Ideas of Man,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译本。Barnard往往采取十分自由的意译，许多句子与原文对照之下已不像译文，而更像是解说。有时，我读原作遇到难解的词句，想从B. 译寻求帮助，却发现译者跳了过去，以一串黑点代之。看来，我所不解的，也让英译者头痛。

我本人对两百年前的德语，特别是赫尔德式的既充满诗意和激情、又富含深刻哲理的语言，远不能说已很有把握；对那一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也还在逐渐熟悉之中。汉译中存在的问题，恳切希望语言学界和德语界的行家及时指出。

姚小平

1996年10月于北外

目　　录

译　序 ………………………………………………………… i

第　一　卷

第一篇 ………………………………………………………… 2
第二篇 ………………………………………………………… 20
第三篇 ………………………………………………………… 38

第　二　卷

第一条自然规律 ……………………………………………… 72
第二条自然规律 ……………………………………………… 85
第三条自然规律 ……………………………………………… 94
第四条自然规律 ……………………………………………… 102
修订第二版序言 ……………………………………………… 113

第　一　卷

人类凭借其自然能力，能够自行发明出语言么？

第　一　篇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他的肉体的所有最强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灵的所有激昂的热情，都直接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一头蒙难的野兽如同英雄非洛克泰特一样[①]，假如被遗弃在一个荒岛上，看不到同类的行迹，不能指望得到同类的帮助，就会因痛楚而呻吟不休。它发出急促、恐惧的叫喊，仿佛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它让悄然的风带走它的呻吟，似乎这样能够消除部分苦痛，从天空中获得忍受苦痛的新的力量。但是，大自然绝没有把我们人类造成孤立隔绝的岩石或自私自利的单子(Monaden)！动物身上的每一根精微的感觉之弦(我不得不使用"弦"这一比喻，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比喻更适合于形容有感觉的机体的机械作用！)，不论其振动是否与意志、思考有关，其本质是否已为理性所认识，也不论其作用是否会促发同类个体的交流意识，都是针对其它个体而动作的。一根被敲击的弦是在履行它的天然义务：它发出响声，呼唤着一个有同感的回响(Echo)。[②]即使没有任何它者在场，即使它并不希望或期待它者给予回答，事情也一样。

假如生理学已非常发达，足以说明心灵学(die Seelenlehre)的

---

① 非洛克泰特(Philoktet)，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用赫丘利遗赠的毒箭杀死了帕里斯。他曾因脚被蛇咬伤、流脓不止而被希腊人遗弃在荒岛上。——译注

② 这里的 Echo 背后也有古希腊神话的典故：女神埃肖(Echo)因单恋美少年那希索斯(Nacissus)而憔悴至死，化为岩石，唯有她的泣诉如回响不绝于耳。——译注

奥秘(对这种可能性我十分怀疑),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分析神经构造而对上述现象做出一些解释,也许还有可能将之归诸具体的、细小而无感觉的筋脉(Bande)的作用。这里让我们大体上假定这一现象是一条明确的自然规律: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有感觉的动物,它不可能把它的任何生动的感受禁闭在自身之中;即使不具任何意志和目的,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每一种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大自然将一条规律赋予了所有动物,这仿佛是大自然用她那双善塑的手充满母爱地为其作品添上的最后一笔:"不要独自一人感受,而要用声音表达出你的感觉!"而由于这最后一笔创造对于一个种属的所有个体是相同的,上述规律就成为这样一个祝愿:"你用声音表达出来的感受将为你的同类认可,你的所有同类都将以同一方式知觉到你的感受!"啊,这个孱弱、敏感的生物,不要去触碰它吧!它看起来是那么孤立无援,宇宙间的每一场风暴都威胁着它的存在。可是,实际上它却并不孤立:它与整个自然联结在一起!它的确十分敏感,但自然为它的感觉之弦配上了声音,这些声音具有刺激、振奋的作用,从而能够唤起其它同样敏感的个体注意;就像是通过一条无形的链带,将火花传递给一颗遥远的心,让它为一个并未看到的生物产生感情。这类呻吟,这类声音,便是语言。所以,存在着一种感觉的语言,它是自然规律的直接结果。

语言最初为人和动物共享,关于这一点现在还只有一些零散的证据。然而这些零散的证据的可靠性却是无可辩驳的。我们的人为的语言已大大排挤了自然的语言,我们的市民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礼规已大大抑制、枯竭和转移了人类激情的浪潮,变化之大超出了我们原本的愿望;不过,最激烈的感情虽然已不常见,但仍有泄发之机,并且在母语中直接通过重音表达出来。急风暴雨般的热情,突然降临的欣喜、痛苦以及在心灵中留下深刻印痕的悲

恸，强烈的复仇感、绝望、愤慨、惊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自行显示出来，每一种感情都获得不同的表达。总之，在我们的自然中潜藏着多少种感觉，也就有多少种语音表达。——于是，我注意到，人类本性距离动物本性越远，人类与动物在神经构造上差别越大，我们人就越无法理解动物的自然语言。作为陆栖动物，我们人了解陆栖动物多于水生动物；在陆地上，我们了解畜牧动物多于野生动物；而在畜牧类动物中，我们最了解的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那些种类。当然，即使就这些种类来说，交往和习惯也或多或少起着决定作用。比如在一个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中，马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他自然要比初次骑马的人更懂得马，就像《伊利亚特》中的英雄赫克托耳(Hektor)能与他的马儿对话一样。一个生活在荒漠中的阿拉伯人唯一拥有的活的动物是骆驼，此外还能看到迷失方向的飞鸟，比起我们这些生活在屋檐底下的居民来，他当然更了解骆驼的习性，懂得飞鸟的鸣叫。森林中的猎人听得懂鹿鸣，而拉普人(Lappländer)则听得懂驯鹿的鸣声。这类情形并不能算是例外。实际上，自然的这种语言是每一类动物本身的社群语言(Völkersprache)，所以，人类也有自己的语言。

无疑，这些声音是十分简单的；如果它们发得很清晰，作为感叹词记录成书面形式，那么，绝然对立的感觉就可以有同一个表达。例如，低沉的“啊”(Ach!)既表示令人陶醉的欢爱，也表示垂头丧气的绝望；有力的“哦”(Oh!)既表示突发的欣喜，也表示勃然大怒，既表示强烈的赞叹，也表示极度的悲哀。这类声音之所以存在，难道就是为的被当作感叹词写出来么？让我们想像一幅完整的画像，画的是一张悲伤的脸，一双浑浊黯淡、期盼着慰藉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这泪水是多么感人啊！但泪水本身只不过是冰凉的水滴而已！把它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一下，它还能是什么？我可不敢说！人因疼痛而扭曲嘴唇，发出阵阵呻吟或叹息，这种令人为

之动容的声音若不与人类生命的表现联系起来，就只是一股空无内容的气流而已。一切感觉的声音都不外乎如此。在生动的联系中，在大自然积极作用的整个画面中，这些声音是感人至深、内容充盈的；但若与周围的一切隔绝开来，失去了生命，它们就仅仅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字符(Ziffern)。所以，通常所谓自然的声音，其实都是经过修饰的、人为的字母。显然，这样的语声(Sprachtöne)是不多的，但如果人只是受到机械的刺激，他那敏感的自然本性所生成的感觉也只不过是那么少数几种，并不像我们的心理学家归诸心灵的激情那么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感觉越是凝成一团而不是分散开来，其震撼力就越大；所以，语声虽然不多，却非常有力。语言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确定这样一些区别，比如哭声是因心灵的创伤还是因肉体的痛苦发出，喊叫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疼痛，轻轻的一声"啊！"意味着给恋人一个吻还是一行泪水，等等。语言应当唤起图像，而这一图像将会自动说话！语言应当发声，而不是描画！根据苏格拉底的一则寓言，痛苦和快乐归根到底是相毗邻的：自然在感觉中把二者的根连结了起来。那么，感觉的语言除了表现为这样的接触点，还能是什么呢？现在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所有原始的语言中，都还残存着上面说到的自然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已不再是人类语言的主要成分。它们不是语言的根茎，而是滋润根茎的树液。

较晚形成的形而上学的语言，也许是人类野性未驯的始祖[①]所生成的某一级亚种，经过千万年的蜕变之后，许多世纪以来又受到人类文明的熏陶和修整。这样一种语言，作为理性和社会的孩子，对其最早的母亲的童年可能了解甚少或一无所知；而那些古老

① 始祖(Mutter)，最早的手稿中为"始祖[语言]"(Mutter [sprache])。——译注

的、粗野的语言距离起源越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东西就越多。在这里我还无法讨论人在语言的形成中所起的任何作用，而只能先举出一些基本材料。我觉得，[在最早的语言里]还不存在词，而是只有一些表达情感的音；请看一看吧，在那些古老、原始的语言里，在它们的感叹词里，在它们的名词和动词的词根里，保存着多少这样的音啊！最古老的东方语言充满了感叹词，而我们这些较晚形成的民族却往往以为这样的用语是缺陷或是麻木迟钝的误解。东方民族唱起挽歌来犹如坟墓前的土著人，发出阵阵惨痛的哭嚎，这正是自然形成的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感叹词；他们的赞歌里有喜悦的喊叫，反复出现赞美的欢呼。这样的欢呼托马斯·肖曾经从哭泣的女人的口中听到过①，但在我们这里就往往会被视为愚蠢的举止。他们的诗歌活动和其他古老民族的歌唱中回荡着的那种音调，至今还伴随着一切土著部落的战争和宗教的舞蹈，丧葬和喜庆的歌曲，无论这些部落生活在哪里，在崇山峻岭的脚下或易洛克森(Irokesen)的雪原，还是在巴西或在加勒比海上。他们的语言中最早、最简单、作用最积极的动词的根，实际上就是人类最早出于自然本性的感叹，只是后来才得到人为的仿造和整饰，所以，就这种内在的、活生生的声音来说，一切古老原始的民族的语言对于异族人是永远不可言状的！

对大多数这类现象的联系，我在后面才能作出解释，这里我只提出一点。有一位语言神授说的捍卫者在下述事实中发现了值得赞叹的神明的秩序②："所有已知语言的声音都可以归诸大约二十

① 托马斯·肖(Thomas Shaw)，牛津大学教授，写过《关于土著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人民状况的游记或解说》，德译本出版于1765年，莱比锡。——译注

② 指当时的科学院院士苏斯米希(Johann Peter Süssmilch，1708—1767)。他写有《试证最早的语言并非源于人，而只能是上帝的发明》，1766年出版于柏林。这里引用的一句话见于其作21页。——译注

个字母。"然而，这个事实是错误的，结论更成问题。没有任何一种活的语言可以完全归诸字母，更不必说只有二十个字母。关于这一点，所有的语言一无例外都可以作证。我们的言语器官发出的分节音(Artikulationen)如此之多，每个音可以用如此多的方式发出，就像兰伯特先生在其著《工具论》的第二部分里正确指出的那样[①]，"我们的字母与语音比起来真是太少了"，"由字母来表达语音实在太不明确了"。这还只是就德语的情况说的，而德语诸方言的丰富多样的语音至今还未能被一种书面语言记录下来；更何况，整个语言不过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方言。正字法的种种特点，不正是由于难以像人们讲话那样来书写而造成的么？有哪一种活语言的音可以从字母中学到，哪一种死语言可以靠字母来激活？所以，一种语言越是生动，就越不可想像通过字母去把握它；纯粹的、未加区分的自然音越多，语音就越难以被写下来，更不必说仅仅靠二十个字母。而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一种语言的音常常是根本发不出来的。拉斯尔神父在北美的阿贝那基人(Abenakier)中间生活了十年[②]，他抱怨道，尽管他已全神贯注，往往也只能把当地人说出的词重复出一半，结果使自己成为笑料；但假如他用法文字母来记音，那就更可笑了！沙莫诺神父与休伦人(Huronen)为伴达五十年之久[③]，致力于编写当地语言的语法，尽管如此，他仍苦于发

---

① 兰伯特(Johann Heinrich Lambert, 1728—1777)，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其作《工具论》全称《新工具论，或关于如何探索和表述真理以及如何将真理与谬误和假象区分开来的思考》，1764年出版于莱比锡。——译注

② 拉斯尔(Sebastien Rasles, 1657—1724)，耶稣会传教士。他在《珍闻奇事书信录》里报道了该印第安人部落的情况。书由耶稣会传教团出版，1726年，巴黎，第17卷。——译注

③ 沙莫诺(Pierre Joseph Marie Chaumonot, 1611—1693)，耶稣会教士，于1639—48年和1663—92年两度生活在休伦人中。赫尔德原作中将此人的姓拼作Chaumont，这里据Otto (1982)版订正。——译注

不好这种语言里的喉音和难以形容的重音；往往，两个词由完全相同的字母构成，意义却截然不同。加西拉索·德·维加批评说[①]，西班牙人自己大大歪曲、窜改了秘鲁语的词音，反倒误以为秘鲁人的语言非常糟糕。据德·拉·孔达米尼说，在亚马逊河流域有一个小民族，其语言的一部分词无法写下来，即使不求完整，也写不下来。也许至少要用九到十个音节，才能把这样一个词记录下来，但在发音时听起来却最多只有三个音节。拉·卢贝尔谈到暹罗语时这样说："一个欧洲人说出一连串当地语言的词，土生土长的暹罗人却可能一个也听不懂；我们花再大的力气用我们的字母去表达他们的语音，也无济于事。"其实，有什么必要援引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民族的例子呢？在欧洲，我们自己中间残留下来的野蛮人——爱沙尼亚人和拉普人等，也像休伦人和秘鲁人一样常常有不完全清晰的、无法录写的发音。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的语言很早就有文字表达，但对送气音一直无能为力，以致语言组织(Organisation)的语音实貌无法用字母来描绘。英格兰人费尽心机，想把自己的语音写下来，可是能写会读是一回事，日常讲话则是另一回事！法兰西人不大让发音离开喉部，继承了希腊人特性的意大利人似乎用更高的舌位和更巧妙的呼吸来发声，这些民族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动的发音。为此，语音必须停留在构成它的发音器官内；一旦记为字母，语音经过长期的文字运用后就会变得既方便又统一，像影子一样依附于字母！

可见，前述事实本身是有问题的，结论更是错误的。语言并非源出于神，恰恰相反，它源自动物。就拿所谓最早的神造语言希伯来语来说吧(世界上绝大多数字母是从它那里继承来的)：它的整

---

① 夏齐拉索·德·维加(Garzilasso de Vega, 1539—1617)，秘鲁史学家，写过秘鲁征服史和印加帝国史。——译注

个语法结构，大量相似而易混淆的字母，特别是完全缺乏元音[字母]，都充分证明它在初始阶段发音非常生动，根本写不出来，所以一旦被写出来就只能是那么不完善的样子。希伯来语的字母全都表示辅音，至于词里面最关键的要素，即元音，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写出来。这个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记下非本质的东西而放过本质的东西，这样一种书写方式是与健全理性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所以，假如语法家已养成思考的习惯，这样的书写方式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元音视为最重要、最生动的东西，视之为语言的枢纽，而希伯来人却不把元音写出来。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的元音写不出来。这些元音的发音异常生动，组织得相当巧妙，而气流的运动又十分微妙，给人以玄虚之感，因此它们很快无影无踪，不能用字母来把握。只是在希腊人手里，这类生动的送气音(Aspirationen)才第一次由正式的元音标示出来，但仍须借助于送气符号(Spiritus)等等。在东方民族那里，言语仿佛完全是送气或持续的呼气，或就像他们在形象生动的诗歌里常常说的那样，是口中的灵气。这样的语声是吹拂过耳朵的气流，是神明的颂曲，而把它描画下来的静滞的字母只不过是一具僵尸，必须通过阅读才会获得生命的活力。关于这种语声在东方语言的理解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至为明显的是，这种语声披露了语言的起源。还有什么比含糊的自然音更难以写下来呢？既然语言距其起源越近，发音就越不清晰，那就只能这样来推论：语言的二十四个字母并不是由某种超人的力量发明的，也并不是同语言一道问世的；这些字母事实上很晚才出现，仅仅是一次不太成功的试验的结果，目的在于设立一些便利记忆的标记；语言并非脱胎自神的语法书上的字母，而是源于人类自由的器官所发出的野性的声音。假如神是从这样一些字母中发明出语言，并借助它们将语言赋予最早的人类，那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因为它们其实是

世界上最不完善的字母，丝毫不反映语言的精神，而且它们的全部构造显然也表明，它们并不打算反映语言的精神。

对于上述字母假说，实际上不值得作太多的说明。但由于这一假说流布甚广，且受到种种粉饰，我便不得不揭穿其荒谬性。现在让我们回到下述思路上来：

我们的自然音的使命是表达激情，因此不用说，这种音也就成为一切感情的要素！看到一个不停地抽搐哀泣的受难者或一个濒临死亡、尚在呻吟的人，甚至看到一头痛苦地挣扎着的牲口，有谁能不从心底里喊一声"啊！"？难道世界上会有那么毫无感情的野蛮人吗？一种动物敏感的心灵之弦甚至会为它类动物而震颤。心灵的弦振动越是和谐，动物个体相互之间的感受就越强烈：它们的神经达到同一的紧张程度，它们的心灵达到一致的情调，从而以机械的方式生成同样的感受。一个人要有多么坚硬的神经，多么强大的力量，才能把自身的感觉通道堵住，对眼见的一切装聋作哑！狄德罗以为，对于一只蒙难动物的泣诉，天生的盲人不如正常人那么敏感。[①]我却相信，在某些场合恐怕恰恰相反。的确，盲人看不到一只苦苦挣扎的动物所表现出的感人的一幕，但所有的事例都表明，正是由于他看不见，他的听觉才更加专注集中，能够更加深刻地体察对象。他是在黑暗中，在他那永恒的夜的寂静之中倾听，每一声泣诉在他听来都像一支射向心头的箭，更显内在，更为深刻！而且，他还可以利用他的触觉，慢慢地抚摸抽搐着的动物，完整地体会到这一机器(Maschine)受到的折磨；惊恐和痛苦传遍他的肢体，他的内在神经组织感觉到，它正在崩溃，走向毁灭。于是，他发出了象征死亡的哀叫。这正是自然语言的表现！

有教养的欧洲人也好，没有教养的欧洲人也好，在世界各地都

① 见狄德罗《关于盲人的一封信》，1749年出版于伦敦。——原注

被土著居民野性十足的哀哭深深地打动过。莱瑞从巴西报道说[①]，他手下的人竟被美洲人表达爱情和友谊的那种无拘无束、激情横溢的喊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北美人打仗和行巫事时唱的歌，直让人心惊胆战，沙勒瓦等人说[②]，他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来描述这种感觉。以后我们不但要指出，古代的诗歌和音乐充满了这类自然的音，而且要更多地从哲学上解释自然音的功用。例如，希腊人最早的歌舞，古老的戏剧乃至一般的音乐、舞蹈和诗歌都充分利用了这种野性的自然音。甚至在我们今人当中，虽然理性往往压倒感觉，人为的社会语言取代了自然音，但是，演说者慷慨激昂的陈词，诗人如泣如诉的表达和巫师念念有词的占卜难道不是常常在模仿，都很接近于这种自然的语言么？在群集的民众中间，什么才能引发奇迹，什么才能打动他们的心，震动他们的灵魂？是抽象的言辞和形而上学的表述么？是比喻和形象么？还是艺术和冷冰冰的信念？在尚未彻底陶醉之前，他们身上一定发生了许多事。上面说的种种因素，都起了作用么？特别是彻底陶醉的那一片刻，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完全是由于另一种力量的作用！那就是自然的音，加上丰富的表情，简朴的乐调，突然的转折，低沉的话音，——除此以外我还能举出什么来呢？在儿童身上，在感觉发达的民族中间，在女人和敏感的人当中，以及在病人、孤独的人、悲伤的人当中，这些东西比起发自上苍的轻声细语的真理来，所起的作用要大过千百倍。我们人类是在童年时代第一次听到这些语声，看到这类令人恐惧的浪漫手段等等的运用，我不知道，那时候它们把多少畏惧、狂喜、惊恐、欣慰之类附带色彩注入了我们的心灵。

① 莱瑞(Jean Léri, 1534—1611)，法国新教徒，1556至1558年间在巴西传教，曾作《巴西游记》。——译注

② 沙勒瓦(Pierre François Xavier de Charlevoix, 1682—1761)，耶稣会教士，曾作《新法兰西史话》(巴黎，1744年)。——译注

当一个词发出声来时，这些附带的东西就像是一群精灵，从心灵深底一下子全都庄严地涌现出来；它们使词的纯粹和明确的意义变得含混，只有脱离这些附带物，词的意义才能够被把握。结果，词不见了，发出的是感觉的声音。于是，我们被含混的感觉所征服，轻率的人便开始惊恐地战栗——不是因为思想受到触动，而是为音节、为童年时代的声音所感染。这正是演说家和诗人的魔力所在，它把我们再度变作儿童。在此，毫无疑问，基本的规律是：感觉的声音会在具有同样情感的生物身上引发同样的声音！

如果我们愿意把这种直接的感觉的语声称为语言，那么我认为，它的起源就是非常自然的。这种起源非但谈不上是超人的，而且显然是动物的。这就是一架敏于感受的机器的自然规律。

有些哲学家（哲学家即寻求明确概念的人）曾经想到从上述感觉的喊叫中寻找人类语言的起源。对此我无法掩饰自己的诧异：人类语言同这种喊叫难道有任何相像之处吗？所有的动物，除了哑口无声的鱼类外，都会发声以表达感觉，可是没有一种动物，哪怕是最发达的动物，因此就能接近人类语言最起码的开端。人按照自己的愿望构成、修饰和组织这些喊叫，假如不是知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些声音，我不明白，一种任意的人类语言何以会根据上述自然规律产生出来。儿童就像动物一样，发的是感觉的音，但他们从成人那里学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啊！

修道院院长孔狄亚克便是这些哲学家中的一个。他的那本书从一开始就把所有这类声音当作发明语言的前提，而且，在每一页上我都发现，他描述了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一种正在形成的语言中的现象。[1]他的假说的基础是"两个孩子，在他们还不会使用

---

① 孔狄亚克(E.B. de Condillac, 1715—1780)，法国哲学家。他在《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的第二卷里讨论了语言起源问题。——译注

任何符号之前就孤立地生活在一片荒漠之中"。可是,这两个孩子一定会死去,或是变成动物;在荒漠里,他们维持生命和发明事物更加困难;任何出生几周的婴儿都离不开自然符号和知识的运用。孔狄亚克提出这一假说,是想探索人类知识的自然进程,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假定,为什么要把那么不自然的、自相矛盾的材料当作立论的基础呢?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回答。而我则想证明,解释语言的起源不能依靠这样的材料。他的两个孩子是在不懂任何符号的情况下相遇的!请看他在书里怎么说:自一开始,"他们就已经处在相互交际(Kommerz)之中"(见其著第二卷,§2)。然而,唯有通过这种相互交际他们才学着"把思想与感觉的喊叫联系起来,这类喊叫是思想的天然符号"。通过交际来学习感觉的天然符号吗?学习把什么东西与思想联系起来吗?可是,在相处的第一刻,连最愚蠢的动物都有的知识还不具备,这两个孩子就已经懂得交际,会学着把一定的符号同思想匹配起来吗?——我可真被弄糊涂了。"由于类似情景的重复出现(§3),他们便习惯了把思想跟感觉的发声以及身体的各种信号联结起来。这样,他们的记忆就得到了锻炼。渐渐地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想像力,并且终于能够通过思考来处理过去只凭本能去做的事情。"(可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孩子在开始交际前是什么也不会做的。)——我还是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符号的运用使得心灵的作用扩大了(§4),而这反过来又使符号变得完善。所以,是感觉的喊叫使心灵的力量发展起来(§5),是感觉的喊叫促使他们形成一种把观念与任意的符号联系起来的习惯(§6);是感觉的喊叫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样本,引导他们去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清晰地发出新的音,培养起用名称表示事物的习惯。"我在这里重复了他的所有这些老生常谈,结果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进而，孔狄亚克从语言的这种儿童起源中推导出古代语言的韵律(Prosodie)、咏诵(Deklamation)、音乐、舞蹈和诗歌，间或插入一些很好的注释(可是跟我们的目的却毫不相干)。然后他继续说："要弄清楚人们怎样就他们最早想用的言语的意义达成一致，只须注意到一点就够了：人们已经组成一个联盟，人人都把言语与同一些观念相联结，正是在这种境况里他们把音发了出来"，等等，等等。总之，因为有了言语，才产生了言语。至此，我想已经不值得再跟着我们这位讲解者的思路走下去，因为这条思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知道，孔狄亚克对语言起源的这种空洞的解释促使卢梭在本世纪以自己的方式探讨了语言起源问题，也就是说，他对孔狄亚克的解释产生了怀疑。这个问题的讨论因此热烈起来。其实，没有卢梭，孔狄亚克的解说照样也会受到质疑。卢梭的热情(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卢梭式的飞跃[①])表现在，他从怀疑竟然走向了否认人类发明语言的可能性。是因为孔氏解释得很糟糕，因为像他那样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释吗？还是因为，从感觉的声音中永远不会产生出人类的语言，于是就得出结论，人类语言也不可能有任何其它来源？

显然，是这后一个被掩盖起来的谬论把卢梭引上了歧路，这一点我们从他自己的计划就看得出来："或许语言真的源出于人类自身，可是它是怎样产生的，何以一定要产生呢？"像孔狄亚克一样，他把自然的喊叫看作人类语言的始点。但我实在想不明白，人类语言怎么会从自然的喊叫中产生出来。也许，以卢梭的敏锐目光，能从中看出点名堂来吧。

---

① Sprung(飞跃)与 Schwung(热情)谐音，赫尔德是在取笑卢梭。——译注

至于莫白迪，他的短文我手头没有。[1] 不过，如果可以信赖某个以忠实准确著称的人所做的摘录[2]，那么我可以说，莫白迪也没有把人类语言的起源同这类动物式的发声完全区别开来，他与孔狄亚克、卢梭等人走的是同一条路。

最后是迪奥多(Diodor)和维图(Vitruv)，他们并没有推导出语言源于人类自身这样一个结论，而只是相信会如此罢了。他们以为，人类长时间里一直是喊叫的动物，生活在森林之中，然后有一天——天知道从哪里，为了什么目的——突然就发明了语言。

现在，由于大多数捍卫人类本源说的人立足点极不牢靠，而另一些人如苏斯米希又有那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科学院便想看到有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争端。关于这个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甚至科学院的某些前院士看法也不一致。

我们面对的这个宏大的题目，深深地关系到心理学和人类自然秩序，关系到语言的哲学以及一切借助语言形成的知识，有谁不想试着回答一下呢？

既然人类是已知唯一使用语言的动物，并且正是靠语言区别于所有其它动物，那么，我们的探讨应该从哪里开始才更有把握，不局限于有关动物与人的区别的经验之谈呢？孔狄亚克和卢梭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都走上了歧路，就是因为他们对动物与人的这种区别认识有误。而且两人错误还不一样，孔狄亚克把动物当成了人，卢梭则把人当成了动物。所以，我必须另外寻找出

---

① 莫白迪(Philipp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1759)，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1731 年入法国科学院。1741 年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并曾担任该科学院主席。其短文题为《论人类表达思想的不同手段》，发表于 1754 年。

② 指苏斯米希在《试证最早的语言并非源于人》一作(附录三，110 页)中摘引的莫白迪的原话。——译注

发点。

就本能的强大和可靠而言，人远远比不上动物。毫无疑问，许多动物天生的艺术能力和艺术本能在人身上是绝对看不到的。然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我们德国的一位非常认真的哲学家①，都未能成功地解释动物的这种艺术本能；同样，人类缺乏艺术本能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得到说明。我觉得，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由之出发虽然不能指望做出完整的解释，但至少可以揭示动物的本性；而且，我希望由此还能够极大地启发人类心灵学(die menschliche Seelenlehre)的研究。这个观察角度就是动物的领域。

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范围，从一出生它就进入其中，始终生活在那里面，直至死亡。奇怪的是，动物的感官越灵敏，本能越强大、越可靠，其艺术作品越精妙，它们的生存范围就越小，艺术作品就越单调。我曾经探索过这类情况，处处在在我都发现，在动物的艺术本能与它们的活动空间、环境、食物、交配、繁衍、教育、社会等等之间存在着奇特的反比关系。蜜蜂构筑蜂房的那种智慧，是埃杰莉娅无法教给努玛的②，但是，离开了蜂房，离开它们在蜂房里的限定的工作，蜜蜂就什么也不会。蜘蛛造网的艺术，堪与密涅瓦的艺术一比高低③，可是蜘蛛的艺术就限于在一张网的空间里发挥，那便是它的全部世界。昆虫的本领多么令人吃惊，作用范

① 指雷玛路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 1694—1768)，写有《关于动物本能特别是其艺术本能的一般考察》，1760年出版于汉堡。——译注

② 埃杰莉娅(Egeria)，罗马神话中的司泉女神。努玛，即努玛·庞皮琉斯(Numa Pompilius)，传说中的第二位罗马王，埃杰莉娅是他的妻子，曾经教给他宗教礼仪。——译注

③ 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注

围却多么狭小！

相反，动物的活动和行为越多样化，注意力越分散于一系列事物，生活方式越不稳定，总之，它们的领域越大，越丰富多彩，我们看到，它们的感性就分布到越多的方面，因此也就越弱小。这里，我觉得已无必要举例证明这种贯穿着一切生命体的进程的重要关系。我把寻找证据的工作留给每一位读者，或者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先让我们把讨论继续下去：

看来，动物的艺术本能和艺术能力很可能要用它们的想像力(Vorstellungskräfte)来解释。除非我们认为，这一切是盲目发生的(雷玛路斯就主张盲目决定论，这种论断对哲学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如果极为精细的感官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和一种单调的活动方式内，除此以外对整个世界都视而不见，感官就不得不拼命强化！如果想像力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并且具有相匹配的感性力量，想像力就不得不尽量施展！最后，如果感官和表象(Vorstellung)都针对一个目标，由此生成的除了本能外，还会是什么？不同种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动物，其敏感、能力和本能的起因就在于此。

于是，我可以确立这样一条定律：动物的敏感、能力和艺术本能的强弱程度，与它们作用范围的大小和丰富程度成反比。

当然，人的生存范围决不那么单一狭窄，等待着他的工作决不止一项。他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有许许多多任务要完成。

他的感觉和机体组织并不只在一个方面特别发达，在所有的方面他的感官都起作用；当然，就每个具体的方面来说，感官也就更弱更迟钝。

他的心灵的力量广及整个世界，他的想像并非仅仅针对一个方向，因此他就没有任何艺术的本能、艺术的技巧，同时很自然地也就没有动物式的语言。

我们把有些类动物的发声称作动物语言。这种发声若不能简单地视为一台感知机器发出的声音的话，应该如何定义呢？只须把我在上面已阐述的要点综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条定义：动物语言也即一种动物的成员之间达成的同一认识，这种认识是含混的、感性的，目的在于协调一定范围内的活动。

所以，动物的领域越小，就越不需要语言。感官越灵敏，想像越专注，本能越强大，它们对可能会有的发声、符号和表达就越难以认可。动物只是一种有生命的机械(Mechanismus)，在它们身上，负责听和说的是本能。为了能被知觉到，它们只需要讲很少的话。

生存范围最窄小的动物甚至连听觉都没有。在它们的世界里，触觉、嗅觉或视觉就是一切；只有一幅单调的画面，单一的线条，千篇一律的活动。所以，动物只有极少的语言，或根本没有语言。

反之，动物的生存范围越大，感觉分工越细……够了，难道我还有必要重复这一切吗？由于人的出现，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再会说话的动物，发声再丰富的动物，其语言也不适用于人类活动，不能满足人类最起码的需求！对于人的多种多样的欲望，对于他的分散开来的注意力，对于他那已经变得愚钝的感官，动物的那种朦胧的语言有什么用呢？对人来说，动物的语言既贫乏又含混，既不足以表达事物，也配不上他的官能，换言之，这根本不是人类语言。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一种生物独有的语言，必须适合于它的需求和活动的范围，适合于它的感官的组织，适合于它的想像的方向和欲望的大小，除此外，语言还能是什么样子？哪一种动物的语言是适合于人类的？

其实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多余的。人有没有这样一种语言(除了前面说到过的机械的语言外)，像所有动物那样本能地运用于一

定的领域？回答很简单：没有！这个简单的回答也是最终的回答。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任何动物的语言都表达了如此强烈的感性的表象（Vorstellungen），以致这类表象变成了本能。它们的语言，连同感官、想像、本能等等，是生来俱有的，绝对自然的。蜜蜂会嗡嗡叫，如同它会啜吸花粉一样；鸟儿会唱歌，如同它会筑巢一样。可是人生来怎么说话呢？根本就不说话！因为人不像动物那样行动，他很少或完全不依赖于十足的本能。在这里，我把一个新生婴儿发出的那种敏感的机械的喊叫排除在外；不算这种喊叫，婴儿就是哑巴。他既不用声音表示想像，也不用声音显示本能，而所有的动物却都会这样做。如果把他放到动物中去的话，那他就是自然界中最孤苦伶仃的孩子。全身赤裸，贫困孱弱，羞怯胆小，无力自卫。而最糟糕的则是，他被剥夺了任何生活的导向线索。他的感觉那么分散，那么迟钝，他的能力那么弱小，那么定向不明，他的本能那么不专一，那么慵懒乏力，显然，他生来就有成百上千种需求，注定要生活在一个广阔的领域里。而与此同时，大自然又把他遗弃在那样一种境地，使得他生来就连一种能够表达他的需求的语言也没有。不，这样的矛盾不会是自然的安排。在人的身上，肯定潜藏着另外一些并非本能的力量。人生下来喑哑无语，但是……[1]

[1] 手稿中接着还有一句："但是，他或许会自己创造出语言！……"——译注

第　二　篇

但我不想一下子跳得太远。我并不认为人突然就有了新的力量，一种所谓任意的 Qualitas occulta[①]似的语言创造能力。我只想接着上面指出的人的缺陷和毛病继续讨论。

这种缺陷决不可能是人的种属特征，除非大自然对他就像最残酷无情的继母一样不公，要知道，自然对于每一种昆虫都是一位最最慈爱的母亲。她给予了每一种昆虫它正好需要的东西：适合于想像和本能式的想像的感官，必要的语言器官，以及理解这种语言的器官。而在人身上，他的感官和需求，他的力量和他所在的活动范围，他的器官和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协调。看来，我们一定忽略了某个中间环节，缺了它就无法说明这样的不协调。

假如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环节，那么，根据自然的类推，它就应该是人所独有的东西，是人类种属的特征，而不偏不倚的理性就要求我们把这一发现看作人的自然禀赋，它对于人就像本能对于动物那样重要。

的确，如果我们正是在这一种属特性中找到人类缺陷的原因，并且恰恰是在这类缺陷的关键的一点，即完全没有艺术本能上面找到语言代之而起的根源，那么，这种一致关系便是一个发生上的证据，证明人类真正的发展方向就在于此；同时也证明，人类高于动物并不是程度有别，而是种属不同。

---

① 拉丁文："潜藏的力量"。——译注

如果在这一新发现的人类特性中，我们甚至找到了必要的遗传学的根据，可说明人类这一新型生物的语言的产生（就像我们在动物的本能中寻找每一种动物语言的直接原因那样），那么，我们就完全达到了目的。于是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请看，我不是从任何任意的或社会的力量，而是从动物的一般经济原理（Ökonomie）出发来进行推论的。

由此我们便看到，虽然在一小块土地上，在一件工作中，在一定空间的生活里，人的感官远不如动物的感官灵敏，但正因为这样，人才获得了一个长处，即**自由**。正因为不定向于一个方面，人的感官才成为更一般化的、面向整个世界的感官。

由于人的想像力并非仅仅针对蜂房的构筑和蛛网的编织，在这方面当然比不上动物的艺术能力，但因此，人的想像力便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人做事情，没有一件能做得完美无缺，但是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他可以试着去做许多事情，并且可以不断地自我改进。没有一个思想是自然的直接产品，正因为此，思想才可以由人自己来生成。

本能完全是由感官的组织和想像的领域造成的，而不是盲目决定的。人不得不抛弃本能，但因此他就获得了若干发展的可能性。由于他可以广泛地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方面，他就享有充分的自由，能够为自己开辟一个反映（Bespiegelung）的领域，能够自我观照（sich in sich bespiegeln）。这样，人就不再是大自然手中的一台没有缺陷的机器，而是以他自身为行动的目的。人的力量所具有的这种倾向（Disposition），有人称为“知性”（Verstand）或“理性”（Vernunft），也有人称为“意识”（Besinnung）[①]，等等；只要不把

① Besinnung，誊清稿中为 Reflexion。——译注

它们理解为分隔开来的力量，不把它们仅仅看作动物力量的高级形式，这些名称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人的所谓理性，就是一切人类力量的总和形式，就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质（erkennende Natur）、认知本质和意愿本质（wollende Natur）的结合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是与某种机体组织相联系的唯一积极作用的思维力量。理性于人，恰似艺术能力于动物；在人称为自由，在动物则称为本能。差别不在于程度高低或力量强弱，而在于全部力量择取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不管是莱布尼茨的信徒还是洛克的信徒，不管是塞奇[①]还是诺瓦尔（Knowall），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不会不同意以上所述的一点：一切的一切取决于人类的独特属性。

所有把问题弄得一团糟的人，都为错误的观念和含混的概念所缠绕。人们以为，理性是心灵中的一种崭新的、完全割绝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没有添加到动物身上，而是添加到了人身上，成了人独有的属物；所以，理性似乎是一座楼梯的第四级台阶，在它底下还有更低的三级，它应该被独立起来考察。这种说法简直是哲学上的一片胡言，大概只有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才说得出来。照这样看，我们人和动物心灵的所有力量及其作用就只是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由于我们的精神过于羸弱，不能够一下子把握这些力量，就只好把它们分割开来；它们像一本书分成章节那样被分成若干部分，但这不是因为它们在自然中也分散孤立地作用，而是因为对一个缺乏经验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做最容易把它们解释清楚。我们把这些力量的一定活动分别用一些名词来表示，如“机智”（Witz）、“聪明”（Scharfsinn）、“幻想”（Phantasie）、“理性”，等等，这

① 塞奇（Edward Search），原名 Abraham Tucker，这里指其著 *Light of Nature Pursued*。——译注

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所能发生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精神行为，"机智"或"理性"只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因为，我们在这一行为中主要看到的是我们称之为"机智"或"理性"的抽象活动，例如观念的比较或解释。事实上，不论在何处，心灵的作用都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假如一个人哪怕只有一次完全像动物那样思考，那他就根本不再是人，不再有人类行为能力了。一个人哪怕只有一瞬间不具理性，那么他一辈子都是不可能运用理性来思维的，除非他的整个心灵、整个本性都起了变化。

因此，正确的理解是：理性能力乃是人的种属特性，它与我们所想像的不同，是人身上相对感性和本能而言的全部思维力量。按照这一理解，我们就可以利用所有前述类比，得出唯一可能的结论，那就是——

假如人有动物本能的话，就不会有我们如今称为理性的那种东西；因为这类本能必定会把他的力量强行导向一个盲目的方向，使得他没有一寸自由思考的领地。所以——

假如人有动物的感官，也就不可能有理性，因为，动物感官的敏感性以及由之促发的大量想像必定会扼杀一切冷静的悟性。当然，大自然是懂得经济规律的，它的上述有规律的联系反过来应该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动物的感性和封闭性使得它停滞在一个方向上，那么，另一种生物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就不仅能够认识、希求和行动，而且知道它自己在认识、希求和行动，因为它的积极的力量以更精巧的组织形式、在更大的空间中更明白地显示了出来。这种生物就是人。为避免与自身的理性力量等等相混淆，我们将把人的这种天生的禀赋称为悟性(Besonnenheit)。"感性"和"本能"，"幻想"和"理性"，所有这些词实际上只是定义了一种统一的力量，在这一力量中，一切对立都相互抵消了，所以，根据上述联系规

律——

既然人不是本能的动物，由于他的心灵具有更自由地作用的积极力量，他就必须是一种能悟识的生物（ein besonnenes Geschöpf）。——要是我们把推论再继续下去，我可以预见到有人会提出一些异议。

如果理性不是分割开来、单独作用的力量，而是人类特有的力量总和的一种方向，那么，人正因为他是人，从一开始就必须具有理性。正如昆虫自始至终表现出昆虫固有的一切，在儿童最早的思想中，悟性肯定已得到体现。这一点，许多研究者都未能意识到，因此我现在正在写的这个题目才会招致那么多极其肤浅、令人反感的异议。他们之所以不能认识到，是因为他们的思路错了。难道理性地思维一定是指用成熟的（ausgebildete）理性思维吗？婴儿运用悟性思维，难道就意味着他像讲坛上的论辩高手或内阁里的政治家那样善于推理吗？幸运的是，婴儿对于这种乌七八糟的所谓“理性”还一无所知！但是，我们面对的异议事实上绝不否认一种积极的心灵力量本身，而只是否认心灵力量的某种相当发达或不太发达的运用，这一点人们难道看不出来吗？有哪个傻瓜会声称，一个人在出生的一刻就像经过多年的练习后那样思维呢？除非他无知到竟然否认一切心灵力量的成长。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一成长当然只能意味着一种逐渐提高、加强、丰富的运用，然而，能够被运用的东西，不是已经有其存在，将要生长起来的东西，不是已经有了一个胚芽么？一粒种子里面，不正包含着整棵大树么？既然婴儿没有巨鹰的喙和雄狮的牙齿，他就不可能像巨鹰和狮子一样思维；如果他像人一样思维，那么，悟性——即把他的所有力量限定在一个主要方向上的那种能力——自始至终就是他命中注定的属物。理性在他的感性之中表现得如此真实，显然，创造了人类心智（Seele）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自一开始便已看到了生命活动

的整个系统;这就好像一个从事测算的人,根据一定的类型,可以从等差序列的一个项推知全部的比例关系。

"但是这样看的话,理性在初始阶段与其说是现实的力量,倒不如说是潜在的理性能力(Vernunftfähigkeit [reflexion en puissance])吧?"[1]这个附带的条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即使不存在阻碍,纯粹的能力也不是力量,而仅仅是能力,——可是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等于是说,雕塑形式仅仅构成形式,而本身不是任何形式。如果能力本身不表现出最低程度的积极能动的倾向,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能力这个词就只是书本上的一个抽象而已。我们将会看到,最近有个法国哲学家把"reflexion en puissance"这个虚幻的概念耍弄得叫人眼花缭乱[2],然而他翻来覆去摆弄的其实只是一个漂亮的气泡,不知哪天就会突然在他面前炸裂。如果理性能力是空的,什么现实的东西也没有,它怎么会进入心灵呢?如果在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积极的理性进入心灵,那么接下来,理性在千百万人身上何以会成为现实呢?通过运用,能力会变成力量,可能性会转变为现实性,——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如果不存在任何力量,就谈不上运用。更何况,心灵中分离存在的这两样东西,(潜在的)理性能力和理性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一样令人费解。我们看到,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被置于宇宙之中,他具有一定程度的感性和有机组织;整个宇宙从各个方面、通过所有感官加于他的身心之上,然而却是以人类的方式、通过人类的感官引发他的感知。所以,人这一能思维的生物不像动物那样完全被宇宙所制服。人拥有更自由地施展力量的空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就叫做理性力量(Vernunftmässigkeit),

① reflexion en puissance,法文,意为"思考能力"。——译注

② "法国哲学家",指卢梭。——译注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纯粹的能力么？哪里还有什么割绝开来的理性力量？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统一的、积极的心灵力量——感性一强，理性就弱；理性的成分一多，生动的色彩便会减少，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即使是人的最感性化的状态，也是人类的状态，他身上仍有悟性存在，只不过不那么明显可识罢了；而在动物，哪怕最不具感性的状态也是动物的状态，所以，其思想再明确，也没有丝毫人类意义上的悟性。好了，让我们不要再把这种文字游戏继续下去了！

很抱歉，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仅仅是为了确定和整理概念。但花这些时间是必要的，因为近年来，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已经被践踏得只剩下一片废土了。特别是法国哲学家，他们在动物和人类本性的某些表面的区别上把问题弄得一团糟。至于德国哲学家，则把大多数概念纳入他们自己的系统，并且按照自己的观点加以整理，而不顾它们在一般人的思维中造成的混乱。为了清理这些概念，我并没有兜圈子，相反，我们一下子就达到了目的！即：

当人处在他所独有的悟性状态之中，而这一悟性（思考能力[reflexion]）初次自由地发挥了作用，他就发明了语言。那么，什么是思考能力？什么又是语言？

这种悟性是人类种属固有的，语言和语言的发明也同样如此。

所以，**语言的发明对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就像他是人一样自然！**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进一步阐发这两个概念——思考能力和语言。

如果心灵的力量极度自由地发挥了作用，使得它能够从经由感官蜂拥而至的大量感觉中分离出一股流向（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把它保存起来，将注意力集中到它上面，并且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那么，人就证明了他有思考能力。许许多多飘忽不定

的图像从人的感官面前掠过，如果他能够聚拢精神，自觉地停留在其中的一幅图像上，清醒冷静地加以观察，并且能够区分出它的一些特征，确定它是这一客体而不是任何其它客体，他就证明了他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人的思考能力不仅表现在他能清晰明确地认识事物的所有特性，而且表现在他能确认一个或若干个区分特性。这种确认行为(Anerkenntnis[①])第一次发生，就形成了明确的概念，这也是心灵作出的第一个判断。那么——

确认行为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发生是由于，人必须区分他明确意识到的特征。好啊！让我们向他欢呼一声："发现了！"(εὕρηκα!)这第一个被意识到的特征就是心灵的词！与词一道，语言就被发明了。

假定有一只羊在人的眼前经过，在人看来，这幅图像就与呈现在任何其它动物眼中的图像完全不同：不同于饥肠辘辘、东张西望的野狼眼中的图像，也不同于嗜血成性的狮子眼中的图像；狼和狮子的习性根源于精神深底，感性和本能把它们彻底征服了。它又不同于一头正在发情的公羊眼中的图像，这公羊感觉到的仅仅是享受的对象，因此仍然为感性和本能所压倒；当然也不同于任何一只对这羊儿漠不关心的动物眼里的图像，它对羊儿视而不见，因为本能把它引向了其它对象。可是对人来说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图像。一旦他需要认识那羊儿，就没有哪种本能会妨碍他这样做，也没有哪种感官会强迫他过于接近或远离对象。那羊儿就站在那里，他的感官告诉他：它是白色的，柔软的，毛茸茸的。他那练习着思考的心灵在寻找一个特征——这羊儿在咩咩地叫，于是，心灵便找到了特征。内在的意识开始发挥作用。给心灵带来最强烈印象的，正是这咩咩的叫声，这叫声从所有其它观察、触摸到的性质中

① 参考英译：apperception（知觉，统觉）。——译者

挣脱出来，深深地楔入心灵，并且保留在心灵之中。现在，这羊儿又来了：白色的，柔软的，毛茸茸的；人的心灵看到了，感觉到了，开始思考，寻找特征，——羊儿咩咩地叫了，于是心灵终于又认出它了！“噢！原来你就是那咩咩叫的！”心灵内在地感觉到了，以人的方式认识到了这一切，因为它明确地认识和命名了一个特征。会不会不那么明确呢？假如那样的话，心灵就什么也知觉不到，因为没有任何感性或本能可以补救心灵含混不清的缺陷。会不会识别不出特征呢？假如那样的话，任何感性的生物都不可能感知到自身之外的东西，因为它始终必须压抑其它感觉，必须通过第三个东西去认识两个东西之间的区别。总之，只能是借助一个特征。但这个特征作为内在的记号（Merkwort），又是怎样的呢？羊儿咩咩的叫声由人的心灵知觉为羊儿的标志，并且由于这种意识活动而成为羊的名称。人从这叫声上识认出羊儿，叫声是一个听到的符号（Zeichen），心灵通过它想到一个明晰的观念。这不正是词么？整个人类语言不正是这样一些词语的集合么？即使他从未有机会把这个观念传递给另一生物，从未想要发出或不能够发出这一意识到的特征，他的心灵仿佛也在内部咩咩地叫着，因为心灵已选择了这个声音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当心灵凭记忆识认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在它的内部就又咩咩叫了起来，——于是语言就发明了！语言的发明那么自然，对于人那么必不可缺，就像人只能是人一样。

绝大多数讨论语言起源问题的人并没有深入到唯一能够找到答案的地方。许多人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以为不可能在人类心灵中发现语言的根源。有人在言语器官改善了的发音中寻找答案，似乎猩猩用同样的器官也可以发明语言！有人以为语言发源于激情的发声，却忘记了所有动物都有这类声音，好像任何动物都能发明语言！也有人提出一种模仿自然声音的假设，似乎这种盲

目的倾向竟会把人引向思维，似乎具有同样倾向的猴子和能够维妙维当地模仿声音的乌鸫也能发明语言！更多的人则相信一种约定论的说法，对这种说法，卢梭是最激烈的批评者。的确，什么叫天然的语言契约？难道还有比这更莫名其妙的表达么？所有这些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荒谬说法却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真理！但我不希望事情永远如此继续下去。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观点，嘴巴的构造与语言的发明并没有关系，因为人即使一辈子喑哑无语，也仍然是人，只要他在思考，语言就存在于他的心灵之中！感觉的喊叫也不起作用，因为发明语言的不是一台呼吸的机器，而是一个会思考的生物！心灵中也绝没有模仿的原则，对自然的某种模仿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服务于我们在此要解释的唯一目的。至于社会的任意约定和协调，更没有道理。森林中孤寂独处的野人，哪怕从不说话，也必须为自身发明语言。这是他与他的心灵之间的协约，一种就像人只能是人那样必然的协约。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何以人类心灵能发明语言，而我觉得，何以人类心灵在没有嘴巴和社会参与的情况下也必须能够发明语言，这才是真正令人费解的问题。

要把语言的这一起源解释清楚，最好是借用反对者的看法。语言神授说的那位最彻底、最全面的卫道士[①]，几乎可以说就是地道的人类本源说的捍卫者，因为别人仅仅浅尝即止，而他却深入到了表层现象的下面。他已处在证明的边缘，他的主要论据只须稍加修正，就可以用来驳难他自己，从而证明他所反对的观点，即人发明语言的可能性。他本可以证明，语言的运用对于理性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假如他这样做了，毫无疑问他就证明了这一点：理性的运用属于人的自然本质，语言的运用也同样如此。不幸的是，

---

① 指苏斯米希。——译者

他没有就此作出证明。他只是花了很多力气去证明，诸如注意、思考、抽象等大量精微复杂的行为若不借助于心灵所依赖的符号，是不能有效地发生的。可是，像“不能有效地、不易于、不大可能”这类说法是无助于彻底澄清问题的。我们人凭藉有限的抽象力量，不借助感性符号，当然只能进行有限的抽象活动，而别的动物没有这种符号，却可以有更多的思维；但由此至少还不能得出结论，没有感性符号的话，任何抽象活动都不可能进行。事实上我已证明，假如不把事物的特征先区分出来，不要说无法有效地运用理性，就连最低程度的理性运用、最简单的明确概念以及人类悟性最基本的判断也毫无可能。因为两个事物之间的区别唯有通过第三个事物才能得到认识。而正是这第三个事物，即区分的特征，成了心灵内在的记号，所以，语言是从理性最初的行动中极其自然地生成的。

苏斯米希想说明，理性较高级的运用不能没有语言的参与，为此他引用了沃尔夫的话，但沃尔夫在这类场合也并不肯定，只是说大概如何。[①]不管怎么说，这跟我的推论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于语言构造最初的形成来说，理性的高级运用（例如见于思辨科学的那种运用）毕竟不是必需的。苏斯米希先生的这一很容易证明的论点也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哪怕是最初始、最低级的理性运用，没有语言也不可能发生。这一点我相信已经被我证明了。可是苏斯米希接下来的推论是，“没有人能够自行发明语言，因为理性是发明语言的必要条件；而同时，在理性出现之前，语言就已经不得不存在了。”——我把这个永动陀螺止住，仔仔细细观察了一番，从中看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关系：Ratio et oratio! [②]如果人没

① 沃尔夫（Christian Freiherr von Wolff，1668—1754），德国哲学家。——译注

② 拉丁文，意即“理性和语言”。——译注

有语言就不可能有理性，那么很明显，语言的发明对于人就像理性的运用一样自然、古老和初始，一样为人类本质所固有。

我把苏斯米希的推论方式称为一个永动陀螺，因为他可以把这陀螺转起来对付我，我也可以把它转起来对付他，这东西就可以这样一直不停地旋转下去。没有语言，人就没有理性，而没有理性，也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和理性，人就不能接受神的教授，而没有神的教授，他当然也不会有理性和语言。这样的推论会把我们导向何方呢？如果人没有理性，他怎么通过神的教授来学习语言呢？而没有语言的话，他连最起码的理性运用也达不到。这么说，人在有语言和能够获得语言之前，已经应该拥有语言了；或者说，在还没有最起码的理性运用的时候，人就已经具有理性了。正如苏斯米希先生自己也承认的那样，为能听懂神所教授的第一个音节，人必须已经是人，即能够清晰地思维，而当人初次形成清晰的思想时，语言业已存在于他的心灵之中；换言之，语言不是由神来教授的，而是由人自身的手段生成的。我知道，人们说的这种神的教授实际上多半是指父母把语言教给孩子。但是请想一想，这跟所谓神的教授能同日而语么？如果没有孩子本身自始至终的创造活动，父母是永远教不会他们说话的。父母只是用一定的词语符号让孩子注意到事物的区别，所以，父母并不能代替孩子思维，而是通过语言来启发和促进孩子的理性运用。也许有人出于其它原因假定超自然推动力的存在，但这跟我的目的毫不相干。即使存在这种推动力，上帝也根本没有为人发明语言；相反，人必须始终运用自身的力量为自己找到语言。要想能够从上帝的嘴里接受第一个词，即理性的区分标记，就需要具备理性；要把这第一个词作为真正的词来理解，人就必须运用他的意识(Besinnung)，就好像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词的存在。于是，我的对手使用的武器全都对准了他本人。为了学习神的语言，人必须实际运用理

性；而一个正在说话的孩子，只要他不是像一只鹦鹉那样毫无思想地重复一些词，也始终在运用理性。难道像鹦鹉那样学话可以被认为是神的尊严的学生该干的么？假如人就是这样学习语言，我们的理性语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相信，假如我的那位可敬的对手还健在，他会明白他提出的异议经过进一步的解释后，可以成为最有力的反证。也就是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书里面搜集起来的材料足以推翻他的理论。假若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那么闪烁其辞，说什么存在着"一种还称不上是最低限度理性的理性能力"。站在我们的立场上，马上就可以发现矛盾。竟然会有一种连最起码的理性运用也没有的理性生物，或一种没有语言，却能运用理性的生物！一种不具理性的生物，却能为理性所教化；或一种能够教化的生物，却不具有理性！一种不知如何运用最简单的理性的生命体，然而却是人！一种不能依靠自身固有的力量使用理性的生命体，但通过超自然的传授却能学会自然的运用！一种根本不属于人、即并非由人类力量生成的人类语言，或一种完全属于人的语言，没有它，人的任何固有的力量都无法表现出来！一方面，它使人得以成为人，另一方面，人没有它仍然是人；在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还不能自我表现之前，就必须自我表现，等等，等等。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理性和语言是现实性而非可能性，一旦我们把"能力"（人类能力、理性能力、语言能力）这个词的虚幻的外衣剥掉，上述种种矛盾就暴露无遗了。

有人会问，"与熊生活在一起的野孩子，他们也有语言么？他们难道不是人么？"然而，首先，如果人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他就会退化！拿一块石头压在一株植物上，这植物岂不会长歪么？就本性而言，它是向上生长的植物；它弯曲着把石块缠绕起来，不也表明它有直向生长的力量么？其次，即使是这种退化的可能，也显示

了人的本性：正是由于人没有动物的强大本能，由于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有不那么强的能力，总之，正是由于他是人，他才能退化。假如他没有那么灵活的发音器官和四肢，他能学会像熊一样咆哮和爬行么？有没有别的动物，猴子也好，驴子也好，能够学到这种程度呢？人能变得那样不自然，恐怕他的人类本性也起了作用吧？

再者，不管怎么变化，人类本性总归得到保留。他恐怕并不完全是像熊那样吼叫、爬行、攫食、嗅闻，而是一个跌跌撞撞、结结巴巴的熊人，即一个既非熊也非人、过着双重生活的生物。他的皮肤和脸容，他的脚和舌并没有变得接近于熊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的心灵本质会起变化。他的理性受到感性和类似于熊的本能的压制，但它仍然是人类的理性，因为那种本能毕竟跟熊的本能不同。事情的发展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旦障碍不复存在，我们的熊人回到了同类当中，他不是就能学会更自然地直立行走和说话么？就像他曾经学会不自然地爬行和吼叫一样。爬行和吼叫这样的行为他只能学得接近于熊，而直立行走和说话他则能够在短时间内完全以人的方式学到。试问在他从前的森林兄弟中，哪一个能这样学习？熊无法这样学习，因为它不具备为此所需的机体和心灵的禀赋，那么，熊人即使处于退化状态，一定还保持着这种禀赋。假如熊人只是通过教授和习惯学会直立行走和说话，为什么熊做不到？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性和人性，又怎么能把理性和人性教给他呢？难道可以说，使眼睛具有视力的是一根针，因为它挑去了眼中的白翳？——说到底，从这种极不自然的事例我们可以推导出关于自然的什么结论呢？我们应该承认，虽然这是很不自然的事例，却恰恰证明了自然的规律！

众所周知，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全部假说就是以上述退化事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对语言源出于人本身有所怀疑。当他

批评有关语言产生方式的错误解释时，他是言之成理的。然而他也被前面说过的那一难点迷惑住了，以为理性应该是发明语言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其实已经被推翻了，而且根据卢梭本人的论述也不能成立。一方面，卢梭只让他笔下的那个幻影，那个自然的人或退化了的生物拥有[潜在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这个自然的人又生来就如此完美，竟能从一切动物种类那里学到东西。凡能给予他的，卢梭都给了他！比他需要的还要多！这个自然人的第一个思想是："瞧，这是动物固有的，狼嗷嗷叫唤，熊发出咆哮。"这个思想当然已是真正的思考。如果与他的第二个思想"而我却与它们不同！"联系起来，就更可见思考行为的现实性。接下来是第三、第四个思想："以我的本质，恐怕也做得到！我或许可以模仿，我打算模仿，通过这样做我的种属会更加完善！"这是一系列多么细腻、多么连贯的思考活动！可是，我们的这个自然人要想形成哪怕只是初始的思想，也必须拥有心灵的语言，并且具有一种造就了说话艺术的思维艺术。猴子总是在看样学样，但它从不有意识地模仿，从不通过悟性对自己说："我打算模仿，使我的种属变得完善！"假使它这样做过，哪怕仅仅一次主动地进行过模仿，有选择有意图地将模仿固定为种属的行为，假使它曾有一次能够做出一个思考，那么在同一瞬间它就不再是猴子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它仍是猴子的样子，嘴里也发不出一点语声，却已是一个内在地说话的人，迟早会发明出外部语言。然而，有没有一只猩猩，用它那种像人一样的发音器官说出过一个人类语言的词呢？[①]

的确，在欧洲我们会听到一些黑人兄弟这样说："是啊，或许——只要猩猩愿意说话，或者到了必须说、能够说的时候，它就会

① 在论文的修订版中，赫尔德根据堪伯(Peter Camper)的解剖学研究成果，修正了关于猩猩的发音器官的看法，"像人一样的"改为"类似于人的"。——译注

说话!"或许能说话！我也希望最好如此。可是，动物的历史足以证明，这样的假定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已说过，发音器官对于它的能力并不构成障碍。①猩猩的头部从外到内都接近于我们人类，但它曾经说过话么？鹦鹉和八哥学到的人类语声够多的了，但它们曾经用人类语言的词思维过么？词的外部音响在此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指的是词的内在而必要的发生，这样的词是一个明确的意识行为的标记。难道有过一种动物以某种方式说出过这样的词么？思想的线索和心灵的对话始终需要得到标示，想要表达的似乎都应该得到表达。但哪一种动物曾经这样做过呢？狐狸千百次按照伊索的安排行动，但它从未像伊索那样自主地行动；哪怕只有一次能够这样做，狐狸就会发明它的语言，就可以像伊索谈论它那样谈论伊索了。狗学会了听懂许多话和命令，但不是把它们当作词，而是当作与手势、行为相联结的信号来理解；假如它能理解人类意义的词，那么它就不会甘当仆从，就能为自己创造艺术、建立共和国、发明语言了。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考察语言起源时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犯两个极端的错误。一个极端是把语言完全看作超人的东西，惟有上帝才能发明它；另一个极端是把语言看得一点人类性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只须付出努力，似乎都能发明语言。其实真理仅仅在于一点，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握全局——为什么任何动物都不能发明语言，为什么语言不该是神的发明，为什么人作为人，能够而且必须发明语言。

关于语言源于神的假说，我不打算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再继续讨论，因为这一假说的谬误在心理学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为了理解

① 从堪伯(Peter Camper)对猩猩的解剖研究来看，我这里的说法是不够谨慎的(请参看他的短文集的译文)。不过在我写作的时候，这还是解剖学家们的普遍观点。——修订版原注

奥林匹亚诸神的语言，人必须拥有理性，因此也就必须拥有语言。至于动物语言的细节，我更不想深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都有天渊之别。在此，最遗憾的是我不能就某些线索展开讨论。这些线索可以把我们的思路从语言在人类心灵中的发源引向一系列其它领域——逻辑学、美学、心理学，特别是引出下述问题："如果没有语言，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思维？借助语言，他可以进行什么思维？"这个问题实际上几乎跟所有的学科都有关。不过这里我们还是满足于确认，语言乃是我们人类种属外在的区分特征，正如理性是人类的内在区分特征一样。

在许多语言里，"词"和"理性"、"概念"和"词"、"语言"和"起因"是用一个名称表示的，这种同音现象反映出语言的全部发生根源。在一些东方国家，把确认一事一物称作"命名"（Namengebung），这已成为那里的语言最普通的特点；显然，在心灵的深底，这两种行为是统一的。人被称为"说话的动物"，不具理性的动物则称为"哑巴"。类似这样的表达体现出感性特征，而希腊语的α'λογos（无语言的，无理性的）恰好把语言和理性二者综括了起来。语言可以说是知性的自然器官，对于人类心灵它是一种必要的感官，就像初民敏感的心灵离不开眼睛，蜜蜂筑巢离不开本能一样。

妙不可言的是，精神的这种崭新的、自行生成的感官，在发生之初即又成为一种交往联系的手段。除非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或者试图与其他心灵对话，否则我想像不出最早的人类思想是什么样子，也猜不出悟性的第一个判断是什么。就本质而言，第一个人类思想已准备好与他人对话。所以，我可以这样来总结：第一个区分特征对于自我是区分的符号，对于他人则是传递讯息的词。

Sic verba, quibus voces sensusque notarent,

Nominaque invenere.

——Horatius

（直到他们发明词语和名称，把感情和有声的感觉唤醒。）

——贺拉修[1]

① 引自罗马诗人贺拉修（公元前65—8）《论讽刺》第一章第三段。——译注

第 三 篇

我们已经发现了普罗米修斯在人类心灵中燃起圣火的焦点。语言与第一个区分特征一同产生，但语言要素最早的标记是什么呢？

I. 语声

契舍尔顿用盲人做的实验表明[1]，视觉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心灵形成空间、形状和颜色的概念非常不易，而要能够清晰明确地运用这些概念，不知先要进行多少次预测和尝试。显然，视觉对语言来说并非最适当的感官。此外，视觉所及的现象是冷冰冰的、哑然无声的，而其它感官更不灵敏，其知觉更含混不清。所以，自然的本性决定了语言的第一个教师只能是听觉。

我们仍用羊儿来做例子。在自然的巨大舞台上，有那么多的事物、图像和颜色从人的眼前漂浮而过，羊儿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这太难以区分了！所有的特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形状说得出来么？颜色说得出来么？人用手触摸羊儿，感觉因此可以可靠和完整一些，但还是不够清晰。这种情

① 见 Philos. Transact. — Abridgment. 也可参看他的解剖学教科书，以及凯斯特纳(Smith Kästner)的光学著作，布封的自然史著作等。——原注

按手稿中无此注。契舍尔顿(William Cheselden, 1688—1752)，英国外科医生，解剖学和医学教师，其解剖学教科书一度为西方学校的权威课本。——译注

况下，谁能把他感觉到的说出来呢？可是，听！羊儿咩咩叫了！于是，便有一个特征从五彩缤纷的画面上，从混为一团、难以分辨的感觉中挣脱出来，深深地、明确地楔入了心灵。“哈哈！”我们这位尚未长成的学习者（就像契舍尔顿实验中的盲人一样）于是会说，“现在我可以再认出你了，你这咩咩叫的家伙。”然后他又听到斑鸠咕咕地叫，狗汪汪地叫。这样就形成了三个词。他从这三个明确的观念开始构筑自己的逻辑，在三个相应的词的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词汇。理性和语言携手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大自然通过听觉向他张开怀抱。自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发出声音，而是把声音深深地灌入心灵！心灵听到了发声，马上把它抓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有声的词！

所以，人是一种善于倾听辨察的生物，生来注定要拥有语言；即使是盲人和哑巴，只要他不聋，还有感觉，就不得不发明语言。如果让他安逸舒适地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大自然会通过听觉向他展示自身，千百种他看不到的生物会同他说话；即使他的嘴巴和眼睛永远不起作用，他的心灵也不会完全没有语言。树叶沙沙作响，给这个孤寂可怜的人送来荫凉；溪水淙淙淌过，催他进入梦乡；西风轻轻吹起，拂过他的脸颊——咩咩叫的羊儿供给他奶，潺潺清泉供给他水，簌簌抖动的大树供给他果实——所有这些令人惬意的东西，都引起他认识的兴趣；即使没有眼睛和舌头，他也迫切需要在心灵中对这些东西一一命名。于是树就叫做“沙沙”，风叫做“嗖嗖”，泉水叫做“淙淙”，这样，他就有了一部小小的词汇，等待着发音器官给它们打上印记。当然，与这样一些声音相联系的观念一定是非常简陋，非常特别的！

现在，这个还不会说话的人开始让所有的感官都自由地发挥作用。他同时看到、触摸到、感觉到所有朝他的耳朵说话的东西——天哪！这是一座多么出色的观念和语言的课堂！虽然并没有

一架舞台机器让墨丘利和阿波罗从云层中降临人间[1]，但是，整个丰富多样的神造的自然正是一位语言教师，一位缪斯女神！她把所有的生物展示在人的面前，每个生物于是就都有了他给起的名称。所有的生物都对人俯首称臣，对它们来说，人就是既神秘又可见的神。每一生物都把自己的记号当作贡品献给人，而人则把它载入他用来统治世界的书，这样，将来他听到这记号，就会想起那个生物，并且也用这个记号来称呼那一生物。真理无疑是：

"人依靠知性统治自然，而知性也正是语言之母；从物体发出的声音中，人提取出区分特征，从而构成一种生动的语言。"

我在想，这个严肃的真理如果用东方民族的方式来表述的话，或许可以显得更加崇高华美："上帝把各种动物带到人的面前，看他怎么叫；他给动物起什么名字，动物就叫什么名字。"[2]这种东方式的诗歌手法表达的意思正是：人自己发明了语言！他从生动的自然界的声音开始，使之成为统治一切的知性的区分特征！——这，就是我要证明的一切。

假如语言是由天使或圣灵发明的，那么，语言的全部构造必定会是圣灵的思维方式的翻版。除了根据超凡脱俗的天使特征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认识天使所画的图像呢？可是在我们的语言里，哪里找得到天使的特征呢？不要说结构和框架，就连语言这座宫殿的第一块基石，也显露出人类性！

在哪种语言里，超自然的、精神的概念是最早生成的？按照我们人类思维的规律，这类概念似乎也应该是最初始的。比如主语(Subjekte)的概念和一般概念(Notiones communes)，按理说是认

---

① 舞台机器：古代戏剧的一种技术，通过机械装置让悬挂着的神像显示出来。墨丘利(Merkur)是罗马神话中的商神。——译注

② 见《旧约·创世纪》第二章十九节。——译注

识活动的基本要素，是一切思想的轴心和归宿，但这些关键的成分也是语言的要素么？主语先于谓语，最简单的主语先于复合的主语，行为主体先于行为客体，本质的、确定的成分先于偶然的、不确定的成分，等等——自然的发生顺序本来应该如此，可是在我们原初的语言里，显然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只知道存在着一个有听觉的、留意倾听的生物，而看不到任何圣灵，因为——

发声的动词(tönende Verba)是语言中最早的生命要素。只有发声的动词么？只有行为、活动，而没有行为主体么？只有谓语，而没有主语么？超人的天才会为此感到羞愧，但感性的人不会。还有什么东西比发出声音的行为更能打动人的内在心灵呢？所以，语言的全部构造方式正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式，正是人类发现的历史！语言神授说什么也说明不了，同时也不能自圆其说；就像培根在另一件事情上说的那样，一个圣洁的处女被奉献给神，但是不能生育，虽然很虔诚，却毫无用处！

由此看来，最早的词汇是由整个世界的声音聚集而成的。每个会发声的物体都说出它的名称，人类心灵于是把物体的图像铸刻在那上面，把声音当作区分的特征。这类发声的感叹词就是语言中最早的词，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例如，东方民族的语言充满了动词，它们是语言的根基。在这些语言里，关于事物本身的观念尚在行为主体和行为之间摇摆不定，事物发出什么声音，就用什么声音表示事物。所以，名词是从动词发展来的，而不是相反。儿童不是把羊称作羊，而是称作一个咩咩叫的生物，即把感叹词变成了动词。根据人类感性发展的阶段性，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用超人类的精神的逻辑却无法解释。

所有古老、原始的语言都有大量这种来源的词。如果把东方语言的哲学辞典里的每个根词连同其词族都分类整理好，那就成了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图画，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而整部这样的

辞典则可以最好地证明人类心灵的发明艺术。是否也会证明上帝教授语言的方法呢？对此我深表怀疑！

由于整个自然都在发声，感情发达的初民很自然地会觉得万物都有生命，都会说话，都在行动。我们的那个野蛮人现在看到了一棵大树和它那高耸入云的顶端，他惊叹不已。树梢沙沙地响起来了！这是神意的显示！野蛮人赶快跪倒，开始祈祷！这里，我们看到了感性的人迈出的两个步子。一步是，名词如何不知不觉地从动词变来；另一步是，具象很容易地就转变为抽象。例如在北美的土著人中，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每样东西都有精神，有守护神；古希腊人和东方民族也曾经如此，我们从他们最古老的词典和语法书可以看出来。在最早的语言发明者眼里，整个自然就是一个神，而事物则是众神，是行动的生灵！

人与周围所有的事物建立起关系，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在对他说话，都在为了他的利益行动或与他抗争；而他则要对它们作出反映，或赞同或反对，或示以爱心或表露憎意，以人类的方式尽情展开想像。人类思维的所有这些痕迹都刻在了最早的名称上面！最早的名称也表示爱或恨，诅咒或祝福，同情或反感，而在许多语言里，正是这类感情决定了语法上的性。一切事物都被拟人化，分为男性和女性；处处在在都是男神和女神，有的是善良的化身，有的是邪恶的象征；怒吼的暴风雨和轻柔的微风，清澈的泉水和强大的海洋——他们的全部神话体现在其古老的宝藏即语言的动词和名词里面，最古的词汇其实就是发声的众神，是男女两性聚会的大殿，反映着自然给予最早的语言发明者的感觉印象。在这方面，那些古老的原始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神话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可以揭示人类幻想和热情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每个词族都像是一片灌木丛，围绕着一棵神圣的橡树——即一个感性的基本概念——交错纵横地生长起来，而在那棵橡树上面还残留着一些痕迹，

让人看得出树精或森林女神曾经带给语言发明者的印象。他的感觉和情感汇合在一起：凡是在动的都是生灵，凡是发声的都在说话；而既然这声音不是为你而发，就是与你为敌，它于是就成为你的朋友或对手，成为男神或女神。一切都像你一样充满热情！

我喜欢感性的人类生物具有的这种思维方式。处处在在，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弱小、羞怯、敏感的人，他必须去爱或者恨，必须信赖或者畏惧，他胸中的这些感觉被散布到所有的物体上面。处处在在，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弱小的生物，但在跟宇宙抗争时他却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他需要整个宇宙，他向一切事物发起挑战或与之和平相处，他依赖于一切但又统治着一切。所以，语言中的诗情画意和性别区分反映了人类的兴趣，而言语仿佛成了人类生殖手段的延续。如果是一个超人的天才从星空中带来了这一切，他怎么才能做到呢？一个从天上来到我们地球的天才，他会卷入爱和恨、脆弱和畏惧的激情之中，以致把一切都当作喜爱或憎恨的对象，使所有的词都有恐惧、兴奋等感情色彩，并且最终将一切都建立在两性交配的基础之上吗？他能像人一样认识和感觉吗？名词要分出性别，配上不同的冠词；动词要分主动和被动，要分清它们那么多的亲生子女和养子养女[①]，总之，整个语言是以对人类弱点的感觉为基础建筑起来的！而我们的那位天才能认识和感觉到这一切么？

捍卫语言超自然起源的人提出的证据之一是语言的神圣秩序："绝大多数根词(Stammwort)是单音节的，而动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节的，语言就是这样根据记忆的规则逐层构造起来。"可是，这个说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结论也不可靠。在被认为最古老的现存语言里[②]，词根都是双音节的动词，其原因我根据以上所述完

① 盖指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译者

② 指希伯来语。——译者

全可以解释，而超自然起源的假说则无能为力。实际上，这些动词是以源自会发声的大自然的语声和感叹词为基础直接构成的，所以，在动词里面往往还听得见自然的声音，动词常常还起着感叹词的作用。但多数情况下，这种自然的声音由于不完全是清晰的分节音，便会在语言形成的过程中消失。在东方民族的语言里，我们就看不到人类尚不熟练的发音器官最早曾经做过的这种尝试。其实，在动词中听不到自然的声音或只能听到少量有规律的残留成分，这恰恰也证明了语言的原始性和人类性。这样的词根是上帝的理性生成的抽象的瑰宝，还是人的耳朵听到的、笨拙的舌头最初发出的声音呢？人类在童年时期构成的语言，正是幼儿结结巴巴说的语言，一如育婴室里那种口齿不清的话语——这种话我们从成年人嘴里怎么听得到呢？

许多古人说，诗歌比散文古老！许多今人也并不动情地重复过这话。由此正能看出语言的感性生命力。最早的语言不就是诗歌成分的汇集么？诗歌源于对积极活跃的自然事物的发声所作的模仿，它包括所有生物的感叹和人类自身的感叹；诗歌是一切生物的自然语言，只不过由理性用语音朗诵出来，并用行为、激情的生动图景加以刻画；诗歌作为心灵的词典，既是神话，又是一部奇妙的叙事诗，讲述了多少事物的运动和历史！即，它是永恒的寓言诗(Fabeldichtung)，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情节！——除此以外，诗歌还能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再推进一步。古典文化传统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语言是歌唱；不少出色的音乐家推想，人可能是从鸟类那里学会唱歌的。许多人实际上都相信这一点！一架巨大的钟，如果它的齿轮十分精密，发条上得很足，重锤设置适当，就能敲出一曲好听的钟乐。但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还只有一些积极的本能和需要；他的感觉非常强大，但几乎还没有自觉的方向；而且他的发音

器官也还不发达。这样的一个人，要让他来模仿夜莺的歌唱并由此设计出一种语言，我认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关于音乐和诗歌的历史，许多故事就是这样讲的。当然，通过乐调也许有可能形成一种语言（莱布尼茨就曾有过这个想法[①]），然而最早的自然人却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语言，因为它太精巧、太艺术化了。在动物世界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发声，因此又有自己的语言。表达同样的爱意，夜莺用甜美的歌声，狮子用大声的咆哮，野人用发情的狂呼，猫儿用呜呜的长嚎。每种动物都用自己的语言，都是为自身而不是为了人；对于一种动物自身，其表达就像佩特拉克的歌声在他的劳拉听来一样悦耳动听！[②]任凭人怎么想像，夜莺也不是唱给人听，所以人也不会去学夜莺、通过学习夜莺而发明语言。假如在岩洞或森林里，有一个人像夜莺一样歌唱，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说，最早的人类语言是歌唱，那也是一种**人所固有的、非常适合于他的器官和自然本能的**歌唱，就像夜莺飘荡在空中的歌唱只属于它和它的同类一样。这就是我们人类最早的有声语言。孔狄亚克、卢梭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只答对了一半。他们认为，最古老的语言的韵律（Prosodie）和歌曲是从感觉的喊叫演变来的。感觉将生命力和崇高的情调赋予了最初的发声，这毫无疑问。但是，从纯粹感觉的发声中是决不可能产生出人类语言的，即使是所谓歌唱的语言也不可能，因为这里还缺乏生成语言所必需的一个步骤，那就是每一种生物用它自己的语言进行的命名活动。我们听到，整个自然都在鸣响、歌唱，而人要运用其知性，把握其感觉，尽可能地运用其器官，才能形成自己的歌唱，他的歌唱可以说是一台汇集了所有自然声音的音乐会。这的确是歌唱，但它既不

① 见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第一卷第一章“论词或论一般的语言”。——译注

② 佩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抒情诗人。——译注

是夜莺似的歌唱，又不是莱布尼茨所谓的音乐语言，也不是动物般纯感觉的喊叫，而是一切生物的语言在人类语声的自然音阶内获得的表达！

甚至当语言变得更有规律，变得单调乏味、秩序井然以后，它仍然一直保留着某种形式的歌唱，许多原始民族的语言里的那种重音（Akzente）就是证明。从这种后来得到完善、升华的歌唱中，产生出了最早的诗歌和音乐，这一点已为不少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本世纪有一个富于哲理的英国人考虑过诗歌和音乐的这一起源[①]。假如他不那么坚持从自己的系统出发，不把语言的精神排除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将诗歌和音乐最终合而为一，混然不分，以为二者共同产生自人类的本性，他本可以取得卓著的成就。由于古代诗歌的最佳篇章正是那一歌唱式语言的时期遗留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人们理解最古老的诗歌、希腊人的悲剧和朗诵的时候，就会因不能忠实于原作和缺乏鉴赏力而犯许许多多的错误。要是有这么一个哲学家，他来到尚处于那一时期的原始民族中间，学到了他们的语言，能够读懂他们的作品，那就再理想不过了！否则，我们总是不能把握真实的图景，就像错把一块地毯反面的织纹当成了正面的图案那样！Disiecti membra poetae！[②]——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继续深入考察具体的语言现象，就会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所以让我们还是回到人类发明语言的最初阶段。

知性把语声铸成区分特征，语声于是成为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事物都会发声。那些并不发声的事物，人

---

① 指英国人 John Brown 及其著作《关于诗歌和音乐的思考》（德文版 1769 年）。——译注

② 拉丁文，意为“一个被肢解的诗人的四肢！”见贺拉修《论讽刺》第 1 卷第 4 章，62 节。——译注

从哪里来的本领把它们变成语声，心灵怎么才能命名它们，使其获得符号？颜色、形状与它们的命名有什么关系呢？这类名称的产生与咩咩的叫声成为羊儿名称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超人起源说的捍卫者们对此有现成的回答："这是任意的！为什么绿色叫'绿'而不叫'蓝'？这有谁能解释，有谁能在上帝的理智中找到原因？毫无疑问，上帝喜欢这样，仅此而已！"这一来，线索就被剪断了！所有关于语言发明艺术的哲学探索于是都成了随意杜撰的空中楼阁，每个词对于我们人类都是某种神秘的力量(qualitas occulta)，某种任意的东西！也许人们有理由责怪说，我没有理解这里说的"任意"这个词。人类心灵对每一种行为都要了解它的起因，哪怕只是部分的起因，所以，认为一种语言未经任何选择，就从人脑中任意地发明了出来，这种说法对于心灵来说，不啻于肉体被死神的手抚摸所遭受的折磨。而且，一个充满感性的粗野的自然人虽然很强壮，但还很笨拙，能力还不发达，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急迫的原因，他不会去做任何徒劳无益的事情。所以，一种根据肤浅空洞的任意性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与他的整个善于类推的本性相背的；一种完全任意地构想出来的语言，事实上也同一切人类心灵力量的类推原则格格不入。

II. 缺乏声音的场合

好了，现在让我们转入正题。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的情况下，人何以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发明出语言？视觉和听觉、颜色和词、香味和语声是怎样相互联系起来的？

事物和事物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那么，事物的颜色、形状等属性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的感性知觉罢了。而作为感性知觉，这类属性难道不会聚成一体么？我们拥有的是一种能思维的普遍的感官(ein denkendes Sensorium commune)，只是在不同的方

面受到触发。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此。

所有的感官都以触觉为基础，而触觉将一种内在、强烈、难以言状的联系纽带赋予了极不同的感觉，以致从这一联系中产生出了极为独特的现象。我知道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可能是出于儿提时代的某个印象，会突然把某个音与某种颜色联系起来，或被某种现象触发了某种含混的感情；整个行为过程那么自然而又那么必不可免，跟迟缓的理性一点关系也没有。有谁能把声音与颜色、现象与感情作理性的比较呢？我们极不同的感官充满了这类联系，然而，只有当它们突如其来的时候，在病态的幻想中或在其它明显表现出来的场合，我们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通常的思想过程非常迅捷，感觉的波涛滚滚而来，混乱不堪——我们的心灵一下子承受了那么多的东西，因此，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念像似处于一个人在泉水旁昏昏欲睡的那种状态：虽然他听得见流水潺潺的声音，但是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最终还是让睡意带走了所有的感觉。假如我们有可能让思想的链带停止不动，把每一个联系环节都看清楚，那就一定会发现，极不同的感官形成了多么奇特的联想，多么怪异的类推！而这一切其实只是心灵很普通的运作方式。在一种纯理性的生物看来，我们人类或许就类似于某种疯狂的动物，虽然能够聪明地思维，但思想的联系却不可理解，形同白痴！

感性的生物通过许多不同的感官同时进行感觉活动。所以，对于感性的生物来说，这样的观念混合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感官不正是同一种积极的心灵力量所具有的知觉方式（Vorstellungsarten）吗？我们对之作出区分，但只是通过感官这样做，也就是说，通过知觉方式来区分知觉方式。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学着在运用中把它们分别开来，可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共同发挥作用。布封、孔狄亚克和伯尼特对人的感觉所作

的种种区分[1]，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哲学家在跟踪一条感觉线索的时候，不得不把其它的感觉线索放在一边，而在自然中，所有线索实际上属于同一幅织物！人的感觉越含混不清，彼此就越交混成一团；而越不善于运用某种感觉，越不会灵活明确地运用某种感觉，感觉也就越含混不清！现在让我们用这一观点来考察语言的起始阶段吧！由于那时人类还稚嫩无知，语言于是也很简单和纯朴！

人来到这世界上，他面对着那么多的事物；他要花多么大的力气去学着区分和辨认感觉，运用已知的感觉！视觉是最冷冰冰的一种感觉，假如它一直那样冰冷，假如它自一开始就非常清晰（经过许多世纪的努力和练习，我们的视觉已经变得这样了），我不明白何以人能使看到的东西也听得到。可是，大自然为此做了安排，给人指示了一条道路；在初始阶段，就连视觉也只是一种朦胧不清的触觉，就像婴儿和曾经失明者的视觉那样。大多数可见的东西是活动的，许多东西在运动中发出声响，它们对于最初的视觉似乎更亲近、更直接，可以让人触摸到。这种感觉与听觉的关系非常密切。像"坚硬"、"粗糙"、"松软"、"毛茸茸"、"细软光滑"、"多毛"、"僵固"、"平滑"、"简洁"、"毛发短硬"等感觉，实际上仅仅涉及事物的表面而丝毫未及内里，当它们作为名称发出声时，好像就能让人有所感知。这类交混成一团的感觉一齐涌入心灵，心灵便不得不为之创造词语，于是，心灵便有可能从混合的感觉流中抓住一个相邻感官的词。这样一来，所有的感觉，哪怕是最冷冰冰的感觉，就都有了名称。闪电本身并不发声，它是深夜的使者：

---

[1] 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c de Buffon，1707—1788），法国自然科学家，曾与他人合著《自然史》，44 卷，1749—1804 年出齐。——译注

伯尼特（Charles Bonnet，1720—1793），瑞士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译注

它在刹那间照亮了天和地，
而当人还没有来得及说："瞧啊！"
它就落入了黑夜的深渊——[①]

但如果需要予以表达，当然会有一个词产生出来。先是眼睛看到了闪电！由此产生的词通过某种中介感觉，就把眼睛对转瞬即逝的闪电的知觉传递给了耳朵。诸如"香味、声音、甜、苦、酸"一类词都发出声音，仿佛能为人感觉到；一切知觉最初不都正是那种含混不清的触觉么？关于感觉何以能够获得语音表达，我们在本文的第一篇里已讨论过，并视之为一台感知机器的纯自然规则，所以没有必要再作解释。

至此，所有的疑难都可以归为以下两个已得到证明的论点：

1．一切感官都只不过是心灵的知觉方式，而只有通过区分特征，心灵才能形成明确的观念；与区分特征一道，便产生了内在的语言。

2．一切感官都只是一个统一的心灵的触感方式，在人类的童年阶段尤其如此；而根据动物本质所具的感知规律，任何触觉都会自动获得语音表达，所以，一旦这种触觉明晰起来，升级为一个区分特征，词作为外在语言的符号就产生了。这里，我们不得不作一系列特殊的思考：自然的智慧究竟怎样构造了人，使他能够自行发明出语言。以下便是主要结论：

人从自然这位教师那里接受语言，完全是经由听觉，没有听觉他就不可能发明语言。所以，听觉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他的中介感官，成为通往心灵的门径，成为所有其它感官的联系纽带。

让我来作一下解释。

1）面对来自外部的刺激，听觉是人类各种感官的中介。触觉

---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译注

只是在自身的感官之内进行感知，视觉把我们远远地抛出在自身之外，而听觉在传递讯息的远近程度上恰好处在触觉和视觉之间。这对语言来说意义有多重大呢？假如有一种生物（就算它是有理性的生物）把触觉当作首要的感官，那么它的世界会多么狭小！由于不是通过听觉感知世界，它或许会像昆虫一样去织一个网，但决不会利用声音构造语言！再假定有一种以视觉为唯一感官的生物，它观察到的世界便无穷无尽；它会被抛到离自己远得不可想像的地方，注意力会因无限多样的对象而分散得不可收拾！它的语言（我实在想像不出那会是什么样子）或许会是极为细腻的手势，它的文字可能是由颜色和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但它决不会有发声的语言！我们人却是会听的生物，处在上述两种生物之间；我们也看，也触摸，但被看到和感觉到的自然界对我们来说是发声的，它通过声音教会我们发明语言；而我们通过所有的感官，最终似乎成了以听觉为主的生物！

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听觉的便利。**通过听觉，每一种感官都有了语言能力**。当然，听觉实际上只是重复了声音，因为人并不能发明声音，而是只能发现和模仿声音。但是，一方面近有触觉为伴，另一方面又有视觉相邻，这些感官联合起来，距离把区分特征变成语声就不远了。这样，人所看到的，触摸到的，就都可以发出声来。通向语言的感官于是成为我们的中央联系感官，我们成了**拥有语言的生物**。

2）就**清晰明确性**而言，听觉是适中的感官，因此便是达到语言的首要感官。触觉实在太含混不清了！它无力应付世界，不加区分地感知一切。依靠触觉很难确立一个区分特征，其感觉是难以言状的！

视觉则太明亮，它所提供的大量区分特征叫人眼花缭乱；心灵因此为现象的丰富多样所窒息，或许只能勉强区分出一个特征，日

后却难以再度识辨。处在视觉和触觉之间的仍是听觉：来自触觉的所有交织成一团的含混特征都被弃置一边！来自视觉的所有过于细微的特征也被剔除在外。但是，被触摸和注视的物体发出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集合起了触觉和视觉所感受到的特征——于是，这个声音就成了词语符号！也即是说，听觉从两个方面下手，使过于模糊的感觉变得清晰，使过于明晰的感觉变得舒适，这样，触觉含混的多样性和视觉清晰的多样性就分别达到了统一。而通过多样性的统一，通过区分特征的确立，语言便产生了。

3）就生动性而言，听觉也强弱适中，因此可以充当语言的感官。触觉太富热情，视觉则太冷漠；前者太容易使我们产生激情，后者让我们过于平静。而听觉接收的声音深入至我们的内在心灵，足以成为区分特征，但又不过分挑动心弦，以致失去明确的区分性。所以，听觉才是适合于语言的感官。

要是语言出自粗糙的感官，它对我们来说就会过于简扼、单调乏味，让人不堪忍受；但要是语言与精微的视觉相关，它就会使我们的头脑乱作一团！谁要是只靠味觉、触觉和嗅觉生存，那他很快就会像蒲柏说的那样[①]，死于芳香；谁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棱镜傻看，用不了多久就会失明。但我们却能长时间地倾听，并且边听边能用词思维；听觉对于心灵，就像绿色这一中间色对于视觉一样适宜。通过听觉，人便构造成为语言的生物。

4）从作用的时间来看，听觉长短适中，因此可以成为语言的感官。触觉的作用是突然的，它强烈地震动人的心弦，然而为时短暂，一跃而过；视觉把整个世界同时展示在人的面前，数不胜数的物象和关系会吓跑初涉世界、欲创语言的人。但是请看，大自然

---

① 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赫尔德这里引用的是蒲柏《人论》（*Essay on Man*，1733）中的说法。——译注

——我们的语言教师，却给了我们一份额外的恩宠，那就是听觉！听觉把声音一个接一个地传给心灵，从不让人厌倦，永远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传递。所以，听觉是在实践着一种完整的方法艺术：它教会我们循序渐进(progressiv)！有了听觉，人就能理解语言，发明语言！

5) 从自我表达的需要来看，听觉也很适中，因此是语言的感官。触觉的作用非常含混，难以言状，而且也根本没有说出的必要；它只跟我们自身有关，是一种自私自利，自我满足的感官！视觉对于最早的语言发明者来说是不可言状的，而且也不需要立即得到表达；因为视觉所及的事物仍继续存在，可以用目光、手势等指示。听觉的对象却与运动相联系，会很快消失，但它们通过运动发出声音；这种对象是可以言说的，因为它们必须得到表达，而由于需要得到表达，并且是通过运动获得表达，它们就可以言说出来。听觉是多么神奇的语言能力啊！

6) 从发展上看，听觉同样适中，因此便成为语言的感官。触觉在人自始至终是完整的：从生命的第一刻起，一个胚胎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利用触觉。触觉是自然的基干，从它里面生长出感性最幼嫩的枝条；它又好比一个纷乱的线团，从那里面逐渐抽出心灵力量的所有纤细的发展线索。但心灵的力量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我们已经看到，其发展是通过听觉。自然用声音唤起了心灵最早的明确知觉，即，仿佛是将心灵从沉睡的触觉中唤醒，使它得以朝着更加细微的感性方面成长。假如视觉先于听觉得到发展，或者，假如心灵的力量不是以听觉为中介感官从触觉发展起来，那么，我们的心灵就会因过于明智而一贫如洗，因分辨过细而愚蠢透顶！对于一个仅有视觉的生物(就算它是人)，要想把它看到的东西加以命名，把冷漠的视觉与温暖的触觉即人性的基础统一起来，会有多难！这样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本性应有

更好的发展道路，而且只有一条发展道路。所有的感官共同发挥作用，而我们仿佛处在自然这所学校里，通过听觉学习抽象思维，同时也学习说话；视觉随理性一道完善起来，而理性的成长则与命名表达的能力相关。所以，当人面对着视觉现象极为细微的特征时，实际上已拥有一些现成的语言手段和类似语言的手段。他正是通过语言的感官即听觉走出触觉，去发展能够产生更美妙的幻想的感官——视觉；这也就意味着，他学会了用声音表达用视觉观察到的和用触觉感受到的东西。

现在我也许可以综合起所有的线索，把通常称为人类本性的那一组织(Gewebe)一举展现出来[①]：这完全是一种注定要造出语言的组织。我们已经看到，为了造就语言，人类积极的思维力量获得了足够的空间和领地，拥有适当的质料和形态、内容和形式；为了造就语言，人的感官适到好处地组构起来！人的思维因此既不过于明晰，又不过于含混；他的视觉和触觉既不过分敏锐，又不过分迟钝；他的感官既不嫌多余，也不显匮乏。一切都处于平衡、经济、相互补偿的关系之中，一切都经过有意的安排和配置：处处可见统一性和相互联系！处处都合于比例和秩序！这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System)！一个具有悟性和语言、能够思考和创造语言的生物！在观察到所有这些事实之后，如果还有人想要否定人作为语言生物的定义，那他就根本不是要观察自然，而是打算破坏自然：他会因此而颠倒一切和谐一致的关系，彻底摧毁整个人类力量的美妙建筑；他的感性认识将受到蒙蔽，人在他眼里就不再是自然最美好的造物，而是一个充满缺陷和漏洞，既孱弱又病态的生物！而如果他也完全这样来设想语言的话，当然就没有必要把人的机体组织和悟性视为语言发生的基础了。

① Gewebe（织物、组织），英译 organism。——译注

根据苏尔茨提出的娱悦理论[①]，听觉的语言优于其它感官的语言。在此，我也可以跟着他的思路走下去，作一些比较轻松的论述。但那样的话，恐怕会离题太远，所以我们还是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讨论。

1）语言越古老，越原始，从它们的词根里面就越能看出感官的相似性！

在我们自己相对晚近的语言里，我们把愤怒描述为视觉现象，或者视之为词根中的抽象物，比如通过眼里迸出的火花、脸颊的炽红等等来体会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看到和想到这种情感。但是东方民族却能听到愤怒！他们不仅听到怒气冲冲的鼻息声，而且通过它听到了胸中燃烧的怒火和眼里迸出的愤怒的火花！这一切便反映在词的名称里面：鼻子成为愤怒这一意义的来源，所有表达愤怒的词和有关的比喻都令人想到鼻子发出的喘息声。

在我们的语言里，用"跳动的脉膊"、"流淌的血液"等等来表达"生命"；而对东方民族来说，生命就体现在呼吸时发出的声音里。"人在呵气"，意思就是活着，否则就死了；从他们的语言的词根里，听得到亚当最早的生命的气息。

表达"分娩"，东方民族与我们也不一样。他们的名称跟女人分娩时恐惧的叫喊或者动物抖动脐带的行为有关。这正是他们所见到的图景！

"曙光"这个词在我们听起来意味着美丽、光辉、清新，而东方的游牧民族却能在它的词根里感觉到第一道初升的日光；这迅速消逝、让人欣喜的日光我们恐怕从未见过，至少从未用触觉去感受过。像这类古老原始的语言里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使用这些语

① 指哲学家、教育学家苏尔茨(Johann Georg Sulzer，1720—1779)的《论愉快和不愉快的感觉的起源》(柏林，1762年)。——译注

言的人们从听觉和触觉出发，对它们作了非常动人而又深刻的描述。如果能够把不同民族对上述概念的基本感觉解释清楚，那就足以说明我的论点，同时也就完全揭开了人类发明语言的奥秘。

2）语言越古老，越原始，人的各种感觉在词根里面就越交织成一团！

打开最早最好的东方语言词典，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便扑面而来！最初的语言发明者必须把观念从一种感觉中强行分离出来，并把它传递给另一种感觉，而那些特别迟钝、特别冷漠或特别清晰的感官正是观念的主要来源。他必须利用一切感觉和声音，才能从中生成表达！所以，在词的根里面就出现了大胆有力的比喻，并且发生了从一种感觉到另一种感觉的义转：一个词干及其派生形式的意义会相互交叉甚至对立起来，构成一幅五色斑斓的画面。这种现象的起因在于人类心灵的贫乏，在于原始人身上各种知觉的汇合。原始人的那种自我表达的需要表现得极为明显，而且，观念越不能为感觉和声音所把握，自我表达的需要就越强烈，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就没有理由再怀疑语言的人类本源性。认为语言另有起源的人，怎么来解释词根里面各种观念的混合现象呢？难道上帝的思想和词汇那么贫乏，不得不运用意义交混不清的词么？难道可以说，上帝那么喜欢夸张的手法与不合逻辑的比喻，居然把这种嗜好也带进了他的语言的词根里么？

所谓神的语言，希伯来语，处处都显露出大胆的夸张和比喻，看来东方人真要为自己的语言被冠以神的名字而荣耀万分了。可是，对比喻的这种爱好并不是亚细亚人独有的，其它地方就见不到！事实上，比喻精神活跃在所有的原始语言里，只不过因各个民族教化程度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特性而表现得不同。一个对感觉不作太多太精细区分的民族，或一个没有全身心地去寻求自我表达和创造表达的民族，当然不大会为难以表达细微的感情色彩而

困窘不安，或许他们会借助于不知不觉中形成的类似语言的表达。而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则在比喻中显示出其勇气，这样的民族可能在东方，也可能在北美。但是，最贫乏、最古老、最原始的语言无疑是在东方，在它里面，感觉的转移至为明显，比喻的用法根深蒂固。

显然，要想为这样一种语言编一部词源词典，肯定非常困难！一个词根有不同的意义，它们都从一个词义派生而来，自然也就应该归溯至同一源头；但这些意义是由含混不清的感觉、转瞬即逝的次要观念和同时发生的感知行为联系起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发自心灵的深底，难以用规则来把握！此外，这些意义之间的联系极有民族特点，反映着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特定自然条件下的民族（即语言发明者）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所以，北方和西方国家的人们几乎不可能恰当地表达这类意义，不得不用冗长而又缺乏感情色彩的语句来转述。再者，这些意义本是生存所迫的产物，是在激情之中、在感觉的刺激下，为应付表达的不足而生成的；如今要想了解它们，就必须找回同样的情感，试问谁会有这份运气?！最后，在这样一部词典里，要把产生自不同时代、不同动机和不同思维方式的词及其意义搜集起来，即无穷地扩大词的当前定义——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要具备多么敏锐的眼光，才能洞察育成词义的那种环境和条件；要有何等的判断力，才能对不同时代的意义作出不偏不倚的解释！我们的心灵要掌握多少知识，要达到多么灵活的程度，才能彻底了解那种野性的智慧、大胆的幻想和异时异地的民族感情，并用我们现代人的现代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工作，不仅可以使我们熟悉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学和思维方式，而且将会照亮人类心灵中朦胧昏暗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概念与概念交错缠绕，极为不同的感觉相互生成，所有的心灵力量因迫于需要而聚成一体，尽其所能

地表现出全部发明艺术。这项工作如能展开，那么它的每一步都会是一个发现，每一条新的注释都会充分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自身。

舒尔登斯(Schultens)关于希伯来语的探索为他赢得了声誉。他的每一个成果都证明了我所提出的规律。但鉴于许多原因，我不相信最早的人类语言(就算它是希伯来语)的起源可以被完全阐释清楚。

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实不应该放过，让我来作一下说明。豪放粗犷的语词比喻源于最初的语言发明活动。但后来，在迫切的需要不复存在后，出于单纯模仿的嗜好或对古典时期的爱好人们不仅保留下原有的比喻和形象，而且予以了发展和提高。这样，就出现了语言发明之初根本没有的现象，即貌似崇高的荒诞不经，晦暗不明的词语游戏。在初始阶段，人唯有果敢刚毅的智慧，他很少有可能想去玩弄词语游戏，尽管在我们看来他像是在这样做。那是一种野性未驯的崇高的幻想，它用形象比喻的词语表达了原始人的感觉。而后来一代代浅薄的模仿者，他们的运用既缺乏那样的感觉，也不再有那样的时机——唉，那只不过是一些失去灵魂的躯壳罢了！这就是所有近代语言的命运，而本来它们的初始形式却那么刚硬豪放。近代法国诗人不能大胆妄为，因为其语言最初的发明者从未有过大胆妄为之举；整个法语便是健康理性的散文，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诗人所特有的诗化语词[①]。但是，东方民族、希腊人、英格兰人以及我们德意志人难道也是这样的吗？由此可以看出，一种语言越古老，其词根中大胆豪放的成分越多，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没有必要去追踪每一个成

① 赫尔德认为源出于拉丁语的法语远不及希伯来、希腊、英、德等语言古老，故有此说。——译者

分的起源，因为远古时概念纵横交错，但到了后来，一个概念在运用中很少会被联想到本来的意义。最初的比喻萌发自说话的迫切需要，但后来，词被用熟了，其锋芒也磨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以为词仍旧那么富有魔力，能够把所有形象比喻的特点体现出来，那么，东方语言里许许多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就毫无价值可言了！

还有一点要指出。我们已经看到，最早的语言发明者运用了大胆豪放的语词，把不同的感觉并入一个表达，并且让概念毫无规律地交织混合起来。现在，如果要把这一切用界限明确的概念归纳为一些条律或一个系统，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正在生长的语言还是很早就已形成的语言，其初始阶段发明词语的尝试都很少有可能用系统的定义来描述。天哪，我们往往只是想当然地为最早的语言发明者树起一些词语的偶像，而他们自己兴许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在后来的运用中也从未膜拜过！

总之，要为最早的、原始的语言编一部词源词典，需要做的注释和说明简直是无穷尽的。

现在我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论点：

3）一种语言越原始，各种感觉在它里面越是频繁地缠结混杂起来，对这类感觉就越难加以精确、逻辑的归整。在这样一种语言里，同义词异常丰富；虽然欠缺不少重要的东西，它仍有大量不必要的冗余成分。

语言神授说的捍卫者处处都想发见神的秩序，但是在这里他们却几乎不可能成功，他们无法否认同义词的存在。[①]想否认同义词吗？好吧，让我们来看看阿拉伯人的语言：他们用五十个词形容狮子，用两百个词描述蛇，用上千个词表示剑；所有这些词的确有

① 苏斯米希著作的§9。——原注

过细微的义别，可是后来都消失了，——既然这些词注定会死亡，为什么一度要存在呢？为什么神要发明一种不必要的词汇呢？据阿拉伯人说，这种词汇只有一位神的先知以其全部的知识才能把握。难道发明了一种词汇，然后又把它忘记，把它抛弃了吗？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词毕竟是同义词，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有许许多多其它的概念根本没有词语表达。为描述石头，发明了七十个词，同时却没有词来表达一切必要的概念、内在的感觉和抽象；一方面充斥着无用的冗余，另一方面又苦于极度的贫乏，不得不求助于大量的比喻和不合逻辑的词语，——语言被设计得这么糟糕，而有人却还以为这是神的安排！

然而，从人的角度出发，事情就很容易解释了：日常罕用的深奥概念，获得表达的可能性很小，而常见的、通俗的概念则很容易获得表达。人对自然了解得越少，因缺乏经验就不得不从越多的方面观察自然，以致不能形成恒定专一的认识；先验的思考越少，感性的创造越多，同义词也就越丰富！如果只是在一个领域里，为同一个事物创造表达，那么，创造得越多，区分得越细，同义词也就越多；那样的表达最终将汇合起来，语言会成为一片词语的汪洋。任何词都不能随便抛弃，因为哪些可以抛弃，哪些应当保留呢？对于拥有它们的部落、家族、诗人来说，所有的词都是常用词。所以，就像有位阿拉伯词典编撰家说的那样，他的语言里有四百个表示悲惨的词，而他必须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这在他真是四百倍的不幸！一种这样的语言，既可以说很富足，也可以说很贫困；它本来可以省却许多同义词，可是发明它的人没有计划得很周到。——那么不完善的语言，那么笨拙的发明者，会是上帝么？

所有原始语言里的类似现象都可以证实我的论点：它们在一些方面很奢侈，在另一些方面又很匮乏，只不过每种语言都有特殊的表现方式。阿拉伯人有那么多的词描述石头、骆驼、剑和蛇（因

为他们天天与这些事物为伴!),而锡兰人却用大量的词来表示奉承、头衔,喜欢使用富丽堂皇的表达,这当然是由其民族性格决定的。锡兰语里,单是表示“闺房”,就因女子身份地位的不同而至少有十二个名称。看来在这方面,我们这些粗野的德意志人不得不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根据身份地位的区别,“你”和“您”有八种形式,不论一般劳动者或是宫廷大臣,都受其约束。奢侈似乎成了语言的形式特征。在暹罗,有八种说“我”和“我们”的方式,这取决于主人对仆人说话还是仆人对主人说话。加勒比的土著部落几乎把自己的语言分作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两种:最普通的事物,如床、月亮、太阳、弓,都有两套名称,同义词多么丰富! 可是他们表示颜色却只有四个词,这又多么贫乏! 休伦人(Huronen)有两种动词形式,一种用于有生命的物体,另一种用于无生命的物体,所以看见一块石头的“看”和看见一个人的“看”在他们始终是不同的表达;而这种区分涉及整个自然世界,语言又怎能不丰富! “使用”自己的财产和“使用”交谈对方的财产也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言怎能不丰富! 在通用秘鲁语里,性别的区分非常特别:弟弟(哥哥)的姐姐(妹妹)和妹妹(姐姐)的姐姐(妹妹),父亲的孩子和母亲的孩子叫法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却没有真正意义的复数! 每一种这样的同义词都与特定民族的习俗、性情和起源相关联,但不论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人类精神在进行创造**。由此我们可以过渡到又一新的论点:

4)人类心灵在精神王国中的任何抽象,都是由一定的时机促动,通过感官的激发而形成的,所以,任何语言也都是通过声音和感觉而形成的一种抽象。语言越原始,抽象的东西就越少,感性的东西则越多。

在这个无边无垠的领地里,我仍旧只能选取几个例子。

东方语言的整个结构证明,它们的抽象形式最初无一不是感

性的东西！“精神”本是风、呼气、夜里的暴风雨；“神圣”本义为隔绝、孤独；“灵魂”即气息、呼吸；“愤怒”即鼻子发出的哼响，等等。换言之，更一般的概念是后来经由抽象、智趣（Witz）、幻象、比拟、类推等途径构成的，而在语言最深在的内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一般概念或抽象！

在所有的土著民族当中，情况都是如此，尽管其文化有所不同。在巴朗托拉（Barantola）①的语言里，没有“神圣”这个词；霍屯督人（Hottentotten）②则没有一个词表示“精神”。世界各地的传教士都抱怨说，基督教的概念难以用土著人的语言来传达；其实这些概念本身也并不是经院哲学的教条，而是普通理性的普通概念。我们只要让土著人，或者让欧洲一些民族如拉普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把一篇布道词用他们不发达的语言翻译出来，再浏览一下这些民族的课本和词典，就可以体会到上述困难。

如果我们不相信传教士们的话，那么就来读一下哲学家的论述吧。例如孔达米尼（de la Condamine）讲到过秘鲁和亚马逊河流域的语言，莫白迪讲到过拉普兰的情况③。像时间、延续、空间、本质、材料、机体、德行、正义、自由、感激等一系列概念，秘鲁人并不是用理性来说明，从概念出发进行推导，相反，他们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具有德行。观念若未被用作明确的特征，便没有相应的词。

不论在哪里，只要发现语言里有这样的词，我们也就发现了语言的起源。俄罗斯民族的教会语言绝大部分是希腊语；莱脱人（Letten）的基督教概念用德语的词表达，或者是把德语的概念化为本族语。当一个墨西哥人想要表达可怜的罪人这一概念时，就

① 可能是指印度的巴朗河（印度河的支流）一带。——译注

② 西南非洲的一个游牧部落，其语言属科依桑语系。——译注

③ 莫白迪1736年写过一篇关于一次拉普兰旅行的报道，题为《论地貌》。——译注

画出一个跪着忏悔的人；三位一体在他的想像中就是三张戴着面具的脸。我们知道，绝大多数抽象的表达通过哪些途径进入我们的科学语言，进入神学、法律和哲学等等。我们也知道，经院哲学家和辩论家往往不能用他们的语言的词语进行论争，而不得不向其它语言寻求概念武器（如 Hypostasis [δμοούσιος，"本质"] 和 Substanz [δμοιούσιος，"实体"]）；这样的概念正是在那些语言里获得抽象和磨砺的[1]。我们的全部心理学，再完善、再明确，也没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词！

以上所述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即使是最狂热的空想家也看到，他们从自然界、从天堂和地狱里发现的那些新秘密不能不用形象和感性的想像来描述。施维登伯格不得不让他的天使和精灵开动所有的感官[2]；高明的克罗普施道克可以说是施维登伯格的最大敌手吧[3]，但他也不得不把天堂和地狱建筑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之上。黑人感觉到，他的神是从树梢上降临地面的；欣格尔人（Chingulese）则从森林的响动中听到了魔鬼的脚步声。我本人在钻研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中的部分抽象形式后，感受到了人类精神极为特别的发明艺术。我们考察的对象广泛得不可思议，但其原因始终是同一个。当一个土著人想到，某个物体具有精神，那么他一定是从一个感性的存在中抽象出了精神。差别只在于，抽象活动有极不同的类型、程度和方法。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其词汇不多也不少，都是通过从感性中学着抽象而产生的。最简单的例

---

① 公元352年，在亚历山大的神学家阿琉斯（Arius，256—336）与主教阿萨那修斯（Athanasius，296—373）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焦点是：基督本质上类似于神，还是本质上等同于神。"本质"和"实体"是那场争论的中心概念。——译注

② 施维登伯格（Emanuel von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自然科学研究者、通灵论者，写有《天堂的秘密》（1749—1756）。——译注

③ 克罗普施道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狂飙运动发起者之一，这里指其史诗《救世主》。——译注

子是数词，毫无疑问，数词是很容易的抽象。绝大多数土人的语言不管多么丰富、优美和发达，只有寥寥几个必需的数词；腓尼基的商人因需要而发明了计算术，牧人因为要清点牲畜，也就学会了计数。一个狩猎民族如果从来就没有太多可数的东西，碰到一支军队就不知道如何表示其数量，只能称为"多如毛发"！试问有谁能数清楚呢？一个从未数过那么大数目的人，哪来相应的词呢？

精神创造并改变了语言，留下了上述种种痕迹，难道我们可以不顾所有这些痕迹，到云雾中去寻找语言的起源么？哪个词能被证明是上帝发明的？哪种语言里有这样的一般概念，是人从天上获得的？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有100 000条根据[①]，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所有的民族、国度和环境里，语言都萌芽于理性之中并随着理性的成长而成熟起来！谁能对世界各民族的这一普遍的心声充耳不闻?!

让人吃惊的是，我认为最合于人性的那些事实在苏斯米希先生看来恰恰完全出自神的安排，他说："至今还没有发现哪怕是一种语言，完全不能适合于艺术和科学。"[②]可是，这个事实岂不是说明，任何语言都与动物无关，任何语言都只属于人？哪里有完全不适于从事艺术和科学的人呢？这难道也算是一个奇迹么？或只是一件最普普通通的事，只因为他是人？苏斯米希又说："所有的传教士都能与最不开化的土人对话，并且说服他们信教；这一切如果没有预先的安排，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的语言一定含有某些抽象的概念"，等等。如果这是事实，难道也能证明上帝的安排么？这不正说明，当人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构成抽象的词？哪个民族的语

① "100 000条根据"，修订版改为"上百条根据"。——译注

② 见苏斯米希著作§.11.——原注

言里能找到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它自己构成的？难道所有民族的抽象概念都一样多吗？传教士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同样自如地表达吗？根据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报道，情况恐怕正相反吧？除非使新的概念适应于当地人的语言，否则传教士怎么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呢？这种适应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是一样的吗？

关于上述事实，可以提出的证明实在太多了，而结论恰恰是苏氏所不希望看到的。正是由于人类理性离不开抽象，每一步抽象又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才必须包含在每个民族的抽象概念之中，即，语言既是理性的工具，也是理性的映像（Abdruck）。但是，每一种语言里的抽象概念既不多于、也不少于一个民族的能力所及；并且，任何一个抽象概念都是经由感官形成的，在一开始无非就是感性的表达，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是出于神的安排，语言从头至尾完全是人的属物。

5）最后，语法即关于一种语言的哲学，同时也即语言运用的方法，所以，语言越原始，其语法就越少，而最古老的语言仅仅是一部自然的词典。

让我来作一些说明：

1）变格变位不过是对名词和动词的用法所加的限定或缩简，因数量、时间、情态和人称而有不同。一种语言越原始，它在这方面受到的限定就越不规则，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显示出人类理性的成长。没有语法即运用艺术的话，语言就仅仅是一部词典。

2）动词先于名词产生，名词完全是从动词抽象而来的，所以，在语言发明之初，人越不善区分、整理概念，变位形式就越多。东方语言的变位形式多么丰富！但实际上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变位，动词只是在各种变位之间移来挪去。这种情形是极为自然的。跟人关系最密切、对他的语言影响最大的，便是他需要表达的对象——行为、活动、事情等等，因此，最初他必须一一应付那么多的行

为、活动、事情，其结果是，几乎每一种状态都被赋予了新的动词。“在休伦人的语言里，一切都发生变位。一种无法解释的艺术使动词区别于名词、代词和形容词。普通的动词有双重变位，一种用于说话人自己，另一种用于所有其它对象。第三人称分阴阳两性。至于时态，有类似于希腊语的细微差别，比如讲起一个在陆上和海上旅行的故事，就要有种种不同的表达。主动态变化极多，取决于行为所涉及的事物，例如动词‘吃’随着每一种可食的东西变化。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其行为的表达有所不同。使用自己的财物和使用交谈对方的财物，也有不同的表达……。”[①]式、时、性、人称、状态，等等，等等，想一想动词的所有这些丰富多样的变化吧，要花多大的力气，要有多妙的艺术，才能把它们适当地区分开来，从本无语法的词典中构造出一定的语法！莱瑞神父为巴西的托皮南布人(Topinambuer)编写的语法便可以作证。人类心灵最早的词典是一部生动的叙事诗，记录着有声的、行动的自然，所以，最早的语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哲学的尝试，企图把这部叙事诗变成更规律的历史。在一片混乱无序之中，心灵用真正的动词进行着辛苦的探索，这种混乱无序对于诗歌艺术是取之不竭的源泉，经过整理后则成为历史丰富的限定形式，而最后又可以用于公理和论证。

3）一个直接模仿刚刚消逝的自然音的词，意味着过去的行为，因此过去时是动词的基础；但在初始阶段，过去时几乎也用来表示现在。先验地看，这个事实很奇特，没有办法解释。照理说，现在时应该最早出现，在所有较晚形成的语言里便是如此，从这些语言的发明史来看也没有别的可能。但是，对当前的存在可以把

① 这段话可能引自沙莫诺的《休伦语语法》。1744年，沙勒瓦在《新法兰西史话》里已提到当时尚未出版的这部语法书。——译注

它指示出来，而对过去的事情却必须加以叙述。叙述可以用许多方式进行，同时，迫于寻找词的需要，人最初也不得不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所有古老的语言里都有许多种过去时形式，而现在时则只有一种，甚至一种也没有。进入开化时期后，诗歌和历史会对这种现象非常高兴，但哲学却会为此而伤心，因为它不能容忍任何混乱无序的东西。在此，休伦人、巴西人、东方人和希腊人又一次表现得十分相似：处处在在都可见人类精神发展的遗迹！

4）在所有近代的哲学语言里，名词的变化比动词更加细微，但动词受到更规律的限定。因为这类语言从一开始就能冷静地区分现时的存在和过去的事情，而不像古老的语言那样，起初非常含混不清，缺乏规律，摇摆于现实和可能之间。至于对名词，人们逐渐地习惯于区分，用冠词、数、格等等加以限定。但古老的语言发明者却不是只想表达“可能已经做了什么”这一个意思，而是想要一下子表达出所有的意思：是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怎样做的，在什么地方做的。于是，名词便有状态之分，动词的每一人称都与格相关联，并通过前缀和后缀来区分；动词与副词、动词与名词等等全都混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一样样地区分出来了：从吐气音中发展出冠词，由附加成分发展起人称形式，从前加成分中产生出式的标记或副词；词类分化了开来，语法便逐渐形成了。语法作为说话的艺术，作为语言的哲学，就是这样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第一个想到真正的语法哲学和“说话艺术(!)”的人，一定深思熟虑过语法在各民族中间逐阶段发展过来的历史。假如我们真能构思出这样一部历史，该有多好！虽然偏差在所难免，它仍能反映出语言的人类性。

5）然而，一种语言何以完全没有语法也能存在？为什么有的语言可以仅仅是图像和感觉的简单汇合，而没有任何相互联系和

限定关系？回答都是：这就是活生生的语言。高度协调一致的手势、表情仿佛规定了一定的节奏和限度，词汇中含有的大量描述成分(Bestimmungen)起到了语法的作用。让我们看看墨西哥人的古文字吧！他们画出来的纯粹是单个的图像；要是没有一个图像能确切地表达意思，就把若干图像用线条连起来，这类联系必须从他们的整个生活世界来推想或预卜。那种从单个的符号来推测上下文的占卜术，现在只有个别聋哑人在从事了。但占卜术或推测符号关系的本领本身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人们从小时候起在学语言的同时就学到了它，而随着传统的代代相续，它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完善；另一方面，这种本领越简单易学，就越没有价值，而语法也就越多。这正显示了人类精神逐阶段的发展！

例证之一是拉鲁贝尔(La Loubère) 关于暹罗语的报道。暹罗语曾经受到东方语言的影响，至今它的词语联系方式仍类似于东方语言。当一个暹罗人想说："假如我在暹罗，那我就满足了"，可是说出来的句子却是："如果我是(sein)暹罗城，我的心就充满了。"当他想要祈祷时，必须这样说："我父，[对于]我们[你就]是上天！[以]神的名字[起誓，我们]愿意圣洁所有之地"，等等。像东方语言一样，这种词语联系方式跟墨西哥人的图画文字没有什么不同，听起来仿佛是在笨嘴笨舌地学说外国话！

6) 在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某种特殊的现象，苏斯米希先生也曾误认为那是上帝的安排。这种现象就是：利用细小的发音区别来使词义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土著人都拥有这一技巧。例如戛齐拉索·德·维加(Garzilasso de Vega)报道的秘鲁人，孔达米尼述及的巴西人，拉鲁贝尔笔下的暹罗人，雷斯耐尔(Resnel)[1]介绍的北美人。另外，我在一些古老的语言里也发现

---

[1] 修订版作 Resoel。——译注

了这种技巧，例如汉语和东方语言，特别是希伯来语；在这些语言里面，一个微小的音、一个重音或吐气就会改变整个意义。这一切我认为也是非常合乎人性的，反映了语言发明者曾经陷于贫乏的困境，并为摆脱困境而采取了权宜之计！他们本来需要的是新的词，但由于他们的头脑还空洞无物，难以做出适当的发明，便运用了类似于词的手段，比如可能只是变化一下吐气。这可以说是一种节省规律，对于他们起初还飘忽不定的感觉来说，这一规律是很自然的，而对于他们强有力的发音来说，这一规律也是很方便的。但如果是一个异族人，其听觉自幼并未习惯于这类在嘴里只发出一半就停住的咝嘘声，其语感也就不免迟钝冷漠，所以，对他来说，节省和应急的规律反而把话变得不可理解、莫名究竟了。一种健全的语法在语言中起的作用越大，节省规律存在的必要就越小。显然，当最早的语言发明者非常需要某种东西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知道怎么正确地去做，这恰恰也表明，语言不是上帝发明的。

7）最后，语言借助理性向前发展，而当语言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后，理性也借助语言而不断进步，这是至为明显的事实。艺术作品如诗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一种又一种文体的形成，所有这些都推动了理性的发展。哪里没有人类心灵的映像，哪里就不会有理性的进步，新词就发明不出来，应运而生的新形式也不可能推广开来。随着诗歌的产生，就有了韵律，就可以选择最有力的词语和辞格，可以使形象更加生动、更有条理；随着历史的产生，时代便被划分开来，表达也愈益精确；随着演说家的出现，语言中便构成了套叠的长句(Perioden)。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也只能由人类心灵来造就。对于人类心灵的这种生成活动(Hervorbringung)，对于人类心灵的这种旺盛的生命力(Fruchtbarkeit)，我们怎么可以限定它们的作用范围呢？难道可以说，人类心灵就从此时此地起开始发挥作用，而在这之前毫无作为吗？既然它能发明最精微、

最困难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发明出最容易的东西呢？如果它能完成这件事，那它为什么不作尝试，为什么不开始呢？实际上，在语言发明之初，哪怕仅只生成唯一的一个词，那也是理性的符号；盲目、喑哑的人类心灵在其内在的深底里拥有着这个词，同时也确确实实拥有着理性。

以上，我试图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证明人类发明语言的能力：从内部，即从人类心灵出发；从外部，即从人的机体组织、从所有语言和民族的相似性出发。后一角度又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一方面，对象是一切言语的构造成分；另一方面，对象是语言与理性一同发展起来的全部过程。任何人，只要他不想否认人有理性，并且懂得什么是理性，只要他就语言的要素作过哲学的思考，只要他冷静地观察过地球上各种语言的属性和历史，那么他对人类发明语言的能力就不会有片刻的怀疑。我想，对此已没有必要再多加说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这是一个比任何哲学论证都清楚的事实；而古往今来各种语言、各个民族的外在相似，其确凿可信的程度也可以同最真实的历史事件相比。不过，考虑到一切可能会有的异议，同时为了使我们的论点能够在表面上也像哲学真理一样明确无误，让我们再从所有外部事件、从人类本性的相似出发，来证明人必须发明语言，并且弄清在什么条件下人能最有效地发明语言。

第　二　卷

人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发明语言和能够最有效地发明语言

大自然从不造就任何徒劳无益的力量。如果她不仅赋予了人类发明语言的力量，而且使这一力量成为人类本质的区分特征，成为人类优先发展方向的动力，那么很明显，这一力量就是一种积极活跃的能力，它必须有一个供它发挥作用的领域。当人带着构造语言所必需的自然禀赋迈入世界之时，有一些条件和因素立即促使他去发明语言。现在就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这些条件和因素。由于这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很多，我想按照人类本性所循的若干主要规律来进行归纳。

第一条自然规律

人是一个自由思维、积极行动的生物，他的力量在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正因为此，他才成其为具有语言的生物！

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他是一种缺乏本能的动物。就此来看，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没有任何天生的含混本能，会把他引向一定的自然习性、活动范围和生存可能；没有任何嗅觉会告诉他，有些植物可以充饥；也没有任何盲目的、机械的内因，使他得以建造起一个巢穴！他孱弱无能，面对着的却是饥饿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危险，同类的相互残杀、猛兽的坚牙利爪等等，以致无时无刻不与死神为伴；他就这样孤立无援地生存着，没有从造物主那里得到任何直接的教导，任何有用的启迪，总之，他是一个十足的弃儿！

但是，以上描绘的生动图景并非人的完整形象，而只是他的一部分表面的形象；而且，即使视之为表面形象，仍有不真实之处。如果说知性和悟性是人类的自然禀赋，那么，随着较弱的感性和极度贫乏中的需要的表露，知性和悟性也必然立即自我表现出来。所以，作为一种缺乏本能、遭到自然遗弃的可怜的生物，人从最初的一刻起就已是自由行动的理性生物，他应该自我帮助，舍此绝无它途。他作为动物所具有的一切缺陷和需要，促使他以自身的全部力量证明自己是人。我们时代的新哲学真称得上是动物的恩主[1]，这种哲

① 指卢梭的有关学说。——译注

学以为，人由于未能形成更完善的动物能力，作为补偿才形成了更弱小的人类能力。然而，人的能力是人所固有的，根本不能与动物的能力相比较。正如蜜蜂的使命在于啜吸花蜜和建造蜂房，人的全部行动的中心和他的心灵力量的主要方向就在于知性活动，在于人所独有的这一特殊使命。

如果可以肯定，即使是最基本的知性活动也离不开词语符号，那么，第一个有意识的思考行为(Besinnung)发生的那一刻，也正是语言内在地生成的最初时刻。

或许，这第一个明确的思考行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或许，更多地从哲学上着眼的话，我们可以接受布封的看法：人的悟性力量是逐渐形成的。但我们不应忘记，从面对宇宙的最初一刻起，人就已经是人而不是动物；尽管他还不是处处有意识地思考的生物，但已经具有悟性。人决不是一台笨拙迟钝的机器，应该行走却因为四肢僵硬而不能行走，应该看、听、尝，却因为眼昏耳塞舌木而不能做到。对此尚有疑惑的人们应该想一想：人并非来自柏拉图说过的洞穴，来自一个黑暗的囚室，在那里，他从生命的第一刻起就虽有眼睛而终年看不见阳光，虽有健全的四肢而永世不能动弹[①]。正相反，人是自由的，携着世界上最美好的禀赋来到自然之中；他的各种力量和生命力处于最新鲜旺盛的状态，从一开始就已积极地准备好发展。当然，人身上的这些初始的要素一定为造物的天道(die schaffende Vorsicht)所操纵[②]。但是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解释这些要素中的不可思议之处，正像哲学也无法解释人的创造一样。在哲学上可以接受的是人的这样一种初始状态：他的行动是自由的，他完全意识到了自身健全的存在。

---

① 见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译注

② 参考英译：Creative Providence。——译注

现在我可以把前面说过的内容联系起来了。我们说过，人这部机器在一开始是以完整的形式进行感知，从混沌的感觉上升至有意识的思考；那时，感官并非分隔存在，单独作用，像形而上学的分析以为的那样。听觉是介于视觉和触觉之间的感官，人对第一个明确的区分特征的知觉不仅与视觉、触觉相关，也与听觉有关。显然，语言的发生完全是一种内在的迫切需要，好像胎儿一朝长成，期待着出生一样。整个自然都在催育着人，迫使他发展自己的感官，直到他真正成长为人。语言便是从这种状态开始形成的，而这只是人类心灵迈出的第一步，以后的每一步都使语言得到了新的发展。

下面我要对贯穿在自然进程中的这一伟大的规律作进一步阐述。

动物的思想联系可能含混，也可能清楚，但却不明确（nicht deutlich）。例如在生活方式和神经构造上最接近于人类的动物类型——走兽，常常表现出有许多的记忆，在有些场合它们的记忆甚至比我们人类还好。但这种记忆始终只是感性的。没有一种家畜的行为可以证明，它的记忆曾经起过改善整个种属状况的作用，或曾经将经验普遍化，以利日后再度运用。狗无疑认得人打它的动作，狐狸也知道要躲开猎人设下的可疑的圈套，但它们都缺乏某种概括的反思（Reflexion），所以不能永远摆脱人的威胁动作和诡计。这意味着，它们的感性经验始终局限于个别、具体的场合，它们的记忆会成为一个由不断发生的感性事例组成的序列，但这些事例从未由思考联系起来。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合成，缺乏明确的统一性；是一个由一系列生动、清楚的感性表象（Vorstellungen）堆成的梦，缺乏一条清醒明白的规律，能把这个梦理出头绪。

当然，不同的动物种类也有很大的区别。动物活动的领地越

小，感性的本领越强，艺术能力和生活方式越单调，通过经验可以观察到的进步就越微小。蜜蜂不论在幼小时还是长大以后，不论在世界末日还是在创世之初，都以同样的方式建筑巢穴。这类动物的本领体现着光明美好的上帝射出的火星，但永远只是单独、分散地发出光亮。一头经验丰富的狐狸的确不同于初次遭到猎捕的幼狐，它事先就已知道猎人的许多把戏，力图躲避开去。可是，它是怎么知道的呢？它怎么试着躲避呢？是因为经验直接告诉它要这样行动，仅此而已。在任一场合，它都没有进行明确的反思。即使最狡猾的狐狸，今天不也会像被世界上第一个猎人抓住的狐狸那样，落入人的圈套吗？在人身上，显然是**另一种自然规律在支配着观念的联系和延续**，那就是**悟性**(Besonnenheit)。悟性即使在最具感性的状态下也起着作用，只不过不易为人察觉。人初入世界之时是最无知的生物，但他马上就开始接受自然的教化，而这在所有其它的动物都做不到。他不只是每天都在学习，而且是每一分钟都有收益，从每一个思想中获得启迪。人类心灵的本质特点就是：人决不是为当前的一刻学习，而是把一切都与他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或为将来的联系而贮存起来。换言之，人类心灵在不停地考虑它已积聚的东西和进一步要积聚的东西，它是一种永不歇止地进行着积聚的力量。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的一生，直至死亡。人似乎永远不是**完整的人**，他始终在发展，在进步，在完善。一种活动通过另一种活动得到提高，后来的活动建立在先前活动的基础之上，从旧的活动中发展出新的活动。岁月无情地流逝，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明显的特征来区分年代和时期；假如人不仅能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而且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成长，那么，年代或时期就可以分为更小的时段，并且可以一直划分下去，直至无穷。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我们都是从童年生长起来的；我们始终处在运动之中，从不停息，从不满足。我们生命的本质就在于永不满足，不断进

步；除非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否则我们就不能算是完整的人。与此相反，蜜蜂从建造第一个蜂房之时起，就已是完整的蜜蜂。

无疑，这种不断完善的规律或凭藉悟性而持续进步的规律在任何时候都起着作用，只是其作用并不总是可以察觉。但不大容易察觉，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吧？人在梦中、在思想的梦境里不像清醒时那么条理井然，概念明确，但他始终是作为人在思维；作为人，他或许处在过渡状态之中，但他从不完全像动物那样思维。即使在梦中，一个健康的人也像清醒时那样，其思想有一定的联系规则，只不过可能与清醒时不是同样的规则，或者虽是同样的规则，但并不始终如一地循守。其实，像梦这样的例外，更不必说疾病和非自然的状态、昏厥、疯癫等等，恰恰证明了上述主要规律的有效性。并非每一心灵活动都由自觉意识(Besinnung)直接导致，但每一心灵活动都是悟性的结果。假如人不是完整的人，不按照上述自然规律思维，他的任何心灵活动都不可能获得表达。

然而，没有心灵的词语，人类最早的自觉意识活动就不能成为现实；事实上，悟性的所有状态都以语言为基础，人的思想的链带也即词语的链带。

我这样说，是否意味着人的最含混不清的感觉即触觉也要有相应的词，或只能通过词来感知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荒唐了！可以证明的恰是其反面：仅仅通过含混的触觉而感知到的东西，是没有任何词能够表达的，因为那样的感觉缺乏明确的特征。就任意的语言而言，人性的这种最初的感觉基础是无法予以表达的。但是，基础不等于人的完整形象，正如底座不等于整个雕像。难道人本质上仅仅是一只依靠含混的触觉生存的牡蛎吗？还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人的整个思想过程吧。

人自始至终拥有悟性，而悟性从整体上说，在任何状态之下都是自觉意识，或可以为自觉的意识所把握；在人身上，触觉并不占

据统治地位，他的本性的支柱是更精微的感官即视觉和听觉，而正是视觉和听觉源源不断地为他造出语言。所以，整个说来：

人类心灵的任一状态都有生成词语的能力，并且都有心灵的词语予以限定。

大概只有最最昏昧的梦想家或野人，最抽象的先知或一个梦游的单子(Monade)，才会完全不用词语而思维。甚至在梦中或在疯子身上，我们也看到，人类心灵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状态。虽然下面的说法听起来有些大胆，却是千真万确的：人用知性进行感知，边思维边说话。人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思维，每个思想在不知不觉中都与过去和未来紧密维系，因此，

通过反思而与整个思想链带关联起来的每一状态都有助于更好地思维，同时也不断提高着他的说话能力。

人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感官，运用的重心是在视觉和听觉上：前者形成区分特征，后者将声音赋予区分特征；而随着感官日益熟练、精微的运用，语言便逐渐优雅起来。人又可以自由地运用其心灵能力，运用的重心是在悟性上，并且不能脱离语言；而随着悟性日益熟练、细腻的运用，语言也就慢慢完美起来。所以，对于人来说，语言的持续发展如同他固有的本性一样自然。

当人类心灵竭尽全力征服困厄险阻，以求得自我表达之时，谁能知道它的力量的范围有多大呢？人类心灵通过持续不断、内在交织、丰富多彩的发展而逐渐趋向完善，但对于它可能达到的完善程度，有谁能够估测呢？由于一切心灵活动最终都要获得语言表达，一个人必须为其语言积聚多少东西啊！最早的人视觉不灵，更不会发声，但他用所有的感官学习，接受整个世界的教化；如果他在孤立独处的状态下不得不创造一种简陋的语言，那他要使自身变得多么丰富，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他能享受些什么呢？大自然没有赋予他足够的嗅觉，以区分对于他有益的植物和有害的植物。

于是他必须试着去尝，用舌头分辨什么是可食用的，就像欧洲人在美洲的动物中间观察到的那样；通过这样做，他注意到植物的特征，同时也就积聚了语言。他没有与狮子对抗的力量，因此他必须躲避狮子，远远地从吼叫声中认识狮子；并且，为能有效地躲开狮子，他要学着识辨狮子以及其它许多有害的动物，同时要将它们一一命名。积累的经验越多，认识的面越广，语言也就越丰富！越经常运用已有的经验，重复已形成的区分特征，语言就越稳固、越流畅！区分越细，分类越精，语言也就越有条理！在积极活跃、变化多端的生活中，在与困难和需要的持续斗争中，在对物象不断更新的认识中，人提高着自身和他的语言。这样一个年复一年的过程，对语言的发端会毫无影响吗？而且，这里还只是以一个人的生活作例子啊！

假如有一个像动物那样不会说话，甚至在其心灵中也不能用词思维的人，那他就是创世主造出的最悲惨、最没有意义、最遭冷遇的生物，而且与他作为人本身也是最大的矛盾。人孤立独处于宇宙之中，他不依附于任何物象，但又必须面对所有物象；他的生存没有任何保障，自我防御的能力也很低下。因此，人要么屈服于自然，要么就必须统治一切；要么以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智慧建立秩序、占有万物，要么就死亡。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或甘为奴隶，或借助理性成为万物的君主！或走向灭亡，或创造语言！迫于如此危急的需要，人的所有心灵力量都聚集起来，整个人类都为成为真正的人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明、构造、组织、整理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我们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人。当我们想像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境地时，定会战栗不已。有人会怀疑地说："噢，在那样的状态中，以那样迟缓、软弱的方式自救么？并且是借助理性，借助思考(Überlegung)！可是理性的思考多么慢啊，而人的需要多么急迫，

危险来得多么快!"提出这种异议的人显然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为自己辩解,但最终反而会证实我的观点。我们的社会由许许多多的个人组成,他们的能力和活动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因此,从青少年起,社会就对能力和机会作出分配,使得人人有所不同。这样,社会或许要求一个人只拥有理性,以解答代数问题,而要求另一个人只须有刚毅、勇气和拳头就够了。后一个人对社会的用处在于,他虽非天才,但很勤勉;前一个人的用处则在于,他只在一个方面是天才,在其它方面什么都不是。每一只飞轮都必须有确定的位置,所有的飞轮必须保持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不成其为一台完整的机器。但是,这样地分配心灵力量,为突出一种力量而窒息所有其它的力量,可不是自然人的状态!一个在社会中出生和受到教育的哲学家,除了会用头脑思考和用手写作外,是什么都干不了的。可是,如果我们让这个哲学家突然置身于那种自然状态之中,把社会为偿付他的单一劳动而提供的一切保护和舒适的条件统统剥夺掉,那会怎么样呢?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他就不得不去觅食,与野兽搏斗,自己做自己的保护神。请想想他有多么尴尬吧!为应付这一切,他需要有良好的感官和足够的力量,然而这些他都没有,在这方面他也毫无训练!或许,由于陷入了抽象的迷宫,他已失去灵敏的嗅觉、视觉和听觉以及发明创造的才能,当然也失去了迅速应变的能力和勇气;这种能力和勇气只有在面临危险时才得到发展和表现,并且需要经常锻炼,才不致退化。如果他年纪已大,其精神的生命源泉已经干涸或已显枯竭的征兆,那么,不管怎么说让他适应于那种新的环境已为时过晚。

但是,最早的语言发明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我所讨论的一切发明语言的尝试,都跟哲学上的实验无关。人发现草木的特征,跟林耐对植物的分类没有丝毫关系;人类最初的经验并非哲学家的抽象实验,冷静审慎,慢条斯理;一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的无所

事事的哲学家，在探索自然界隐秘的进程时只不过是想了解自然怎样运作，而并不关心自然在运作这件事本身。而我们的第一个自然居民与这位哲学家正好相反。难道一定要有明确的标志告诉他，这种或那种植物是有毒的吗？他在这方面比不上动物，就一定比动物差吗？一定要等遭到袭击之后，他才知道怕狮子吗？他虽然胆怯孱弱，却有悟性，有种种智巧的心灵力量，这些得到自然承认的禀赋，难道不足以使他为自己造就一个适宜的环境吗？我们根本不需要坐在书房里从事抽象思考的谨小慎微的哲学家来充当语言发明者的角色。一个充满野性，其心灵和肉体都完整地投入感觉活动的自然人，对我们来说，要远远胜过一切创造语言的科学院院士。为什么我们非要把一个学者当作发明语言的样板呢？难道为了证明人没有视觉，我们就可以互相往眼睛里撒灰吗？

这里，我的论敌仍是苏斯米希。他用整整一章（第三章）来说明，"即使人通过模仿发明了语言，也不可能使其语言持续不断地发展！"其实我们已经证明，所谓无须人类心灵的参与，仅仅借助模仿就可以发明语言，是荒谬至极的说法。假如我们这位语言神授说的捍卫者意识到这一说法的荒唐，我相信他就不会摆出那么多似是而非的根据；想用这类根据来证明语言并非人类的发明，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我没有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整个那一章的内容，因为作者往往偏离本题，走得太远。况且，那里面虽然论及语言的本质，但全都是些任意杜撰的假定、牵强附会的论点和漏洞百出的公理。让我只从其中选出一个方面来分析，即：苏斯米希完全忽略了一种持续发展的人类语言和不断进步的人类心灵的本质。他说：

"假定最早的世界居民是由数千个家庭构成的；假定通过语言的运用，知性的光芒已经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能认识到语言是什么；假定他们因此已开始考虑改进语言这一神圣的手段，那么

……"[1]

苏斯米希的这些前提是一条也不能成立的。难道一定要过了千秋百代之后，人类才能认识到语言是什么吗？事实上，第一个人就已经有所认识，因为他已有了第一个思想。人一定要等到千百年以后，才会意识到改进语言是一件好事吗？事实上，第一个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已开始学着更好地分类、纠正、区分和组合他所知觉到的第一批特征，从而不断学到新的东西；而与此同时，每时每刻他也就直接改进了语言。假如语言历经千百年而未有显著的提高，知性的光芒通过语言又怎能射进心灵呢？不改进语言，竟能启蒙心灵？数千个家庭繁衍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我们能说语言才刚刚开始改进吗？这岂不是在自相矛盾?! 让我们来听听苏斯米希接下去怎么说：

"那么，不也应该假定文字的存在么？要知道，哲学和语文学上的这种进步绝对离不开文字工具。"

这显然也错了！人类语言最初的发展是自然、生动的过程，而决不是什么哲学的、语文学的进步。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在他们死气沉沉的博物馆里，怎么来改进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呢？

"难道所有的民族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改进其语言吗？"苏斯米希怀疑地问。

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因为他们都是作为人而这样做的，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敢说，人类语言最基本的构造是一样的。但如果像苏斯米希那样，就此以为最大的奇迹在于所有的语言都有八个词类，那么，从事实到结论就都错了。并非所有的语言自古以来都有过八个词类。若从哲学上入手考察一种语言的构造方式，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八个词类是相互生成的。在

---

① 其著 80—81 页。——原注

最古老的语言里，动词先于名词出现；而在规则变化的动词之前，可能已出现感叹词。在晚起的语言里，名词与动词像是一同派生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谈到过希腊语的情况：在一开始也只有动词和名词，其它词类是后来语法家从动词和名词中发展出来的。关于休伦语，从我所读到的材料来看也是如此。至于东方语言，就更明显了。所以，八个词类只不过是语法家任意的抽象，并不完全合乎逻辑，当然根本不是上帝的艺术品！它比得上蜂房的形状那么规则，那么奇妙吗？就算它是一件艺术品，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唯有人类心灵能予以解释。

苏斯米希又问："是什么促使人们去做改进语言这样一件辛苦透顶的事呢？"

可是，改进语言决不是像学究的思辨那样辛苦麻烦的事！决不是先验的、抽象的改进！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复杂的动机，促使人们去改进语言；这样的动机只有在我们业已发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

假如人可以改进语言，那么，"最早的语言改进者就必须极有哲学头脑，必须比如今研究语言及其内在属性的绝大多数学者看得更深更远"；"那些最早的学者必须处处都认识到，语言是不完善的，认识到他们不仅有能力改进语言，而且也需要改进语言"；并且，"他们必须对语言的目的作出适当的判断"，等等；最后，"要求改进语言的愿望必须足够强烈、积极和持久，才会促使人们投入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总之，我们时代的这位哲学家一步也不敢越出这些人为的条件。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他怎么能够写书讨论语言的发生呢？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世纪里，语言即使应该产生，也不再可能产生！

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教化程度的人民。由此我们已掌握可靠的知识，可以把已经发生巨大

变化的人类及其语言的历史追溯到最早的一幕。我们知道，在地球上那些偏远的角落里，理性还未具任何优美的、社会的、丰富多样和博学多识的形式，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尚未分割开来的整个人类心灵——包括感性、原始的敏感、机智、勇气、激情和发明创造的精神——最积极活跃地发挥着作用！因为，在那种状态下，心灵尚未受到任何单调乏味的规则限制，并且始终面临着危险、挑战和迫切的需要，因此时时处处都以完整的方式感知到新的东西。只有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状态下，人类心灵才显示出自行生成语言和不断发展语言的力量，才拥有足够的感性和像似本能的能力，才得以完整地感知活生生的自然界里面的全部声音和全部有声的特征；自觉的意识于是就会把其中的一个特征区分出来，赋予它一个强有力的、内在的名称。这样的感知和命名活动与我们现代人已经无缘了。心灵的各种力量越欠发达，每一种力量越不局限于某个狭小的领域，所有的力量就越是紧密、内在地结合起来，共同产生作用。心灵力量可以比作一束捆绑在一起的箭，它是折不断的；但如果把它拆散开来，所有的箭就都可以折断。而一旦分散开来，心灵力量当然不可能一举创造奇迹；至于以哲学家唯一拥有的那份抽象思维的禀赋，就更不可能发明语言了。

问题还不限于此。最早的语言发明者对世界的感觉，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深刻得多。他的各种感官经常汇合起来，从而一再唤醒内在的感觉；与此同时，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特征，形成新的分类方法、观察角度和迅速的推理方式，而这一切便使语言得以逐步丰富！为发明语言，人类心灵无须启动所有最美妙的灵感；所谓八个词类，那是后来才有的。在尚不存在任何社会刺激的初始状态下，心灵只能自我激励，内在的冲动和外部的需求会迫使它整个投入感知和思维活动。随着人类心灵力量的完整发展，语言便产生了。

我无法理解，为何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只顾在昏暗的工作室里从事人为的艺术活动；我们完全被阴影所包围，从未想要认识一下不受任何禁锢的大自然拥有的那种光明。只有在活生生的世界的碰撞中，人类精神才会做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并予以表达；而现在，英雄行为早已蜕变为书本知识和课堂训练，人类诗歌和论辩的杰作也早已为语言游戏所取代，从小孩子到老头子都在玩着这种泥于规则、咬文嚼字的游戏。我们崇尚古人的形式，却丢弃了他们的精神；我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却感觉不到他们生动的思想世界。当我们要对人类精神的杰作即语言的形成作出判断时，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不得不从僵化的思维接受观念，殊不知，这些观念本是来自世界的生动气息，来自自然的积极作用，因此才能唤醒人的心灵，推动人不断进步。我们把语法家后来才制定出来的那些僵死的规则当作神的作品，却忘记了人身上真正神奇的东西，那就是自然的语言禀赋；语言是在人的心灵中与精神力量一同形成的，但其表现却未必始终合乎规则。如今，语言创造活动已经大大萎缩，成了学校教育的事，与活生生的世界已毫无关系。人们因此就否认存在过一个光明的世界，最早的语言创造者曾经在那里面生活、感知、创造和吟诵。但我深信，有许多人会与我持有同感，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固有的力量和初民语言的崇高伟大，认识到人类语言的一般本质。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第二条自然规律

人本质上是群体的、社会的生物，所以，语言的发现对于人来说是自然而然、必不可免的。

人类女性不像雌性动物那样每年有发情期，男性的生殖能力虽然并非毫无约束，却持久有效。既然连鹳和鸽子都是成对交配，结群生活，人出于其它一些原因，就更有必要这样做。

面对毛发蓬然的黑熊和浑身带刺的豪猪，人是一种孱弱无能、一丝不挂的动物。所以，他需要洞穴，而由于上述原因，人的洞穴很自然地就是集体的洞穴。

人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受到一年四季恶劣气候的威胁。因此，比起把卵产在沙漠里的鸵鸟来，人类女性怀孕、生育后，更需要社会的帮助。

最后，特别是初生的婴儿，他多么需要人的帮助和社会的体贴呵！他本是母亲襁褓中受到保护的一株小生命，当他被抛到世界上之后，如果没有母亲的乳汁、父亲的抚抱，他显然是一切动物中最弱小、最可怜的一种。人类的社会性完全出自大自然的安排，这一点至此谁还会看不出来？而且，这种社会性与其说是理性的需要，不如说是由直接的本能决定的！

关于最后一点，我还要进一步讨论，因为由此最能看出大自然的运作，同时也能使我缩短推论的过程。如果我们像粗野的伊壁鸠鲁主义者那样，用盲目的肉欲或毫不掩饰的自私自利来解释一切，那又怎么来解释父母亲对孩子的感情以及他们之间那种牢不

可破的纽带呢？瞧，人这个可怜的地球居民来到世界上，而他对自己的悲惨境地却毫无意识。他需要同情，却无力做任何事情以换取同情。是的，他会哭泣，但就连这种哭泣也像菲洛克泰特的哀嚎在希腊人听起来一样讨厌；这位被扔到荒岛上的英雄，毕竟还为希腊人立过汗马功劳。倘若根据伊壁鸠鲁派的观点，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那种天然的纽带恰恰是在其作用最最强烈的时刻也最容易断裂：一个母亲怀胎十月，受了那么多的苦，如今胎儿降生，她终于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假如人的一切行为都由享乐和肉欲的原则支配，那么这位母亲马上就会把新生儿扔掉。至于父亲，他为什么要为孩子和母亲操心呢？他的性欲只会在几分钟内得到控制，然后，他会像卢梭笔下的雄性动物那样在森林中狂奔，寻找下一个泄欲的对象。但是我们看到，在人和动物身上，自然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自然的安排多么明智啊！正是痛苦和艰辛增强了母爱。正是婴儿那可怜巴巴的模样和坏性子，他的弱不禁风，以及为教养他而付出的艰苦劳动，激起父母双倍的热爱！儿子曾给母亲带来那么多的痛苦，有那么多次让她感到失去孩子的威胁，让她流了那么多焦虑的泪水，但她却报以更加温暖的爱。父亲曾把儿子从临产的危险中抢夺出来，并为儿子的教养尽心尽职，不遗余力，他对儿子的爱也与日俱增。由于大自然的安排，种属的弱点便成为人类强大力量的基础：人那么弱小贫困，似乎被自然界完全遗弃，当他来到世上时，没有任何可与其它动物一比高低的能力和天份；之所以如此，正是要让他享受动物所无的教育，让整个人类成为不同于动物的、内在联系的整体。

小鸭子从孵出它们的母鸡那里逃开，天性驱使它们跳到水里嬉戏；不管它们的继母在岸上怎样啼叫，发出声声警告，它们也无动于衷。假如人类的孩子带着像鸭子那样的本能降生，他一定也会这样做。每一种鸟儿生来就有筑巢的本领，但它并不传播这种

本领，而是将之带进坟墓。除了自然的本性外，鸟儿没有教师。显然，鸟儿的本领仅仅是个体的属性，是自然本性的直接产物；在鸟儿身上，不存在大自然赋予人的那种特性，即整个种属在心灵上的不断进步。大自然用艰难困苦和父母本能的爱心（希腊人称之为στοργη[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把人维系起来，使得知识的传授和教育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纽带。父母不是为自己集聚思想，而是要把思想传给后代；因此，他们的儿子不必等到最后，很早就可以继承他们的精神财富。父母通过传授知识而向自然偿还债务，孩子通过学习而满足其自然本性的需要；等孩子长大后，他们自己也要向自然还债，用自己的力量增加精神财富，并且再将它传递下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的，他是整个人类的一分子；人类发展的链带延续不断，个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节点。

关于个人在人类发展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稍后再来考察。这里我们只限于讨论最初的两个环节及其联系：

1) 通过教育和传授，形成了一种家族思维方式（Familiendenkart）。

2) 语言的持续发展。父母向孩子传授思想的同时，便向他们传授了语言的概念；大自然以家庭的精神形式把整个人类联系起来，人类知识通过家庭形式而持续发展，同时这也正意味着语言的持续发展。

为什么婴儿那么柔弱无知，离不开母亲的怀抱和父亲的庇护呢？因为大自然要让他有求知的欲望，要让他学习语言。他之所以弱小，是为了使他的族类强大。父母亲借助语言，把自己的全部心灵、全部思维方式传授给了孩子；正由于这一切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感觉和发现，他们才乐于传授。当婴儿开始口齿不清地说出一些话时，这些话对他来说代表着父母的感情；在咿呀学语中，他的舌头和心灵逐渐成型，词语及其所含的父母的感情一再得到重复

——把这些词称为“母语”，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些童年时代形成的早期印象，这些来自父母心灵的图景，会一辈子在他身上保持下去，并且会随时活跃起来。每一个词都会在他的心灵中引发某种从前有过的感觉，每一个词的概念都会带来一大批从属概念；这类从属概念在他怀着童稚的目光步入语言王国之时就已存在，在后来的运用中又一再出现，其影响甚至比纯粹的基本概念还要强烈。于是，就形成了家族思维方式以及家族语言。

现在，有一位冷酷的哲学家大概会站出来问[①]，人们通过什么规律，才迫使别人接受自己任意发明的语言，承认规律的有效性呢？关于这个问题，卢梭发表过慷慨激昂的看法，另一位作者也花了许多笔墨加以讨论。[②]其实，只要我们窥探到人类本性的经济原则（Ökonomie），问题也就不解自开了。类似前引苏斯米希的那些说教，真叫人不堪忍受！

那么，语言以家族的形式持续发展，不就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吗？在自然生活里，女人显然是更弱的一类，她们是否必须从更有经验、供养家庭的男人那里接受构造语言的规律？像传授知识这样的温柔体恤的行为，不也可以成为规律么？一个弱小的婴儿快乐地啜取母亲的乳汁和父亲的思想，同时他不也就接受了语言么？当他把父母的感情、观念、经验等等永久保持下去的时候，不正把语言也永久保存了下来么？精明的政治家订立的一切规约，智慧的哲学家推崇的一切惯例，都不如自然的规律强劲有力啊！儿童时代的词语是在生命的晨曦之中陪同过我们的伴侣；它们与我们的整个心灵一道成长起来；这样的词语，我们难道会拒绝接受，会

① 即卢梭。——原注（这个注在修订版中删去了。同时删去的还有“冷酷的”（kalte）一词。——译注）

② “另一位作者”，指苏斯米希。——译注

把它们忘掉吗？我们的母语是我们最早见到的世界，是我们最早知觉到的对象，也是我们最早感受到的活力和欢乐。时间和空间、爱和恨、欢乐和活动等附属概念，以及儿童火热的心灵中所产生的一切思想，也都随着母语一同得到持久的保存。于是，就形成了部族(Stamm)的语言！

部族的规模越小，其内在的力量就越强大。我们的父辈只是机械地学习一切，自己并没有构想发明任何东西；他们怎么会去关心孩子的教育，怎么能够教给孩子连他们自己都没有的东西呢？但第一个父亲，陷于贫困境地的最早的语言发明者，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几乎在每个词上都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语言中处处都淌下了汗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家庭教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教师！而孩子们的整个语言，就是一种浸润着父母思想的方言，是一首颂扬父母英雄行为的赞歌，就像奥西安献给他的父亲芬格尔的赞歌一样。[①]

卢梭和其他一些人在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权利的问题上发表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假如他真的了解他假想中的那个可爱的野人的本性，那么答案就很容易找到了。蜜蜂对它啜吸花蜜的那些花儿拥有什么权利呢？它会说："因为大自然安排我去啜吸花蜜；本能把我引向这种花而不是另外的花，这种本能就是我必须服从的君主，它把花和花园分配给我作财产。"如果我们问一问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谁给了你拥有这些植物的权利？"他的回答一定是：

"是赋予我思考能力的大自然。这些植物是我花了很大力气才认识的，然后又费了很多功夫教会我的女人和孩子识辨它们。

① 奥西安(Ossian)，传说中的盖尔人英雄、吟游诗人，生活于约公元3世纪。——译注

我们所有的人都靠它们生活。当然，蜜蜂要采蜜，牛羊要食草，它们也都离不开植物；但我比动物拥有更多的权利，因为动物根本没有为认识和教授付出艰苦的劳动！所以，我用以表达植物的每一个概念都是我的财产的印鉴，谁要是抢走我的财产，他就不仅剥夺了我的生命，而且夺走了我以往年代的全部生活价值，我的辛勤劳动，我的思想和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通过努力而赢得的！”

心灵通过识辨活动、通过特征和语言而加于事物的这种印记，对于最早的人难道不比铜币上的铸印意味着更多的财产权么？

父母在教给孩子语言的同时，也就使语言变得更有条理，更加丰富了。教授的过程不正是学习的过程么？当我们把词传递给他人时，当我们反复听到幼儿结结巴巴说出来的词时，我们心中的概念便得到确认，我们对词便做了一番仔仔细细的检验。由此，语言已开始获得一种艺术或方法的形式，最早的语法——人类心灵及其自然逻辑的映像——因此也得到严格的审查和适当的纠正。

卢梭在此大概又会像他习惯的那样发问：“母亲有那么多的话对孩子说吗？相反，孩子应该有更多的话对母亲说吧？那么，孩子从哪里学到了语言，然后又把它教给他的母亲呢？”可是，这个问题也像他提出的其它问题一样，只会引起无谓的争执。母亲当然有更多的东西要教给孩子，而不是相反，因为母亲有能力教更多的东西。母亲的本能，她的爱心和同情心（卢梭出于怜悯和大度，把人类的这些特性全都赠给了动物）促使她去教授语言，就像乳汁丰盈，需要让婴儿吮食一样。在某些类动物中我们看到，大的动物会使小的动物习惯于同类的生活方式。如果父亲要使儿子从小习惯于狩猎，不通过教授和语言能成功么？

“但是”，卢梭又会说，“当父母把词一个个教给孩子时，所教的只是一种业已形成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构成的语言！”

这种区别难道也算是例外么？毫无疑问，父母教给孩子的语言是已经形成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已完全形成；更何况，父母教给孩子的只是自己掌握的一部分语言。难道孩子在一个更广阔更美好的新世界里，就不能进行新的语言创造活动吗？已部分形成的人类语言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个说法难道自相矛盾吗？由于学者、作家和词典编撰家的努力，法语已成为一种那么发达的语言，但我们能说它已发展到顶了吗？每一位新出现的、具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每一个给社会带来新词的人，不都重造或滥造了法语吗？关于卢梭等人的种种谬论，显然不值得就每个细节展开讨论。

又有人会说："假如人是卢克莱修所说的'暗哑肮脏的野兽'(mutum et turpe pecus)，那么，即使迫于需要，他又怎会想要发展其语言呢？"[①]为此他还举了土人语言里的一系列可疑的例子。我的回答很简单：永远不会！假如人只是一种"暗哑的动物"(mutum pecus)，那他永远也不会想到去发展语言，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语言。难道土人真像苏斯米希描绘得那样低级吗？世界上哪一个野蛮民族没有语言呢？哲学家凭空构想出来的抽象的人，是历史上真实的人么？

苏斯米希引用了孔达米尼的报道：奥列诺克人的语言非常繁琐笨拙，[词]往往长达八个音节[②]。他问道，既然动物都喜欢自由，人都喜欢懒散，奥列诺克人是否会改变和完善他们的语言？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上述事实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我们这位作者

① 这是赫尔德在设想苏斯米希可能会提出的质问。Otto(1982 年版)在注释中指出(见 391 页)，赫尔德把他引用的那句拉丁文短语的出处弄错了。该短语不是出自卢克莱修，而是出自贺拉修的《论讽刺》第一卷。——译注

② 奥列诺克人(Orenocks)是居住在奥里诺科河(Orinoco)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译注

引用的几乎所有材料都不可靠)。“长达八个音节”么?事实并非如此。孔达米尼只不过是说,奥列诺克人的语言发音非常奇怪,构造极为独特,他们发出的三、四个音节,用我们的方式写出来恐怕就是七、八个音节,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把它们准确地记录下来。这哪里是说“长达八个音节”呢?再有,这种语言“繁琐笨拙”么?只不过对异族人来说才显得如此吧?难道奥列诺克人必须为异族人改进自己的语言吗?难道他们有必要为了一个来到他们中间的法国人而改进自己的语言,使之法语化吗?(法国人自己学习一种外语,却每每把它肢解得不成样子!)因为他们不能抛弃本民族独有的创造特质,以迁就漂洋过海而来的异族人,就可以说他们的语言没有构成任何像样的东西,甚至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吗?即使假定他们在语言上已不再进行任何创造,甚至为自身也不再创造,难道可以因为人已停止生长,就认为他从未生长过吗?因为土人做一切都必定出于被迫,就可以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吗?

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来说,家族语言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民族,不管人口多么少,开化程度多么低,都拥有称颂父辈和祖先事迹的歌曲,这些歌曲便是他们的语言、历史和诗歌的财富,体现着他们的智慧和激情,同时也是他们教给孩子的课业,是他们的游戏和舞蹈。希腊人歌唱他们的英雄阿尔戈、赫丘利和巴库斯,歌唱征服特洛伊的伟绩;凯尔特人则歌唱其部族的先祖,芬格尔和奥西安。在秘鲁人和北美人当中,在加勒比地区和马里亚纳群岛上,都有关于本部落历史和祖先的歌曲;在这些地方,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家族语言。事实上,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父亲和母亲的名称都是类似的。同时,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我们述及的有些民族当中,男人和女人几乎拥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这是因为,根据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男人

和女人简直就是完全分割开来的两群人，前者尊贵，后者卑下，甚至连吃饭也从不在一起。教育或由父亲承担，或由母亲承担，于是就有父亲的语言和母亲的语言之分，这跟按照罗马人的习俗，要有一种俗民语言（Lingua vernacula）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条自然规律

人类不可能始终停留在所有的人全都群居在一起的阶段，同样，人类也不可能只用一种语言。因此，各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事。

从严格的形而上的意义说，没有哪两个人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老人与孩子，讲的语言都不一样。拿东方语言来说吧，有长元音和短元音，吐气音和喉音，同一发音器官发出的各式各样、频繁变化的音，停顿和发声的符号，以及靠文字难以表达的种种微细差别，如声调和重音，增强和减弱，等等，等等。语言要素的所有这些细小的特点，都跟发音器官的差异有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甚至两个很相像的人，发音器官也不一样。某些偶然的发音方式，以及某些已成自然的发音习惯，都会使发音器官发生变化。正如两个人不可能长得一模一样，同一种语言从两个人的嘴里说出来，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哪怕只是就发音来说也是如此。

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的语音特点带进语言，这在发音上就已经足以形成不同的方言。

气候、空气、水和饮食会对发音器官产生影响，当然也就会影响到语言。

不久，社会风俗和习惯的强大力量会通过良好的仪态举止使这类特点和差异传播开来。于是就形成了方言。如果我们对东方民族的亲属语言从哲学上作一番探讨的话，就很容易证明我们的

论点。

这还只是就发音说的。至于词本身，以及语言的灵魂——意义，简直是一个无边无垠、充满差异的领域。我们已看到，最古老的语言不得不拥有许许多多同义词。在这些同义词里面，有的人可能喜欢用这一个，有的人可能更喜欢用那一个；有的人会觉得这一个更合适，更动人，有的人则相反。总之，由于个人的看法、感觉和生活经验不同，一个词所产生的印象也因人而异。由此便形成了个人风格的词和独特的词，形成了一种语言的习惯用法（Idiom）。

在一组同义词里，某个词可能被淘汰，某个词可能保留下来；某个词可能略微偏离所指对象，某个词的主要意义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面目全非。变格变位、派生、音变、前缀和后缀、交替形式以及意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就一种新的习惯用法。这是一个完全合乎语言本性的过程，就像语言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发展一样自然。

语言越生动，距离起源越近，即还处在童年生长时期，就越容易发生变化。一种语言如果只存在于书本中，只能按照规则来学习，只用于科学而不用于日常生活，那么，它的指称对象和用法就是确定的，它的词汇是封闭的，它的语法为规则所支配，它的使用范围也是固定的。这样的语言实际上可以保持不变（当然只是不发生显著变化罢了）。然而，在造物主创造的无比广袤的世界之中，一种属于原始、自由的生活的语言在形式上尚未受到规则的束缚，它还没有书籍和文字，更没有所谓经典作品。由于太贫乏，太简陋，它就必须每时每刻都得到补充和改进；由于幼年的柔韧灵活，它每天都可以全神贯注，按照感觉和激情的直接吩咐去改造自身。人们观察世界的每一新的眼光，思维活动的每一新的方法，都必然促使这样的一种语言发生变化。即使埃及人的那种单调划一

的规律，也不能阻止语言走向丰富完善。

显然，整个地球都是为人类设计的；反过来也一样，人类是为整个地球设计的。（我的意思不是说，由于突然的变迁，地球上的居民和民族便处在绝然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之中，而是说，整个人类适合于在地球上的各个区域生活。）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人就像注定要生活在某个特定区域的陆地动物一样适应于一定的环境。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岛，在烈日炎炎的几内亚，都有人类居住。在拉普兰，驯鹿拉着人在雪上滑行；在阿拉伯沙漠，人靠耐渴的骆驼长途跋涉。不论在哪里，人都是地球的主人。无论史前时期的洞穴，还是卡比仑的峰顶[①]，都有人的踪迹；无论奥斯铁克人的熏炉[②]，还是莫卧尔人的金殿，都是人类的成就。为了人类，地球才在两极处呈扁平状，而在赤道处直径最宽；为了人类，地球才以目前这样的方式围绕着太阳运转。地理区域的存在，春夏秋冬的更替，各种各样的自然变化，都是为了人类，而人类则适应于地球上的各个区域、时季和千变万化的环境。在此，自然规律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可以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地方，而动物则限于自己的一块地方和狭窄的活动范围。所以，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地球居民，并且正因此，人的语言才成为全地球的语言。我想，没有必要把上述所有决定着语言变异的原因全都重复一遍。归根到底，语言好比是地球圆形表面上的普洛托斯。[③]

有些时髦的新哲学家认不出这位普洛托斯的真实面貌[④]。他们以为，大自然在地球上的每个主要地域都能够使一对男女成为部族的祖先，就像在每一种气候条件下都生活着某种特别的动物

---

① 卡比仑山（Kabylen），在北非摩洛哥境内。——译注

② 奥斯铁克人（Ostjaken）是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一支乌拉尔人。——译注

③ 普洛托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译注

④ 修订版删去了“时髦的”一词。——译注

一样。这些最早的人的整个身体构造似乎就是为本地环境设计的，所以也就发明了独特的地域语言或民族语言。拉普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身体矮小，留着稀疏的胡子，灵活敏捷，热情活泼；跟自己的驯鹿比起来，拉普人好像更称得上拉普兰土生土长的人兽(Menschentier)。黑人被认为是生活在同一种气候条件下的猿猴的天然兄弟，因为他们的肤色黑如墨汁，嘴唇和头发很特别，说起话像火鸡叫，而且据说又笨又懒。人类种属的各种文化之间，或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之间，在那些哲学家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而上帝的做法似乎也是很不明智的；他让一对弱小畏怯的男女成为整个人类的始祖，把他们安置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听凭他们暴露于形形色色的危险之中。

还有一种看法的支持者较少。这种看法认为：假如语言本是人类精神天然浑成的产物，后来才与人类一道逐渐地为种种不同的风土气候所影响，那么，语言的变化一定也是逐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可以观察到各个民族的变迁、发展和亲缘联系的渐进过程，并且不论在何处都可以根据思维方式、言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细微差异对之作出解释。然而，有谁能够来解释呢？在世界各地我们都会看到，不同的民族或部落在同一气候环境中相邻而处，而他们讲的却是那么不同的语言，就像波希米亚的森林一样丰富多彩！但凡读过有关南美和北美、非洲和亚洲的游记的人，都能想见语言这座森林的种类之多，差异之大。——我们的怀疑者的疑问到此为止，当然一切人类研究因此也就中断了。

持最后一种看法的人只不过是心有疑团罢了。为打消他们的疑虑，我想指出，我们的研究到此并未中止。民族相邻而处，语言却相去万里，这个事实其实跟同一民族中的家族语言的统一性一样，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家族分化为相互独立的民族，但这种分化决不取决于那些单

调乏味的因素，如距离、迁徙、新建立的族际关系等等。这跟一个无所事事、冷漠处世的哲学家拿着尺子在地图上量来划去，完全是两回事。可是，我们的那些关于民族亲缘联系的宏篇巨著，却正是这样写出来的。在这类著作里，一切细节都考虑到了，唯独忽略了背后的规律。只要我们抛弃种种人为的系统，把目光移到生动活泼的真实世界上面，就会发现一些动因，它们很自然地导致了相邻民族的语言差异。人决不是卢梭式的孤独的林中人，因为他有语言；人也不是霍布斯式的狼①，因为他有家族语言。而在其它方面，人也决非一只不能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的羊；他的自然本性可以发展，他可以形成新的习惯，构成新的语言。简言之，相邻民族或部落的语言、思维和生活方式之所以会有差异，原因并不在于气候条件或地理环境，而是在于家族或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家族思维方式，当两个或更多的部落交壤时，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冲突的理由。这应该说是人类本性使然的。同样的需求如饥饿和干渴会使他们发生冲突，例如两帮牧人会为水源和草场而争斗起来。不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类似的争吵都是十分自然的事。然而，还有一类危险的火星更会撩拨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那就是忌妒、荣誉感和部落的自豪自尊心理。一致的家族情绪使整个部落凝聚成一股力量，而对另一个部落则形成一种强烈的敌意，一种家族的仇恨。即，一方面它使许多人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它又使两群人成为仇敌。造成这种敌对状态和持久战争的原因与其说在于人类的劣根性，不如说是在于人类高尚的脆弱。

---

①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社会哲学家，曾著《利维坦》（*Leviathan*），提出有名的论点：Homo homini lupus.（一个人对于他人即是狼。）——译注

当人处在文明发展的这一阶段时，他更多拥有的是力量而不是私有财产。所以，那时的人主要是为荣誉感到自豪；而后来，到了衰退时期，人更多顾及的就是自己的那份可鄙的财产了。在那时，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几乎也就意味着属于一个诚实正直的家庭，因为较之今日，儿子在许多方面更多地从父亲身上学习并继承了道德和勇敢，整个家族时时处处都等于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人们很自然地团结在一个口号之下："不是我们中间一员的人，就是贱者！异族人不如我们，他们是野蛮人！""野蛮人"无疑是最大的蔑称，那既意味着一个异族人，也意味着一个卑贱的人；不论时代的荣誉观念是什么，野蛮人总不外是在智慧和勇气上比不上我们的人。

显然，就如一位英国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①]，如果为财产和私利计，那么，以为邻邦不如我们勇敢的想法决不至于导致仇恨，而是只会让我们暗中欣喜。但正因为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冲突，而首先是群体意识和家族荣誉感的对立，战争的号角才吹响了。这战争关系到整个部落的荣誉，唤起了整个部落的自豪和勇气！交战的双方都是英雄，都是爱国者！由于每个人都与战争休戚相关，都能认识和感觉到战争的原因，民族仇恨也就在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战争中日益加深。于是便有了又一个同义的说法："凡不与我为伍者，即是我的敌人！"野蛮人是可憎的，异族人一律是仇敌。罗马人语言里的 Hostis 这个词便记录了人们的这种看法。[②]

随之而来的直接结果是完全的分裂隔绝。有谁愿意跟那样的敌人、跟可憎的野蛮人互通往来呢？决不能有共同的家族习俗，决不可以想到共同的渊源，更不必说共同的语言了。因为语言是部

① 所指者不详。——译注

② 拉丁语的 hostis 有"客人、陌生人、敌人"等义。——译者

落的徽号和家族的纽带，是传授经验和知识的工具；语言又是关于父辈的英雄行为的史诗，从语言中听得到家族的先祖发自墓穴的声音。所以，语言决不可能始终保持一致。当造就了一种语言的家族感情发展成为民族仇恨的时候，带来的往往就是语言的极大差异。于是就有了我们已听惯的第三个同义说法："野蛮人也即讲一种陌生语言的人"。

像"客人"、"野蛮人"、"敌人"、"讲陌生语言的人"这样一些词看起来不应同出一源，但所有较小的民族和语言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些词确有词源联系。词源联系的中断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抽象，而不是历史上断然的分裂。所有讲不同语言的相邻部落，彼此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且他们大都并非劫掠成性，并无强烈的占有欲，而只不过是一味杀戮毁灭，最终为其父辈的影子而战死。正像奥西安的赞歌里记述的那样，父亲就是他们心中的神明，在整部血腥的史诗中都闪跃着父亲的影子，在暗中操纵着人们的行为。父亲的影子把部落首领从梦中唤醒，使他彻夜不眠，保持警惕；父亲的名字反复出现在誓词和歌唱之中。俘虏受到百般折磨，最后被当作供品奉献给父亲，而受折磨者则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父亲而勇气倍增，无所畏惧地唱起赞歌和死亡之歌。所以，是永久的家族仇恨导致了战争，使得人们分裂为一些相互敌视的社群，而这样的社群往往只是一些家庭。同样，家族仇恨也极有可能导致了习俗和语言的差异。

有一部东方民族的文献讲到了语言的分裂（这里我只把它看作诗歌的残篇，有用于民族史的考古学研究）[①]。这部文献通过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肯定了世界各地的众多民族已经以其自身的例子证明了的事实。哲学家们以为，语言是经由民族迁徙而逐渐

① 指《圣经》旧约中记载的通天塔的故事，见《摩西书》第11章第9节。——译者

发生变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那诗中告诉我们，人们为造一座宏伟的建筑而联合起来，可是突然他们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语言变得多种多样，不能相通，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计划，相互分离开来。一项如此伟大的工作，竟会如此迅速地引起忿懑不和！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场合家族精神受到过侮辱，而一旦这种家族精神醒悟过来，联盟便瓦解了，意图也随之改变，意见不合的火星终于燃成熊熊烈焰。人们本来是想通过建造那座高塔防止分裂，但现在他们的所做所为却加速了分裂。他们搅乱了自己原本同出一源的语言。不同的民族就这样出现了。据后来的人说，这些民族是在废墟之上形成的，原先的民族界线已经被搅乱了。

在此，我无意与神学家争论神明力量的作用。东方民族往往是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观念，他们的叙述具有史诗般的神奇色彩。凡是对此有所了解的人，大概不会看不出上述故事里用感性的形象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之所以会形成众多不同的语言，不仅是因为发生了迁徙，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一个伟大的共同的事业上缺乏统一的认识。

我说过，在这里我是把上述来自东方的材料当作诗歌来引用的。不管其所述是否确凿可信，我们可以肯定，语言的丰富多样与一种语言自然的、人类的发展过程并不矛盾。在任何地方，地震确实都会造就山岭，但仅仅由此我们难道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整个地球连同其所有的山河湖海决不可能从水中获得它现在的形态吗？以上阐述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的词源学家和民族史的研究者谨慎从事，不可随心所欲地根据语言的差异来推导它们的起源。一个家族与另一个家族在血缘上可以非常接近，然而他们却有足够的理由佩饰完全不同的纹章，以作为家族的象征。差异的根源就在于家族或部落的精神。

第四条自然规律

从各方面看，人类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来自一个巨大的宇宙秩序中的一个始源。同样，所有的语言以及整个文明的链带都出自同一源泉。

我们已经指出，人的心灵活动受到某种特殊规律的制约：他总是把正在观察的东西与已经见过的东西联系起来，即，悟性把人类生活的一切状态组织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这其中也就包括了语言及其持续的发展。

我们也已指出，人类拥有某种特殊的活动：通过教育这一纽带，父母与孩子结为一体；在教育上，每一代人都处在另外两代人之间，担负着自然赋予的双重使命，即接受知识和传授知识。而语言通过教育，也就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以上两点合起来，便构成了整个人类的特殊本质，使人类得以在最高的意义上连续存在，不断进步。

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连续的思维。作为儿子或女儿，每一个人都受到教育，因此从小就获得了祖辈思想财富的一部分，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吸取这一财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任何发明、任何改进都是连续的，几乎没有终点。比如，我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我一生丰富的存在；同样，不管是我还是人类的任何一个成员，其行为和思想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整个人类及其全部连续的发展。每个行为都引起一圈或大或小的波纹，每个思想都改

变着个别心灵的状态，同时也改变了所有心灵状态的总和。而且，一个人的心灵状态会对其他人的心灵状态产生影响，导致其发生变化。总之，第一颗人类心灵的第一个思想与最后一颗人类心灵的最后一个思想维系在一起。

假使语言于人如同蜂房于蜜蜂一样完全是生来俱有的，那么，人类文明这一最最宏伟壮观的大厦就会骤然倒塌，化为一堆废墟。每个人带到世上的便是他那一丁点语言储存，这对理性来说意味着，它不得不自己发明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是多么悲惨可怜的生物啊！每一个人都要从头发明语言的基本系统，最终却像蜜蜂那样把自己的发明术带进坟墓；后来的人来到世界上，又要花同样的力气创造出不多不少同样的语言，然后走向死亡。这个过程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直至世界末日。事实上，动物并不能做任何的发明，而人却必须发明，所以，动物的活动规律是不适合于解释人类活动的。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从事发明，那么，无谓的重复劳动就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进行发明的知性便被剥夺了最宝贵的特质，即生长(wachsen)。

现在，假如我处在人类演进的链带之中，我有什么理由停止不前，不去发展语言呢？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加入了教育的行列，而我的父亲和第一位家庭先祖的儿子也都如此。我发展自己的思想，把它们传授给子孙，而我的父亲、父亲的祖先，直到第一位父亲，也无不这样做。这条链带一直向前伸展，到人类的第一个父亲那里才停下来，这样，我们大家就都是他的儿子，社会、教育和语言都是他开始着手发明，而我们所有的人只不过是在模仿，学着他的样子进行构造，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人类心灵产生的任何思想都不会散失，但人类也没有任何一种技能可以像动物的技能那样一举形成，从此完美无缺。由于经济原则(Ökonomie)的作用，人类的技能始终处在发展和进步之中；人类并不拥有类似蜂房

的构造那样的发明物，而是在不断的发明活动中成长和完善。用这一观点来看语言，它将会显得多么绚丽多彩！语言是一座人类思想的宝库，藏有每一个人以自身的方式做出的贡献；它也是一切人类心灵持续活动的总和。

讲到这里，我们又会听到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哲学家提出异议。他倾向于把人看作一种乡村封地般的财产，以为："人类发展的链带最多只能上推至一个地区的第一位家族祖先，他造就了本家族和家族的语言。"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考察只能到此为止，而不能再进一步，为什么这样一些家族祖先不可以再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之父(Erdenvater)。须知，人类的活动都具有持续发展的相似性。

"让一对弱不禁风的男女生活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受到种种危险的威胁，这样的做法未必明智吧?"——我们的哲学家还会继续质问。然而，设想许多对弱小的男女，分散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面对着远为恶劣的环境条件，难道就更加明智么？让我们想像有这样一对男女，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某个气候最宜人的地方，一年四季赤裸着身子也没有关系；尽管他们缺乏生活经验，但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他们的饮食需要。一切都那么便利，仿佛生活在一个工场里面，使得他们稚嫩的技能可以逐渐提高。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些像似人的陆地动物，它们生活在拉普兰或格陵兰那样的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不得不在冰天雪地之中忍饥挨饿，并且要应付猛兽的侵袭。相比之下，那一对人类男女难道没有受到更明智的关照么?

显然，在恶劣的环境中，最早的人繁衍得越多，生活就越没有保障。反之，在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一对男女无须很久就会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如此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而当这个群体散播开来时，便来到了另一个地区，并且是作为一个民

族入居其内。这难道不是更明智、更可靠的发展方式么？他们的人口增加了，身体更强壮了，思维更熟练了，总之，他们继承了祖先的全部经验财富。心灵于是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强大更富足。现在，人已能够使自己成为本地区完美的生物，就像那地方的动物一样适应于环境，同时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这不正好证明了人类精神自然而然的演进，证明人类精神能够从某个中心出发，朝着所有的方向发展么？人类的发展决不取决于单纯数量上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内涵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或者说，决不取决于一大批弱小的行动者，而是取决于他们具备的力量。而力量则是在最简单的状态下发挥出最强大的作用；只有从一个焦点出发形成的那些关系，才会成为整个人类的联系纽带。

关于人类的单一起源，我可以提出许多根据。例如，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材料能表明，有哪个现代人类群体与动物同属一类；人类在世界各地的繁衍和进步表明，人决不是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动物；文化和习俗连续不断的链带也从侧面表明了同样的事实。但我不想再细论这些方面，让我们仍旧回到语言这个主题上。

假如人类是一群群民族动物(Nationaltiere)，每个群体都在隔绝和独立于其它群体的情况下发明了自己的语言，那么，人类语言的差异想必会像土星人与我们地球人在语言上的差异一样巨大。然而，事实是，我们人类的语言是在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不仅是语言的形式，就连跟人类精神的进程有关的一切也都出自同一个基础；因为世界各民族的语言的语法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据我所知，唯一重要的例外是汉语的语法，但我敢说，我能解释汉语之所以成为例外的原因。假定地球上遍地都是会发明语言的动物，那就会有多少类似中国人的那种语法啊！

许多民族都拥有字母，但为什么世界上的字母体系差不多都属于同一类型呢？用任意的词的成分和语音构成任意的符号，这

是一件多么复杂、多么特别的事情，可是那么多的语言却以同样多的方式做了同一件事情，看起来这的确难以解释。而且，所有这些民族都抛弃了远更自然的符号，即事物的图像表达，而采用了表音的方式，并且在所有可能的音当中仅仅表记下二十来个，用它们来应付其它缺少表达的音，构成许许多多任意的符号。从这里面我们难道看不出历史传统(Überlieferung)的作用么？东方民族的字母基本上是同一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古北欧字母(Runisch)和德文字母等等都由之派生而来。德文字母和科普特字母不无共通之处。至于爱尔兰人，竟敢大胆声称荷马的作品是从爱尔兰文翻译过去的。总之，不管愿意与否，有谁能完全否认各种语言在基本的构造上存在着亲缘联系？正如地球上只居住着一个人类，人类语言也只有一种；正如伟大的人类种属划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人类语言也划分为同样多的民族语言。

不少学者尝试过对语言作系属的分类，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有大量间接原因会导致语言的系属关系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识别；而对此，那些从事词源研究的人在构筑谱系树的时候并未估计到。此外，在旅行家和传教士当中极少有真正的语言哲学家，能够或者愿意向我们报道异域语言的独特精神和结构特点，以便纠正我们欧洲人至今仍然普遍持有的错误观念。他们只不过是提供了一张张的词表，而且多半杂乱无章，难寻规律。而真正可供我们推论语言系属关系的规律是非常微妙的。这方面的研究并非我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样一条规律：语言是与人类一同形成、发展和繁衍开来的。下面我只举出三个主要的事实来说明这一规律。

1）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拥有整个人类种属所具有的全部能力，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世界各民族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社会的发明毕竟多于一个人的发明，整个人类

的发明则多于一个特定民族的发明。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个体的数量有别，而且也是因为内在关系有质的不同。或以为，一个孤立独处的人在安逸舒适、不存在任何紧迫需要的情况下，会不慌不忙地发明出更多的语言；由于闲着无事，他会花力气锻炼心灵的力量，不断地产生新的想像，构成新的词汇，等等。但事实显然与此相反。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在某些方面必定会退化为野蛮人；而一旦他的一切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他的创造活动也就停滞了。他好比是一朵断了枝的花，失去根基之后，便会日渐枯萎。有人会说，当一个人处在社会和贫困之中时，就必须为自己也为别人操劳，而这类额外的重负会使他失去自我提高的自由，他也不会有闲情逸志去发明语言。事实当然又正相反。迫切的需要和生活的烦恼使他保持清醒和紧张，繁忙的劳作使他的心灵处于持续兴奋的状态；他会对自己的创造活动感到惊奇，但越是这样，他创造得就越多。至于一个家族的成员，他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定与其他成员互相合作，共同创造。撇开所有其它考虑，一个孤立独处的人，就算他是语言哲学家吧，在一座荒岛上又能发明多少语言呢？一定少得可怜！而一个部落祖先，一个家族成员的发明创造则丰富生动得多。正因为此，大自然才选择了语言在人类群体和社会中发展的方式。

2）人们又会以为，比起一个深受侵袭和战乱之苦的部落，一个与世隔绝的家族会由于生活舒适而有闲暇从事更多的语言创造活动。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一个部落对其他部落的敌意越深，部落成员的内部关系就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强烈的亲缘意识，成员们会更加怀念共同的祖先，用歌唱、呼号来颂扬祖先的英雄行为，并且把这类语言的丰碑保存下来，使之代代相传。这样，先辈的语言就得以更成功地发展，也正因为此，大自然才选择了语言在群体与群体相处中发展的方式。

3）当一个部落成长为一个小小的民族之后，仍有可能自我闭塞。它的生活范围和需要如果固定不变，语言就会停滞不前。我们知道，有许多小民族即所谓野蛮人便是停留在这样的阶段上。他们把自己与世界割绝开来，若干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极度愚昧的状态之中。例如有些岛民竟然从未使用过火，还有许多民族连最简单的机械知识也不具备，就好像他们对世界上存在和发生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于是，这样一些民族就被其他开化民族称为愚蠢的、缺乏人性的野蛮人。可是要知道，就在不久前我们自己也同样是野蛮人，我们的知识都是从其他民族那里获得的。某些哲学家也就此大作文章，认为这样的愚昧无知简直不可理解。而事实上，根据我们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现象是十分正常的。在这种场合，大自然铸成了一条新的链带，即让文明从一个民族传播至另一个民族。于是，艺术、科学、文化和语言便随着各个民族的持续进步而得到提高和完善。这是大自然所选择的最美妙的发展方式。

假如许多世纪来，我们未受异族文化的影响，未被强行拖入异族文化的发展链带，那么，我们德意志人大概会像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至今还生活在丛林里面，为自己的部落进行着英勇的战争。罗马人的文化来自希腊，希腊文化则源于亚洲和埃及；埃及文化出自亚洲，而中国文化可能源自埃及[①]。文明传播的链带就是这样从最初的一环开始沿展，或许有一天会达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希腊人建造宫殿的那种艺术，同样体现在土著人盖一间茅屋的技巧之中；而赫尔曼的红色盾牌尽管十分粗陋[②]，也已经闪烁着孟斯

① 当时在西方学者中流行一种看法，以为埃及是中国文化和语言文字的源头。——译注

② 赫尔曼（Hermann）是克罗普施道克的戏剧《赫尔曼之战》中的主人公。——译注

(Mengs)和迪特利希(Dietrich)的绘画所具有的艺术之光。一个鼓动人们去打仗的爱斯基摩人，已具有日后成为德摩斯梯尼的一切萌芽[1]；而一个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善于雕塑的民族，或许将来会孕育出千百个斐德斯[2]。如果这类民族有机会学习和获取其他民族的文明成就，那么，至少在温带地区，一切都会像欧洲一样发达。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近代的欧洲人只不过是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波斯人、鞑靼人、哥特人和罗马天主教徒们迈入历史，却摧毁了前人的成就。然而，在旧的废墟之上，又建立起了新的、更加生气勃勃的文明。人类艺术在不断地进步(尽管人类本性的某些其它方面会因此受损)，语言也就随之逐渐地完善。毫无疑问，现代阿拉伯语要比原始时代的阿拉伯母语精细百倍，而我们德语比起古凯尔特语来，也精细得多了。希腊人的语法应该比东方民族的语法更完善，因为希腊语是东方语言的后裔；同样，拉丁语法应该比希腊语法更富哲理，而法语的语法应该优于拉丁语法——这意味着，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始终比巨人本身高出一截！

至此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利用语言的规律和美妙来证明语言为神所造，是很有欺骗性的。语言的确合乎规律，也无比美妙，但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逐渐形成的，由什么原因促成的呢？如今为人们所崇尚的语言，我们能肯定它就是人类之初的语言么？也许，它恰恰是历经许多世纪积累而成的，是许多民族共同育成的孩子。语言是一座宏伟的大厦，有史以来，世界上的每一块大陆、每一个民族都参与了这座大厦的建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

---

①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约384—322 B.C)，雅典的演说家、政治家。——译注

② 斐德斯(Phidia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雕塑家，相传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殿是他建造的。——译注

否认，建筑大厦的艺术发源于初民的茅屋，现代完善的语言源出于远古简陋的语言。难道因为人在一开始并没有能力马上建造一座宫殿，就可以认为，应该有一个神来教他怎么做么？——这样的推论真是太荒唐了！假定语言是一座巨大的桥，横架在两座山之间，让我们猜不透它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如果我们因此认为，它一定是哪个魔鬼建造的，岂不可笑！语言是随人类一道演变，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的，无论历史或诗歌、哲学或语法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本来就属于理性可以解释的事实。否认这一点的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因为过分胆大妄为。虽然语言一直在发展，它总该有一个开端吧？既然理性不能离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理性，二者的起源理应是同一的吧？但由此是否可以断定，语言是突发的，其开端是不可理喻的，与发展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掩饰，语言神授说都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

“无稽之谈”是个分量极重的词，但我把它用在这里，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在结束本文时让我再来解释一下语言神授说的实质所在。这种说法等于是说：

“我无法用人类的本性来解释语言，所以语言一定是神造的。”这个结论有多少意义呢？反对者会说：“我完全可以从人类的本性出发来解释语言。”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言之成理呢？前者披着无知的伪装，大声嚷道：“有神在此！”后者则堂堂正正，公开声明：“瞧，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或者等于说：“既然我无法用人类本性解释人类语言，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对之作出解释，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可解释的。”这一结论难道有什么逻辑可言么？反对者则表示：“就我所知，不论是在发生之初还是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的任何要素都可以根据人类心灵的规律加以解释；事实上，我不能想像人类心灵可以无须语言的作用而存在。假如人类没有发展起语言，那就不成其为

一个自然的种属了。"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言之成理，更合乎常识？

最后，语言神授说无异于声称："任何人都无法依据人类心灵去理解语言的发生，不仅如此，我还清楚地看出，为什么语言的特性和人类的本性决定了语言不可能是人的发明；在语言和上帝的本质中，我找到了唯有上帝才能发明语言的原因。"这个结论倒是包含了一定的逻辑，但因此也就成了最可笑的无稽之谈，跟土耳其人证明可兰经出自神明之手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除了神的先知外，有谁能够写出它来？"是啊，除了神的先知外，谁敢作那么肯定的断言呢？假如真是神亲自发明了语言，那也只有神自己才知道这件事。难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放着人类的心灵和语言不去探讨，反倒敢来评说神和他的语言么？

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语言神授说，就连记载着该说法的东方民族的文献也不能。因为在那部书里面，显然通过人对动物的命名而把语言的创造归功于人。[①]相反，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语言是人的发明：从人类心灵的本质到语言的要素，从人类社会的进步到语言发展的规律，世界各地所有的民族、历史上所有的时代都可以为此提供证明！

语言神授说看似虔敬，实则是对神明十足的亵渎：神处处都被贬低了，被赋予了最低级最粗陋的人类特征。相反，人类本源说充分赞颂了神的伟大力量和他的美妙作品：神造就了人类心灵，而人类心灵则通过自身的作用不仅创造出语言，而且不断地更新着语言。神的崇高本质映现在人类心灵之中，使之藉助理性而成为语言的创造者。所以，只有承认语言源出于人类本身，才可以说，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神的作品。

---

① 见《圣经·创世纪》。——译注

语言神授说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为害极大。它使人类心灵的作用丧失殆尽，使它失去一切解释力量，也使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一切科学变得不可解释。据这种假说，人从神那里获得语言，与此同时也就获得了一切知识的种子。但是我们要问，难道没有任何东西产生自人类心灵么？难道一切艺术、科学和知识的发端都是不可解释的么？相比之下，人类本源说的每一步论证都有望从哲学的各个角度对语言的方方面面作出最有效的解释。本文作者就此已经作了一些尝试，若非篇幅所限，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释。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语言神授说都是人类精神的不幸和耻辱，而且其为害已经久矣！如果本文作者能够用这篇论文将该假说逐出历史舞台，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假说，因此违反了科学院的征文规定，但这是因为，现存的假说已经够多的了，以类似的假说取而代之，又有多大意义呢？诸如卢梭的假说，孔狄亚克的假说，等等，等等，不就是一些哲学上的虚构么？所以，本文作者宁可从人类的心灵和组织，从一切古老的语言和土著语言的构造，以及从整个人类的经济系统(Haushaltung)等方面着手，广泛地搜集确凿的材料，以求证明自己的论点，并且要使结论像最最可靠的哲学真理一样站得住脚。作者希望，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他可以更直接地达到科学院设立的目标。

修订第二版序言

本书扉页上注明这是修订版，但由于这部作品的历史成因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修订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文体和标点方面，而很少涉及内容。作为一部由皇家科学院指定出版的获奖作品，本书基本上也必须保持原样不变。我既是作者，现在又是读者之一，而从读者的角度看，最好恐怕是加一些注释，让人们知道自第一版以来作者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想法。但注释过多的话，读者不仅不会欢迎，反倒会嫌累赘，因为这等于让他去读两份作品。考虑到这一点，我想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对本书的内容加以更新和扩充，在这一版里我只打算做一些文体上的修改，使文体更平直更明了，使表达更贴切更温和。而这类修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点也不动原来的版式。即使这样，也颇费了一番功夫。我相信，每一个熟悉本书内容和文体的读者都会对我为修订版付出的努力给予宽容的承认。

赫　尔　德

1788 年 7 月 28 日于魏玛